

# 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

——德国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研究

王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立项课题——  
“德国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学术超员’问题研究”  
(课题批准号: EOA120420) 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2年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魏玛时期德国大学生就业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最终研究成果

# 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

——德国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研究

王莹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德国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研究/王莹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307-13379-2

I. 从… II. 王… III. 法西斯主义—影响—大学生—研究—德国—1918~1933 IV. ①G641 ②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7278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 字数: 19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3379-2 定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自序

魏玛共和国(1918—1933)是德国社会向民主制转型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世界科学之王”的地位却在逐步衰落,最终,包括广大大学生在内的日耳曼知识分子向纳粹“一边倒”。众所周知,大学生本应是未来文化的生力军,新兴力量的代表,可是他们为何没有像英、法等国大学生那样成为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反而误入歧途,成为纳粹的拥趸呢?

事实上,在19—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中,大学生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远远超越了其“知识分子后备军”的身份。在德国学术界,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大学生这一群体,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大学生运动的浪潮下,史学家们才开始真正关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此时,如何维护民主制度稳定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人甚至认为,早在1933年之前,大学生就成功颠覆了一个民主国家,因为这个民主制国家既没有对大学生进行成功的民主政治教育,也没有防微杜渐,及早控制大学生的右倾动向,更没有使用有效手段抵抗大学生倒向纳粹。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社会困境、教育问题、就业危机和思想波动,从而追究他们最终投入纳粹的原因。行文按照魏玛共和国政治开端、发展、结局的历史进程,先对19世纪至“一战”前德意志大学生运动的发展做一回顾,然后对魏玛时期“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和“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从经济原因上分析,大学生特别容易受到纳粹的影响,最初是因为魏玛时代严峻的“知识行业”过剩问题。虽然1918年

后，随着政治发展，大学校门越来越向下层民众开放，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却很成问题，知识分子就业市场越来越萎缩，无法消化高校增长的学生人数。1924—1929年，知识分子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知识无产者”成为一个流行语，知识分子在莫名其妙地“贬值”。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更严重的秩序混乱，德国高等教育阶层曾经期望的地位朝不保夕。在这种环境下，知识职位遥遥无期的等待和日益缩水的收入对他们产生了苛刻的压力，这些压力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愤慨，他们将其发泄在这个跛脚的民主制共和国身上。

其次，德国高等教育的弊端在魏玛时期逐渐恶化。此时，中产阶级无法再通过传统的方式，将“教育”与“财产”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财富部分或全部遭受损失，传统知识精英赖以生存的教育根基土崩瓦解。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科研看作“资产阶级”教育长期畸形发展的副作用，那么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对于这个后果则是无法回避的。从本质上讲，接受教育就是一种资本投资的形式。其中包含了储蓄、投资和利润的最终收益。像任何投资者一样，受教育的德国人期望他们在学习上的资本投入能够带来合理的回报和保护。当倾囊投入但却零回报时，他们就会诉诸政治。在1918—1933年的德国，受教育者并没有安全感，教育财富受到的威胁正如其他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遭到侵犯一样。在既定的观念中，一个有学问的人在道德上也是具有优越性的，但“无产者化”似乎是高级思维和内在价值的一种失败——换言之，传统的学术价值遭到毁灭，成为堕落的物质主义的牺牲品，“真正的智力生活”消失了。

最后，在魏玛共和国之初，大学生就有一种思想危机。从威廉时代继承而来的思想基础与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碰撞，使他们的精英意识被迫改变，这也成为他们碎片化的原因。战后初期，新老大学生成了同窗好友，前线战士一代在心理上的成熟和经历上的丰富使他们的精神和政治导向更加理性，在1918年至1923年的大学生的思想波动中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到了20年代中期，随着前线大学生离开校园，大学生右倾激进主义失去了约束力量。他们

的集体不安全感使他们与纳粹主义开始亲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填补社会与精神真空的材料。30年代初，在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固有的政治矛盾更加无法调和。随着希特勒夺权，大学生感到他们的苦难将要终结，因为一个新的、具有行动力的总理将是德意志民族未来的保证，将由他们来完成社会革新任务。这意味着大学生能够像以前一样生活在精英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

从短时段历史而言，魏玛共和国为大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社会环境，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天空中叱咤风云，练就了娴熟的政治技能，也使纳粹找到了打开大学生政治大门的钥匙。大学生社团是社会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正是依靠了他们，纳粹党才最终走向政治霸权。

从长时段历史而言，魏玛时期的德国大学生走向纳粹的原因则深埋于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之中，正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德意志民族主义在纳粹时代终于首先在年轻人身上像火山一样喷发了。但是，不能断言，大学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做好走向纳粹的准备。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其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变量。

王莹

2014年1月

# 目 录

导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6
三、篇章结构	22
四、译名说明	24
第一章 德意志大学生问题历史回顾(19世纪初—1918)	27
第一节 德意志大学生社团组织的发展	27
第二节 结社生活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	36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前线青年”	43
本章小结	48
第二章 “前线青年的一代”(1919—1923)	50
第一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与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50
一、“前线青年的一代”与新生共和国	51
二、“前线青年的一代”参政思想动机	54
三、“前线青年的一代”与代际关系	57
四、大学生社团内部的政治教育	61
第二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生存困境与“知识行业超员”	65
一、经济困境	66
二、“知识行业超员”	71
三、公共救助与自力更生	75
第三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精英观与军事参与	81

一、捍卫知识精英的特权思想 .....	81
二、保卫国家的军事行动 .....	85
本章小结 .....	89
<b>第三章 “相对稳定的一代”(1924—1929)</b> .....	91
第一节 社会变革与“相对稳定的一代”生存状况 .....	91
一、“相对稳定的一代”经济状况 .....	92
二、“相对稳定的一代”就业前景 .....	94
三、“相对稳定的一代”与美国主义 .....	96
四、“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前途恐慌症 .....	99
第二节 “相对稳定的一代”结构变化与传统社团的衰落 ...	103
一、高校发展与大学生结构变化 .....	104
二、传统大学生社团的衰落 .....	109
第三节 “相对稳定的一代”的政治态度 .....	112
一、“前线战士神话”的复活 .....	113
二、“相对稳定的一代”政治右转 .....	116
三、“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反犹倾向 .....	120
本章小结 .....	124
<b>第四章 “倒向纳粹的一代”(1929—1933)</b> .....	125
第一节 就业危机与“倒向纳粹的一代”前途绝望 .....	125
一、“知识行业超员”的白热化 .....	126
二、“倒向纳粹的一代”对自身前途的绝望 .....	131
第二节 “倒向纳粹的一代”与反犹浪潮的爆发 .....	134
一、限制犹太大学生人数的理由 .....	134
二、“倒向纳粹的一代”反犹活动高涨 .....	140
第三节 “倒向纳粹的一代”与“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崛起 ...	143
一、“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发展 .....	144
二、“纳粹大学生联盟”的结构分析 .....	151
三、“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国防体育运动” .....	158



---

本章小结.....	163
结语.....	165
附录.....	170
译名对照表.....	170
图表.....	172
参考文献.....	194
后记.....	212

# 导 论

## 一、研究缘起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早已是尽人皆知，但鲜被提及的还有另一次大屠杀——书籍大屠杀，即 1933 年 5 月 10 日柏林的“焚书运动”。在这次焚书中，两万多册犹太作家、进步学者的智慧结晶在大学生们病魔般的欢呼中被扔进熊熊烈火之中。海涅曾说：“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从目的和性质上讲，这次的焚书事件与历史上数次的焚书大同小异。但是，从参加对象和意义上而言，它却具有特殊的内涵。因为，这次焚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既是知识的化身，又是未来文化的生力军。何以会受到纳粹主义的蛊惑，陷入集体的疯癫？在时间的坐标轴上，他们刚刚亲身经历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尝试——魏玛共和国，何以在它刚刚失败之际就如此兴高采烈地为其大唱挽歌？要解释这些，远则要追究深埋于德国漫长历史之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殊性，近则要考察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发展的轨迹，尤其是大学生们的成长历程，那种从 19 世纪末便开始在德国人身上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到了纳粹时代终于首先在年轻人身上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若要解释这一过程，则必须研究近代以来德国大学生的发展轨迹。德国历史学界在涉及这一问题的相关领域早有建树。例如，德国学术界对青年运动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但问题在于，“青年”（Jugend）与“大学生”（Student）并非同义词，而早期的青年运动史或者社团史学是以某个社团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不能全面地反映大学生的特征。再例如，德国的高校发展可以追溯至中世纪，而且高校史研究在德国史学界是优势领域。但高校史往往关注的是高等教

育的哲学理念、高校发展过程、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等，大学生在其中充当的是配角，史学家是以他们为晴雨表来反映高校发展的成败得失。至于大学生的所感所想并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样，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往往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教育改革家、教授、科学家等。但作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大学生则成为失语者，淹没在学术话语的汪洋大海之中。从德语中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用词上就能反映这点。“Intellektuelle”一般意义上指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人，不包括大学生，而“Akademiker”才指一般大学生。

然而，长期以来，在德国史学界，专门以大学生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大学生史却处于某种从属地位，例如，与上述的青年运动史、社团史、高校史、知识分子史、科技史、教育史，甚至政治经济史等错综复杂地交杂在一起，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分支，更谈不上某个历史流派。虽然间或有历史学家振臂高呼一下，但也难以引起学界重视，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当然，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料所限。大学生及其社团的出版物、档案要么年久失传，要么因为战争散失殆尽，要么七零八碎地分散在各个高校和机构中，不集中不统一，而 20 世纪上半叶变幻莫测的德国政局使政府也无暇顾及学术发展，这也成为大学生史研究的实际困难。所以，大学生史一直是德国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局势的逐渐稳定，为科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条件。但此时，科学研究的兴趣还是集中在政治、经济、独裁等问题的探讨上。有关魏玛共和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研究更处于边缘状态。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状况才出现转变的契机，在世界风起云涌的大学生运动浪潮下，西德的大学生运动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政治态度的兴趣。此时，关于如何维护民主制度稳定的问题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与民主或独裁制度的关系成为焦点。有人甚至认为，早在 1933 年之前，大学生就成功颠覆了一个民主国家，因为这个民

主制国家既没有对大学生进行成功的民主政治教育，也没有防微杜渐，及早控制大学生的右倾动向，更没有使用有效手段防止大学生导向纳粹。<sup>①</sup>虽然这种观点表达了某种偏见，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作为社会的批评力量，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观点也间接地指责了自由国家的懦弱。德意志第一个民主政体十分缺乏民主主义者，它不仅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而且是一个建立在旧帝国体制上的傀儡。年轻的一代毫无诚意地“屈就”于民主政体。为了使他们认识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它需要第三帝国带来的灾难使大学生觉醒，使他们认识到，建立在自由宪法基础上的独立大学教育和自由科学研究的可贵。因此，魏玛时期塑造了大学生人格和政治倾向的大学体制、教育改革、学术研究都需要细致考察，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日常生活、人生前景和政治态度有必要重新定义、评价。大学生的历史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史学研究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何大学生史应该且有必要成为史学家情有独钟的领域呢？首先，大学生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文化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相对单一的群体。其次，学生时代也是青年人人生中一段比较固定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当中，他们耳濡目染了对其日后影响深远的大学生群体意识，而且他们的人员成分和生活较单纯，与其他社会阶层瓜葛少，较少被家庭琐事纠缠。再次，在德国独特的科学体制和研究型学科体制下，德国大学生形成了高度的独立性以及自由的思维方式，不墨守成规。这种特点增强了他们在职业上、社会上以及经济上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此外，大学生还未完全进入社会，因此也具有强烈的不妥协性。所以，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理念倾向于严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大学生视自身为精英，而且在公众眼中，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一方面，这种自我高估对于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是“绝对必要的自我认知”。但是也因此产生了

---

<sup>①</sup> Wolfgang Zorn, *Student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5, No. 1, *Generations in Conflict*, 1970, p. 143.

“社会变革的地震效应”<sup>①</sup>；另一方面，大学生社团也引领了德国政治文化的走向，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并与种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组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还在于，处于这个人生阶段的年轻人往往是靠感性来判断世界的。与其他的党派、社会团体不同的是，他们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于共同的经济或者社会利益，而是来自于理想的感召和对正义公平的追求，所以大学生的志同道合具有很强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他们与社会暂时处于脱节的状态，因此政治理想和理念都显得崇高而严肃，缺乏妥协精神。魏玛时期的大学生不是反抗上一代的压迫与统治，不是反对父权制，而是向往“美好的旧时光”，希望回到其祖父辈的俾斯麦时代。他们通过政治诉求来表达反抗，这也是大学生首次将参与政治作为斗争手段，将反抗作为他们一种表达不满的权力，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学生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90年代东西德国的分裂局面结束之后，德国国家档案馆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但是，相比起德国史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而言，大学生史仍是新生儿。史学家们也处在摸索阶段。这个时期，研究魏玛时代大学生作品的突出缺点是：结论往往是先验性的，并且论据不充分。例如，将魏玛时代看作第三帝国的序幕，将大学生倒向纳粹视为宿命，还围绕着纳粹上台与对青年人的控制问题而展开，而没有将魏玛时期看作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时期。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开放，大学生史的研究步入了新阶段。德国的史学工作者开始从宏观走向微观，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能够掌握某个社团详尽的史料，或者掌握某个地域、高校的大学生在魏玛时期的具体活动。所以，微观研究作品层出不穷，而且在原始材料上挖掘深刻。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从宏观领域、多角度对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的总体把握，而且，某一社团与高校的状况是否能够成为魏玛时代大学生的突出代表呢？这个问题尚待史

---

<sup>①</sup>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C. H. Beck, München, 1990, S. 581.

学家作答。因此，魏玛时期的大学生史研究尚存足够的拓展空间。

另外，随着史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历史学也开始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史、艺术史、新闻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求更客观地反映历史原貌。其中，政治文化史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兴趣的热点，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软因素——如文化背景、心态、政治模式——如今越来越被描绘为导致社会变革的硬因素。因为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无论社会动荡还是经济波动，局势的走向都与人们感知、认识和解释事件的方式与方法息息相关。因此，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研究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大学生，从而进一步反映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整体风貌，已经成为德国史学研究的前沿地带之一。例如，如何从“政治美学”、“文化符号”等这些现代观念解释大学生的政治动向，而不是先验性地给他们戴上右翼分子储备力量的帽子。因此，学者们倘若仅仅从社团活动入手来研究大学生，这样就显得单薄而没有说服力，所以，还需要先从社会功能上阐述大学生的作用和意义，然后与魏玛时期的政治文化相结合，以此来反映整个时代精神。

而且，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是具有研究上的可操作性的。虽然细化研究是一种趋势，但这样也难免会导致窥一斑难见全豹的错误。而且，作为一个国外的学者，若想详尽掌握某一团体、地区或者高校的档案材料、清楚辨认并准确理解也有一定难度。但可以从广泛收集的各社团、各地区或者各高校的材料中总结出魏玛时期大学生的总体趋向。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突出魏玛共和国的时代特征，将其看作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而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延续或者“第三帝国”的前身。同样，本书也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看作一个具有自身鲜明文化特征和政治态度的整体，突出历史进程中“人”的因素，尤其是这些长期没有历史话语权的“小人物”，他们的所感所想，他们的心理状态，以求从他们身上来反映整个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

最后，本书试图与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现实联系在一起。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到来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和忧虑。当

精英教育的模式被打破，具有滞后性的社会制度是否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它呢？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如今的大学生就业难、蚁族等社会问题，中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本书希望通过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研究，深入了解大学生的心理思想行为模式，来类比当今中国存在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为我国文化领域的建设和新青年的培养提供参考。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研究，长期主导着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方向，取得了丰富和深入的成果。但是局限于传统经济史和政治史难免会犯历史研究的偏食错误。如前文所述，魏玛共和国时代大学生史的研究就是一个值得学者潜心钻研的领域。

魏玛时代大学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世界大学生运动的浪潮下，史学家们试图分析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倒向纳粹的原因，找出治理青年社会危机和拯救民主制度的良方。但由于当时绝大部分大学生社团的档案还未解密，所以大多数研究是以大学生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总体而言缺乏专门研究某个大学生社团的作品。

1961 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尼培代 (Thomas Nipperdey) 以其敏锐的历史嗅觉，首先撰写了研究魏玛共和国初期大学生发展状况的文章《魏玛共和国初期德意志大学生》。<sup>①</sup>该文研究了魏玛时代高校政治中的重要事件，如持续到 1927 年所谓的“普鲁士宪法之争”。但是，此时，尼培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乃是“旧史新说”，在新史料尚不丰富的情况下，利用以前的旧史料提出新的

---

<sup>①</sup> Thomas Nipperdey,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dolf Grimme (Hg.), *Kulturverwaltung der zwanziger Jahre. Alte Dokumente und neue Beiträge*, W. Kohlhammer, Stuttgart, 1961, S. 19-48.

史学见解。三年后，阿道夫·赖森(Adolf Leisen)的博士论文讨论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大学生的政治作用，但他使用的原始资料也较为单薄。<sup>①</sup>1965年，沃尔夫冈·左恩(Wolfgang Zorn)首次从社会历史层面对魏玛时期大学生的政治发展进行了透视。<sup>②</sup>1967年，记者出身的汉斯-彼得·布吕尔(Hans Peter Bleuel)和恩斯特·克里讷特(Ernst Klinnert)合作撰写的《德国大学生走向第三帝国之路》研究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心理、社会活动和变化，揭示了他们投入纳粹怀抱的动机。<sup>③</sup>但缺点是“按图索骥”，将大学生走向纳粹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另外，他们写作得比较匆忙，略显粗糙，过于侧重具体事件的描述，缺乏对这条“道路”细致而具有说服力的分析。

迫于资料限制，史学家无法从档案入手对大学生展开深入研究，这成为阻碍大学生史研究向前发展的最大难题。就在这时，对大学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机构——高校学研究中心(Institut für Hochschulkunde)——在维尔茨堡成立了。该中心是当时唯一保存了20世纪20—30年代丰富的大学生社团原始档案的机构。

在它的基础上，1969年，世界上首篇从一手档案出发研究“纳粹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简称NSDStB)的博士论文在美国诞生了——《纳粹大学生联盟史》。<sup>④</sup>这篇论文使用了详尽的原始材料、写作非常严密，但缺点是选取的时

---

<sup>①</sup> Adolf Leisen, *Die Ausbreitung des völkischen Gedankens in der Studenten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ss. Phil., Heidelberg, 1964.

<sup>②</sup> Wolfgang Zorn,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ums 1918-1931*, In: Kurt Stephenson u. a. (Hg.),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neunzehnten und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Bd. 5, Heidelberg, 1965, S. 223-307.

<sup>③</sup> 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up>④</sup> Ursula Ruth Brockert Dübner,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Student League*, Diss. Phil.,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9.



间段是1926—1945年，而不是严格按照“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兴起和衰落来断代的。但这篇论文的出现为大学生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即将研究的基础建立在丰富的原始史料上。

在这种新方向的指引下，很快，魏玛时期大学生研究有了新进展。1970年，沃尔夫冈·左恩(Wolfgang Zorn)发表了《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政治》一文，<sup>①</sup>简要叙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政治发展过程和与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运动的关联。但作为一篇篇幅不长的论文，文章涉及的史料有限。1971年，尤尔根·施瓦茨(Jürgen Schwarz)出版了专著《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1918—1923年的德国大学生及其政治态度》，<sup>②</sup>首次从总体角度概览了魏玛初期大学生及其面临的问题。使用的原始材料可谓广博，并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学及心理学领域。但这本专著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涉及的时段过短，只研究了1918—1923年的情况，但这段时间，正值魏玛共和国的中产阶级经济地位逐步恢复稳定的时期。因此，这部专著没有解答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的宿命问题：大学生的生存危机与孤注一掷地倒向纳粹之间的关联。同年，美国学者迈克尔·S.施坦贝格(Michael S. Steinberg)的博士论文《军刀、书籍与褐衫：德国大学生的激进化1918—1935》研究了从魏玛共和国成立到纳粹一体化运动时德国大学生的政治倾向、社团活动及一体化运动，还描写了时人的所感所想。但缺点在于过于注重叙事，忽略了分析。<sup>③</sup>

此时，一些敏锐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大学生研究需要细化的问题，大学生思想较活跃，需要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他们。但在社团

<sup>①</sup> Wolfgang Zorn, *Student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5, No. 1, *Generations in Conflict*(1970), pp. 128-143.

<sup>②</sup> Jürgen Schwarz, *Studen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23 und ihre Stellung zur Politik*,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1.

<sup>③</sup> Michael S. Steinberg, *Sabres, Books and Brown Shirts.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German Student 1918-1935*, Diss. Phil.,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1.

资料尚不丰富的情况下，地域研究就成为更好的切入点。首先以地域个案为研究对象的是爱尔兰根大学的曼弗雷德·弗兰茨(Manfred Franz)，1972年，他以爱尔兰根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为着眼点进行了个案研究：《爱尔兰根大学生1918—1945》。<sup>①</sup>但问题在于，爱尔兰根大学的特点是否能代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情况？遗憾的是，弗兰茨没有对这一问题作答。

这一问题同样也存在于沃尔夫冈·克罗伊茨贝格(Wolfgang Kreutzberger)对弗莱堡大学学生的研究中：《大学生与政治1918—1933：布赖斯高的弗莱堡大学个案研究》。<sup>②</sup>但是，此论文分析法运用得很充分——如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思维——以至于他的论文成为20世纪70年代魏玛时代大学生研究中的两个翘楚之一。

另一部领军之作则是慕尼黑大学安塞姆·福斯特(Anselm Faust)197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纳粹大学生联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与纳粹主义》<sup>③</sup>其研究对象是1926—1933年的“纳粹大学生联盟”。福斯特进行了跨地域研究，他的着眼点不是偏重描述一系列大学生的活动和事件，而是成功地将纳粹大学生团体、地方及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纳粹党和未加入社团的自由大学生融入进文章中。他的这篇论文至今仍是将统计学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一篇佳作。这是大学生研究史上首次将“纳粹大学生联盟”作为纳粹党的下属机构进行研究的文章，细致分析了它的功能，对其活动做了立体化描写。此外，福斯特对“纳粹大学生联盟”与普通大学生的关系也做了明确阐述：从社会类型而言，纳粹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之间不存在明显区分。但因为资料的开放程度有限，该文没有对魏玛时期社会经济

<sup>①</sup> Manfred Franz, *Die Erlanger Studentenschaft 1918-1945*, Würzburg, 1972.

<sup>②</sup> Wolfgang Kreutzberger, *Studenten und Politik 1918-1933. Der Fall Freiburg im Breisgau*,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1972.

<sup>③</sup> Anselm Fau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ädagogischer Verlag Schwann, Düsseldorf, 1973.

的复杂背景及大学生与纳粹团体的相互影响做进一步探索。

此外，研究大学生的生存困境及右倾激进运动，还需要详细分析与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或社会群体。1975年，米歇尔·H. 卡特(Michael H. Kater)出版了《1918—1933 德国大学生与右翼极端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教育危机的社会史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从大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磨合失败、大学生的社会分层、生存危机和思想危机等方面分析了魏玛时代导致大学生投入纳粹的社会—经济因素。<sup>①</sup>卡特的中心观点是，魏玛时代，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是导致大学生最终走向右翼极端主义的诱因。他的独特之处在于，用犀利的文笔描写了1923年末至1929年初魏玛“金色的20年代”时期大学生如何利用共和国给予他们的生存优势。但不足之处是原始材料的运用上需要进一步补充，尤其是在对魏玛时代教育的分析中，忽略了具有重要地位的高校政策。有些材料的运用上也不够精确。

魏玛时代大学生倒向纳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途无望”。其实，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德国的知识群体就存在“过剩”的现象。到了魏玛时代，在内忧外困的局势下，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更加重了他们对共和制的不满，加之社会舆论的大肆宣扬，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体制问题，导致大学生投入纳粹运动来捍卫自己最后的精英地位。有关魏玛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大学生就业前景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莫里斯·贝图(Morris Beatus)的博士论文《知识无产者：魏玛共和国时期知识行业的超员问题》对其做了探讨。<sup>②</sup>贝图使用了大量的期刊、杂志作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图表也较为丰富，最后指出大学生的超员问题实际是一个伪命题，是在舆论的宣传下成为社会问题的，实则没有那么严重。文章不足之处在于侧重

---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up>②</sup> Morris Beatus, *Academic proletariat. the problem of overcrowding in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1918-1933*, Diss. Phi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5.

于数据分析，缺乏对魏玛时代的教育改革、政治特色和大学生的心理活动的分析研究。

7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生运动的退潮，对魏玛时代大学生史的研究又进入了瓶颈期。作品的数量不够丰富，在研究内容上没有大的突破。这个时期可以看作大学生史研究为“更上一层楼”的酝酿时期。

为了促进大学生史的研究，增强原始档案的利用率，维尔茨堡“高校学研究中心”又一马当先做出了表率。1982年，它主编出版了论文集《1582—1982 维尔茨堡大学生及传统大学生社团》。<sup>①</sup>这一举动为大学生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微观化、地域化，详细研究某个高校、某个社团。其中收录的瓦尔特·M. 布罗德(Walter M. Brod)撰写的《19—20世纪维尔茨堡的传统大学生社团》就是以魏玛共和国时代为背景的。<sup>②</sup>虽然高校研究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但其他大学生团体的资料还未整理开放，因此这一倡议式举动没有引起学界的集体响应。

在摸索中前进的大学生史研究也开始借助当时先进的研究方法——心理分析学。1985年，美国心态史学家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的《解码历史：心态史》首次用心理学分析阐述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渊源。<sup>③</sup>但最大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方法论上。心理分析法没有建立在坚实的档案文件的基础上，难以把握客观评判标准。学界争议最大之处集中于纯心理分析是否能称为可信度较高的历史学著作。

---

<sup>①</sup> Institut für Hochschulkunde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Hg.), *1582-1982. Studentenschaft und Korporationswesen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Würzburg, 1982.

<sup>②</sup> Walter M. Brod, *Das Korporationswesen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Institut für Hochschulkunde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Hg.), *1582-1982. Studentenschaft und Korporationswesen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Würzburg, 1982, S. 75-79.

<sup>③</sup> Peter Loewenberg, *Decoding the past: the psychohistorical approa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东欧剧变,东、西德国实现统一,苏联将许多珍贵的档案文件交还给德国政府管理。从这时起,之前由“高校学研究中心”开启的新研究方式得以发展,学者们开始细致研究大学生及其活动,带动大学生史进入了欣欣向荣的阶段。魏玛时代大学生史的研究题材也因此变得更加广泛,内容更加细化,从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将大学生社团作为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关注某个地方、某个高校、某个社团,甚至是社团的某项活动。在研究方法上也推陈出新,跨学科、多领域研究成为突出特点。

其实,与德国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密不可分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社团。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史就是一部大学生社团史。因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高校、社团与大学生三者在功能和内容上早已交织成一种轨迹。正如因斯布鲁克的史学家里尼·米歇尔·盖勒(Linie Michael Gehler)强调的那样:“大学生史首先是一部大学生社团(Korporation)史”。<sup>①</sup>对于经历了漫长的、邦国林立历史的德国人而言,大学生正是从结社生活中才吮吸了民族共同体、国家等概念的初乳。<sup>②</sup>据统计,大约有70%的大学生都是大学生社团的成员。加入某个社团是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认同,他们能从社团生活中找到一种归属感。社团也因此成为一种教育手段,填补了学术矫正力量的空白,在其团体内部的“性格培养”的框架下,能够完善大学的“科学—职业”教育功能,同时,也具备“为德国社会的上等

---

<sup>①</sup> Lönnecker, Das studentische Weltbild im 20. Jahrhundert, In: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116/1(2001), S. 29.

<sup>②</sup> 在德语中,对所有大学生社团有一个特定的称谓:Korporation,有译法为“大学生联合会”,但本书认为译为“传统大学生社团”更加贴切。它是一种大学生自治组织,不受国家机构约束。其中最大的分支是大学男生联合会(Burschenschaft),成员均为在校大学生,具有军事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内部流行击剑决斗,其下亦包括奉行不同理念的派别。除了Burschenschaft外,传统大学生社团还包括宗教倾向的团体——如天主教德国大学生社团联盟(Cartellverbands kathol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verbindungen)、歌咏协会(Sängerschaft)、军事团体(Corps)、体操协会(Turnerschaft)、同乡会(Landsmannschaft)等。

阶层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的功能。简而言之，大学教育人，社团培养人。大学生社团不仅种类多，成员众，而且在高校中权利最大、影响最广泛、政治最活跃。剩下大约 1/3 没有加入社团的大学生，常常听从于“大学生代表团”(Studentischen Vertretungen)、“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llgemeinen Studentenausschüssen，简称 AStA)和“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简称 DSt)的指挥。通过研究这三个团体的政治态度，能够基本反映非社团大学生的政治倾向。魏玛时代各个党团在高校中也建立分部，吸收有生力量，但最多仅有 5%左右的在校大学生加入了这些分部，因此，他们的态度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研究大学生社团已成为大学生史研究不容置疑的手段。

在研究新环境、新起点的带动下，1992 年，路德维希·艾尔姆(Ludwig Elm)、迪特里西·海德(Dietrich Heither)和杰哈德·舍费尔(Gerhard Schäfer)出版了论文集《新人、老成员与长老：从瓦尔特堡集会至今的传统大学生社团》，<sup>①</sup>以通史的形式为读者展现了传统大学生社团的发展历程。从其发轫期一直论述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同年，海克·施特吕勒-比勒(Heike Ströle-Bühler)从大量的出版物入手撰写了《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反犹主义：大学男生联合会刊物分析 1918—1933》<sup>②</sup>，该书分析了大学男生联合会的出版物，从中找出他们反犹主义的思想动向和舆论作用。1996 年，迪特里西·海德与杰哈德·舍费尔合作撰写了论文《保守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之间的大学生社团》，<sup>③</sup>论述了大学生从保守主义向右翼极端主

<sup>①</sup> Ludwig Elm, Dietrich Heither & Gerhard Schäfer, *Füxe, Burschen, Alte Herren. Studentische Korporationen vom Wartburgfest bis heute*, PapyRossa Verlag, Köln, 1992.

<sup>②</sup> Heike Ströle-Bühler, *Studentischer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Analyse der Burschenschaftlichen Blätter 1918 bis 1933*, Peter Lang, Frankfurt a. M., 1991.

<sup>③</sup> Dietrich Heither & Gerhard Schäfer, *Studentenverbindungen zwischen Konservatismus und Rechtsextremismus*, In: Jens Mecklenburg (Hg.), *Handbuch deutscher Rechtsextremismus*, Elefanten Press, Berlin, 1996, S. 865-884.

义的转变，对于研究大学生走向纳粹的思想过程很有帮助。

研究德意志帝国时代与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和社团的论文集，首推哈姆-欣里希·勃兰特(Harm-Hinrich Brandt)和马蒂亚斯·斯蒂克勒(Matthias Stickler)合作出版的论文特刊《传统大学生社团的历史与现状》。<sup>①</sup>其中，大学生史研究名家康拉德·H. 雅豪斯(Konrad H. Jarausch)撰写了《帝国时代的传统大学生社团》(*Korporationen im Kaiserreich*)一文。出版者之一斯蒂克勒撰写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生社团史》(*Geschichte der studentischen Verbind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一文。他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在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背景下，将批判性的历史反思与德国大学生社团当今的意义和地位的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sup>②</sup>这个倡议取得了广泛成功，如，希尔克·穆勒(Silke Möller)比较了加入社团的大学生和未加入的大学生，她的博士论文从大量原始材料——个人传记——入手，指出大学生史首先是一部社团史，大学时代是塑造人生的阶段。<sup>③</sup>

随着材料的丰富，学者们研究的群体更加具体，出现了很多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比如，赖讷·泊平黑格(Rainer Pöppinghege)的《拒绝共和国：威斯特法伦明斯特威廉大学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以明斯特大学生为对象，考察了他们背叛共和国的原因。<sup>④</sup>波利特·波尔

---

① Harm-Hinrich Brandt & Matthias Stickler,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swesens*, Würzburg, 1998.

② Matthias Stickler, *Neuerscheinungen zur Studentengeschichte seit 1994. Ein Forschungsbericht über ein bisweilen unterschätztes Arbeitsfeld der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In: Rüdiger vom Bruch, *Jahrbuch für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Bd. 4, Stuttgart, 2001, S. 268.

③ Silke Möller, *Studienzeit als Prägende lebensphase: Organisierte und nichtorganisierte Studenten im Kaiserreich*, In: Harm-Hinrich Brandt, Matthias Stickler (Hg.),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swesens*, Würzburg, 1998, S. 405-420.

④ Rainer Pöppinghege, *Absage an die Republik. Das politische Verhalten der Studentenschaft der Westfälischen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1918-1935*, Agenda Verlag, Münster, 1994.

(Birgit Pohl)的文章《魏玛共和国时期布伦瑞克技术高校的大学生》研究了魏玛时期布伦瑞克技术高校的在校大学生的政治和社团发展。<sup>①</sup>洛夫-约阿希姆·鲍姆(Rolf-Joachim Baum)出版的文集《“做男人、去战斗!”德国大学生军团:1848年至今》叙述了德国大学生军团的发展历程。<sup>②</sup>波恩哈德·格林(Bernhard Grün)的《战争间期的维尔茨堡大学生》分析了从一战到二战期间维尔茨堡大学生思想态度的变化。<sup>③</sup>芬尼亚·布里特·曼(Fenja Britt Men)以汉堡大学生为对象,研究了他们在魏玛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sup>④</sup>霍尔格·齐恩(Holger Zinn)的专著《摇摆于共和与专制之间:马尔堡大学生1925—1945》选取马尔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sup>⑤</sup>

大学生社团为魏玛国家议院培养了大量的议员,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002年,托马斯·默戈(Thomas Mergel)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他的波鸿-鲁尔大学执教资格论文《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文化:国家议会中政治联系、象征性政治和公众》考察了议会和议员的工作方法和日常事务与多种大学生团体。<sup>⑥</sup>最后,他得

---

① Birgit Pohl, *Die Studierenden der Technischen Hochschule Braunschwei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Walter Kertz (Hg.),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raunschweig. Vom Collegium Carolinum zu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Hildesheim/Zürich/New York, 1995, S. 389-413.

② Rolf-Joachim Baum (Hg.), „*Wir wollen Männer, wir wollen Taten!*“ *Deutsche Corpsstudenten 1848 bis heute*, 1. Aufl., Siedler Verlag, Berlin, 1998.

③ Bernhard Grün, *Die Würzburger Studentenschaft zwischen den Kriegen*, In: Peter A. Süß (Hg.), *Zwischen Korporation und Konfrontation. Beiträge zur Würzburger Universitäts- und Studentengeschichte*, SH Verlag, Köln, 1999, S. 141-207.

④ Fenja Britt Men, *Not der geistigen Arbeiter. Die soziale und wirtschaftliche Lage von Studierend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 Beispiel Hamburgs*, SH Verlag, Köln, 2001.

⑤ Holger Zinn, *Zwischen Republik und Diktatur. Die Studentenschaft der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in den Jahren von 1925 bis 1945*, SH Verlag, Köln, 2002.

⑥ Thomas Mergel, *Parlamentar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Symbolische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m Reichstag*, Droste Verlag, Düsseldorf, 2002.



出结论，日常的政务讨论促进了党团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打破了党团之间的界限。由于党团中的议员大多出身于各种学生社团，所以学生社团之间也通过这种方式打破了相互间的生疏。默戈自己也对这一独特的“议会党团间的推杯换盏”（interfraktionellen Bierabenden）现象感到惊异。但是，至于大学生社团的传统在促进议会统一方面的作用，作者没有解释。米歇尔·维尔特（Michael Wildt）出版的论文集《盲目的一代：国家安全局领导团》对一些重要的大学生社团做了横向比较。<sup>①</sup>

大学生及其组织既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史料的拣选与阅读问题。为此，哈拉德·吕耐克（Harald Lönnecker）专门为此撰文——《帝国时代与魏玛共和国时代传统大学生社团史原始资料及研究状况》，列举并分析了德意志帝国时代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社团史的资料状况和研究状况。<sup>②</sup>

近年来出版的大部分有关第三帝国时期高校史的研究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魏玛共和国时代。大多数学者都将魏玛时代看作纳粹时代的序曲，强调了其连续性。例如，米歇尔·格吕特讷（Michael Grüttner）的《第三帝国的大学生》第一章整篇用来总结描述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发展。<sup>③</sup>海德·曼（Haide Mann）则关注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纳粹女大学生。<sup>④</sup>柏林技术高校

<sup>①</sup>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r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IS Verlag, Hamburg, 2002.

<sup>②</sup> Harald Lönnecker,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Korporationen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Archiv- und Literaturbericht*, In: Matthias Steibach & Stefan Gerber (Hg.), „Klassische Universität“ und „akademische Provinz“, *Studien zur Universität Jena von der Mitte des 19. bis in die dreißiger Jahre des 20. Jahrhunderts*, Verlag Dr. Bussert & Stadel, Jena Quedlinburg, 2005.

<sup>③</sup> 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1995.

<sup>④</sup> Haide Mann, *Frauen fü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tudentinnen und Akademikerin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Dritten Reich*, Leske & Budrich, Opladen, 1997.

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韦伯曼(Wolfgang Wippermann)自己就是两个学生社团的成员,他在《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学生社团与纳粹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大学生是)行动者还是牺牲品?”<sup>①</sup>这一尖刻论点至今仍是反大学生社团理论所信奉的教条。但后来格吕特讷批判了韦伯曼这一论点,认为他对纳粹前后社团大学生活动的论述缺乏坚实依据。研究第三帝国时期的高校个案作品也涉及魏玛共和国时代。例如,蒂亚斯·韦本(Matthias Wieben)对第三帝国时期的克里斯蒂安-阿尔布莱希特大学的研究。<sup>②</sup>汉斯-保罗·赫夫讷(Hans-Paul Höpfner)对第三帝国时期波恩大学的研究。<sup>③</sup>海里克·艾伯勒(Heirik Eberle)对纳粹时代的马丁-路德大学的研究。<sup>④</sup>乌尔里希·卡克曼(Ulrich Kalkmann)对第三帝国时期亚琛技术高校的研究。<sup>⑤</sup>最后,克里斯蒂安·梯里茨其斯的专著《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大学哲学》点评了大学生史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成果,如马克思·温特(Max Wundt)、西奥多·里特(Theodor Litt)和菲利克斯·克鲁格(Felix Krüger)等。<sup>⑥</sup>

随着大学生社团研究的不断系统化,为了方便学者们查找核对,一些词典也相继出版。首先值得推荐的是由黑尔格·德沃拉克

<sup>①</sup> Wolfgang Wippermann, *Täter oder Opfer? Die Corps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im Urteil der Historiker*, In: Rosco. G. S. Weber, *Die deutschen Corps im Dritten Reich*, SH Verlag, Köln, 1998.

<sup>②</sup> Matthias Wieben, *Studenten der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Kiel) im Dritten Reich. Zum Verhaltensmuster der Studenten in den ersten Herrschaftsjah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Peter Lang, Frankfurt a. M./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 1994.

<sup>③</sup> Hans-Paul Höpfner, *Die Universität Bonn im Dritten Reich. Akademische Biographi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Bouvier, Bonn, 1999.

<sup>④</sup> Heirik Eberle, *Die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5*, Mitteldeutscher Verlag, Halle, 2002.

<sup>⑤</sup> Ulrich Kalkmann, *Die Technische Hochschule Aache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Diss. Phil., Aachen, 2003.

<sup>⑥</sup> Christian Tilitzkis,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sphilosoph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Dritten Reich*, Akademie Verlag, Berlin, 2002.

(Helge Dvorak) 主管的大学生社团史学研究协会 (Gesellschaft für burschenschaftliche Geschichtsforschung) 出版的《德国大学生社团传记词典》，迄今已出版了 5 卷，但全部是关于活跃在政坛的大学男生联合会成员的。<sup>①</sup> 稍逊一筹的有《德意志天主教大学生联盟传记词典》(Katellverband kathol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vereine, 简称 KV)。<sup>②</sup> “德意志天主教大学生联盟”是魏玛共和国及前民主德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团体，为中央党培养了大量党员。1997 年，齐格弗里德·施魏克-茅科 (Siegfried Schieweck-Mauk) 编纂了《CV 及 ÖCV 词典》<sup>③</sup>。长期以来，列举所有的大学生联合名录的词典还是学术空白。2000 年，同乡会会员哈特穆特·H. 杰斯 (Hartmut H. Jess) 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苦心整理十多年，发行了 CD 光盘《社团词典》。<sup>④</sup>

在蓬勃发展的大学社团史研究中，有一个领域长期没有引起学者重视，这个领域就是大学男生联合会 (Burschenschaft)，它是大学生社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还没有史学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领域，仅是在研究大学生史的时候才顺便提及。然而，大学男生联合会的史学价值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的，早在 1930 年，在波恩召开的大学生史学家大会上，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编外讲师库尔特·兰道夫 (Kurt Rheindorff)，在论述“大学生史学研究中的问

① *Biographische Lexikon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Bd. I: Politiker, Teilbd. 1: A-E, Heidelberg, 1996, Teilbd. 2: F-H, Heidelberg, 1998, Teilbd. 3: I-L, Heidelberg, 1999, Teilbd. 4: M-Q, Heidelberg, 2000, Teilbd. 5: R-S, Heidelberg, 2002.

② Siegfried Koß&Wolfgang Löhr, *Biographisches Lexikon des KV*, Schernfeld; Vierow bei Greifswald, Köln, 1991-2000.

③ Siegfried Schieweck-Mauk, *Lexikon der CV-und ÖCV-Verbindungen. Die Korporationen und Vereinigungen des Cartellverbandes der Kathol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verbindungen (CV) und des Cartellverbandes der katholischen österreichischen Studentenverbindungen (ÖCV) in geschichtlichen Kurzdarstellungen*, Vierow bei Greifswald, Köln, 1997.

④ Hartmut H. Jess, *Specimen Corporationum Cognitarum 2000. Das Lexikon der Verbindungen (CD)*, SH Verlag, Köln, 2000.

题”和“将大学生史与总体政治史和当代思想史相结合”时，就首次提出应重视大学男生联合会的研究，<sup>①</sup>但这个提议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直到1997年，新史学学家赖讷·A. 米勒(Reiner A. Müller)在维尔茨堡大会上重申了这一原则：“本次大会旨在纠正需要明察的缺陷，科学与研究的主题不能再局限于之前的烟袋锅或者社团的花体铭文之上……而是要深入探讨大学生在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史当中的作用。”<sup>②</sup>甚至有学者指出，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文化传统正是德意志视为精髓的民族特色，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他们的击剑决斗传统，这种年轻时代就得到充分培养和激发的好战性，也许正是导致德意志民族在危急时刻用战争暴力解决问题的深层缘由。

在这种宗旨的指引下，先后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海德(D. Heither)、盖勒(M. Gehler)、库特(A. Kurth)和舍费尔(Schäfer)合作撰写的《鲜血与决斗场：大学男生联合会史》描述了大学男生联合会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的发展概况。<sup>③</sup>尤尔根·克鲁斯特鲁伊斯(Jürgen Kloosterhuis)的《新普鲁士的决斗》研究了150年间(1849—1999年)的1912次决斗，以大学生的击剑格斗的发展反映了大学男生联合会同大学生之间的密切关联；击剑运动对高校学生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该著作运用普鲁士的绝密文化档案和弗莱堡的新普鲁士同乡会的长老会(*Alten Herrn der Landsmannschaft Neoborussia Halle zu Freiburg*)的档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sup>④</sup>研究魏玛时代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当属美因茨大学的赫尔玛·布伦克(Helma Brunck)，她的论文详细考

① Kurt Rheindorff, *Deutsche Corpszeitung*, 47/7(1930), S. 208-212.

② Harm-Hinrich Brandt & Matthias Sticker (Hg.),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swesens*, Würzburg, 1998, S. 55.

③ D. Heither, M. Gehler, A. Kurth & G. Schäfer, *Blut und Paukboden. Eine Geschichte der Burschenschaften*, Geschichte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97.

④ Jürgen Kloosterhuis, *Neupreußen-Mensuren 1849-1999. Festgabe zum 150. Stiftungsfest der Landsmannschaft im Coburger Covent Neoborussia Halle zu Freiburg*, Berlin, 1999.

察了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 简称DB)的发展状况。<sup>①</sup>

大学男生联合会研究集大成者当推哈拉德·吕耐克,他是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的主任。他利用大量的一手档案,对大学男生联合会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还编写了《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统一之路概述与原始资料集》的第18卷——《大学男生联合会史协会与大学男生联合会研究协会,个人、制度与科学史》。<sup>②</sup>该书对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情况做了简单概括,详细列举了各种课题所需要的资料档案。吕耐克还擅长就某个专题进行细致研究,他有不少文章涉及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大学男生联合会。例如,《魏玛共和国时期莱比锡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武术团》以莱比锡大学为个案,考察了大学男生联合会的习武传统。<sup>③</sup>《文化符号、社会标准与民族象征之间的大学生歌咏协会的击剑决斗1918—1926》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击剑决斗对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文化地位与社会意义。<sup>④</sup>《大学男生联合会与德语1815—1935》分析了从拿破仑战争到纳粹一体化运动时

---

① Helma Brunck,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Analyse.* Diss. Phil., Mainz, 1996. Als Druck, *Di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iversitas, München, 1999.

② Harald Lönnecker, „Das Thema war und blieb ohne Parallel-Erschein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forschung“, *Die Burschenschaftliche Historische Kommission (BHK) und die Gesellschaft für burschenschaftliche Geschichtsforschung e. V. (GfbG) (1898/1909-2009): Eine Personen-, Institutions-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neunzehnten und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Bd. 18, Universitätsverlag, Heidelberg, 2009.

③ Harald Lönnecker, *Der burschenschaftliche Waffenring Leipzi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ipzig, 2003.

④ Harald Lönnecker, *Die Mensur bei den akademischen Sängerschaften zwischen kulturellem Markenzeichen, sozialem Kriterium und nationalem Symbol (1918-1926)*, In: *Einst und Jetzt*, Sonderdruck, 2005.

期，德语对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和强化的作用。<sup>①</sup>2007年5月10日他在斯图加特大学发表了题为《练胆量与教育方式、仪式与男儿气概幻想：1815—1970年德国的击剑决斗历史概述》<sup>②</sup>的演讲。另外，文章《大学男生联合会名单：了解德国政治和思想史的重要途径——德国大学男生联合会名册的产生与发展》论述了大学男生联合会会员制度的发展史。<sup>③</sup>

最后，政治文化研究在近些年来不再是政治学研究的专利，而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宠。大学生史的研究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吸收新方法、开辟新路径。在德国，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用政治文化分析的方法重新透视魏玛时期的大学生，观察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表达方式对共和制度的影响。例如，魏玛史专家沃夫哈姆·皮塔(Wolfram Pyta)在新作《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文化与传媒》的前言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概念渐入人心，这个概念是由战壕里产生的“行动共同体”(Tatgemeinschaft)演变而来，“前线青年”由此取代了旧的军事精英，成为新型领袖代表。希特勒正是通过化装成一位行动代表并抓住了政治行动主义概念，才赢得了大学生对元首的期待，这为大学生最终走向纳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类行为学解析。<sup>④</sup>

<sup>①</sup> Harald Lönnecke, *Burschenschaft und deutsche Sprache 1815-1935*, Frankfurt a. M., 2005.

<sup>②</sup> Harald Lönnecke, *Zwischen Mutprobe und Erziehungsmittel, Ritual und Männlichkeitswahn: Ein Streifzug durch die Historie der Mensur in Deutschland 1815-1970*. Vortrag, gehalten am 10. Mai 2007 in der Universität Stuttgart, Historischen Institut, Abteilung Neuerer Geschichte.

<sup>③</sup> Harald Lönnecke, *Die Burschenschaftlerlisten, eines der wichtigsten Hilfsmittel für die Kenntnis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und Geistesgeschichte-Zur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s Gesamtverzeichnis deutscher Burschenschaftler*, Koblenz, 2009.

<sup>④</sup> Ute Daniel, Inge Marszolek, Wolfram Pyta, Thomas Welskopp, *Politische Kultur und Medienwirklichkeiten in den 1920er Jahren*, R. 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10.

纵观魏玛时代大学生史研究动向，可以看出，研究在不断细化，但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难以从全局上对大学生和魏玛时代的政治文化做出总体评判，有的学者甚至只是一味地堆砌原始资料，单纯地进行叙事。这种研究方法既没有对史实进行高屋建瓴似的总结，也没有指出对当今现实的作用，这就脱离了大学生研究的意义，违背了史学研究的初衷。因此，大学生史的研究有必要再从微观透视宏观，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进步正是史学工作的自我反省，而在新方法、新观点的指导下，研究成果也一定能有所突破。

就国内研究状况而言，凡是研究纳粹上台问题的学者，几乎都要涉及魏玛共和国的历史，然而，至今仍无人以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大学生这一重要群体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因此没有直接可参考论文或著作。这也正是笔者要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三、篇章结构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为什么大多数大学生最终会走向激进主义、非理性主义、反民主主义、反犹主义？他们背后有什么政治动机？他们本有一个由魏玛共和国提供的、在德国巩固首个民主制度的良机，是什么导致他们对这个“大好机会的时代”（Zeit der größten Möglichkeiten）熟视无睹？

本书的行文框架按照魏玛共和国政治开端、发展、结局的历史进程，除导论与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逐一分析 19 世纪以来大学生及大学生运动的发展、魏玛共和国超通胀时期大学生与新生共和国的磨合、魏玛共和国稳定的 20 年代大学生的新困惑、政治态度的变迁，以及最后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时代大学生极端主义的膨胀和走向纳粹的原因。

第一章是全书的序幕，回顾历史，探讨大学生问题的由来。德意志大学生运动发轫于 19 世纪，即拿破仑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德意志大学生第一次民族国家理念的觉醒时期，也是他们无意识的政治尝试的开始时期。本章要讨论的问题是：德意志大学生社团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19 世纪的德意志思想家对大学生保守主义、

君主制思想、反犹太主义的萌生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前线青年的一代”的政治态度有何影响？是否像以往人们先验认为的那样充满弊端？如果有积极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前线青年”是如何产生的，其历史作用何在？本章共分为三节，依次论述德意志大学生社团组织的发展史、结社生活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前线青年”。

第二章关注的是魏玛共和国超通胀时期，即1919—1923年，这一时期正是德意志大学生与新生民主制之间博弈、磨合的时期，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德意志大学生生活的多面像。在这段时间里，大学生们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震惊，到勉强接受现实，及最终积极合作的转变过程。本章关注的问题是：共和国初期的经济困境对他们造成了哪些影响？大学生如何在内部各种观念纷争中突出重围？其中又是什么力量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本章共分为四节，论述新生共和国与保守主义大学生、知识行业的超员与大学生的生存困境、大学生的精英观与军事行动的参与、“前线战士一代”与大学生的政治意识。

第三章讨论魏玛共和国所谓的“金色的20年代”时期——1924—1929年——大学生的生存状况和政治姿态。此时，美元以“道威斯计划”的名义流入德国，而魏玛德国的经济也克服了战后初期的通胀，并呈现出明显的恢复与发展倾向，民主制度在同时代政治观察家们的眼睛里似乎已趋于稳定了。那么在这个“相对稳定时期”里德国大学生的经济状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高校入学者的增长对社团组织产生了什么影响？学术行业的超员与大学生的“无产者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大学生在政治发展上出现了哪些新的倾向？本章共分为四节，论述经济上的变革与大学生的生活水平、入学者数量的变化与大学生社团的衰落、知识行业的超员与大学生的出路、大学生结构的变化与政治态度的变迁。

第四章分析世界经济大危机时代——1929—1933年——大学生与魏玛共和国的关系最终走向破裂，投入纳粹的过程。本章在此关注的问题是：在这场经济大危机中，德意志大学生未来前景怎样？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大学生中会出现反犹太主义的浪潮？大学生们



又是如何从组织上倒向纳粹主义阵营的？本章共分为四节，分别讨论大就业危机与大学生对前途的绝望、大学生与反犹浪潮的高涨、“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崛起等问题。

#### 四、译名说明

本书出现的德语人名、地名的中文翻译主要参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德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新德汉词典(修订本)》，如遇约定俗成的名称，则按照习惯处理。对于某些罕见人名，而又查阅不到者，则用相似音的汉字翻译。

首次出现的人名地名，其后用括号标出原文，再次出现时则省略。对于容易引起混淆的名称则再次标注以区分。

对于本书常出现的学术界有分歧的译名，作如下说明：

1. 大学生“团体”的各种表达方式：在德语中，有关“团体”的词汇区分得十分细致。如：“Verein”(一般团体称谓，理念来源于“结社自由”Assoziationsfreiheit)、“Vereinigung”、“Organisation”(指正式机构，理念来自于“自由劳动”freier Arbeit)、“Versammlung”(会众)、“Gesellschaft”(协会)、“Verband”、“Ring”、“Kreis”、“Bund”、“Verband”等，都有团体的意思，但意思不尽相同，由此可对德国人结社生活的爱好和历史窥见一斑。上述词汇也经常出现在大学生史研究当中，但一般是指分支性的、地方性团体。

与大学生关系最为紧密的几大全国性团体的德语名称为“Burschenschaft”，本书遵照原文意思翻译成“大学男生联合会”；“Landmannschaft”本书译为“同乡会”；“Turnerschaft”本书译为“体操协会”；“Korps”或“Corps”，本书译为“大学生军团”；“Waffenring”本书译为“武装大学生团体”。这些团体的名称都为总称，每个团体下面都有不同的地方分会，例如，“Burschenschaft”就有马尔堡(Marburg)的“Burschenschaft Alemannia”、爱尔兰根(Erlangen)的“Burschenschaft Bubenruthi”等，不一而足。

这些大学生团体大多起源于19世纪，在德语中通称为

“Korporation”，本书译为“传统大学生社团”。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Freistudenten”（意为不参加社团的自由大学生，不是团体，而是松散的群体），也区别于日后的纳粹大学生团体。

2. 表示整体、泛指概念：“-tum”、“-schaft”“-gemeinschaft”、“allgemein-”。例如，“Studentenschaft”、“Studententum”，均指某个范围内的全体大学生。“Volkstum”指全体人民。“Deutschtum”指全体德意志人。不加上述后缀或者前缀的原词根在德语中有细微差别，对于引用材料中出现的这些词及类似含义的词，本书采取意译，不再作特殊说明。

3. “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翻译：在德国政治概念中，有三个意思相近的词——“national”、“völkisch”和“rassisch”，语气程度呈递进关系。“national”对应汉语中的“政治民族主义”——由民族国家(Nation)发展而来；“rassisch”对应汉语中的“种族主义”。但介于二者之间的“völkisch”，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翻译，在有的语境下，它的意思更接近于“national”，而在另外的语境下，则更接近于“rassisch”。本书根据其本意将“völkisch”译为“文化民族主义”，将“Volksgemeinschaft”译为“民族共同体”。

4. 同理，在德国人心目中，民族国家(Nation)与政治国家(Staat)是有本质差别的。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人民(Staatsbürger)和公民(Volksbürger)的含义也有必要准确区分，尽管在中文中都是近义词，模棱两可。在诠释某些概念的时候，本书会在后文标注出确指含义。

此外，“Reich”通指国家，不专指“帝国”，魏玛共和国也常常用“Reich”称呼，例如《魏玛宪法》的德文即为“Reichsverfassung”，应当译为“国家宪法”，而非“帝国宪法”。但根据习惯，“Der Dritte Reich”又译为“第三帝国”。

5. “委员会”：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大学生团体也会进行组盟，他们的联盟名称也很多元化。

“Rat”一词具有“代表会”、“委员会”、“理事会”或“会议”的意思，例如“Reichsrat”，常被译作“参议院”。这种形式出现于德国1918年革命时，以俄国十月革命中出现的“Soviet”模式，中国学术

界在论述时，常常翻译为“苏维埃”。因此就有所谓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等译名。

但德国学术界认为，将“Rat”等同于“Soviet”并不完全正确。<sup>①</sup>“Rat”的同义词还有“Ausschuß”、“Komitee”等。比如，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既成立过“Studentenrat”，也成立过“Studentenausschuß”，都是代表某派大学利益的团体。综合考察原文语境及习惯用法，本书仍沿用将“Rat”译为“苏维埃”的译法，因为一般这种组织多是左派大学生仿照俄国模式建立的。

而另一种同盟——“Ausschuß”则含有更多的西方民主政体的味道，本书译为“委员会”。

“-tag”，有“议会”的含义，例如“Reichstag”（国会）。根据实际意义，本书将各届“Studententag”统一译为“大学生大会”。

此外，在工读大学生运动中，还出现了“Arbeitsgemeinschaft”。这个词既有“劳动共同体”的含义，也有“工作小组”的含义。在实际的组织名称上，根据语境含义是不同的，但国内学术界对此没有统一规定。因此，根据实际情况，本书对该词的译法也不尽一致。

---

<sup>①</sup> Reinhard Rürup, *Demokratische Revolution und dritter Weg.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918/19 in der neueren wissenschaftlichen Diskussion*,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Jg. 9, 1983, S. 291-292. 另参见孟钟捷：《德国劳资关系演进中的里程碑——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的发生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13页。

# 第一章 德意志大学生问题历史回顾 (19 世纪初—1918)

19 世纪以前，德意志各邦国的大学生一直与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保持着距离。这是因为，根源于古老的德意志“祖国”理想，德意志大学生认为政党政治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相互勾结或者攻讦，从根本上有损于民族根本利益。但是当历史的车轮驶向 19 世纪时，德意志大学生的这一古老传统却被拿破仑战争所打破，德意志大学生运动即发轫于这一时期，这也是德意志大学生民族国家理念的觉醒时期，是他们无意识的政治尝试的开始时期。本章要讨论的问题是：德意志大学生社团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19 世纪的德意志思想家对大学生保守主义、君主制思想、反犹太主义的萌生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前线青年的一代”的政治态度有何影响？是否像以往人们先验认为的那样充满弊端？如果有积极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前线青年”是如何产生的，其历史作用何在？唯有理清这些问题，才能了解魏玛时代的德意志大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

## 第一节 德意志大学生社团组织的发展

德意志最古老的高校可以追溯至 14 世纪，自德意志大学建立以来，大学生便开始形成它们的社团组织，这样的组织与高校生活紧密相连，以至于大学生史就是一部大学生社团史。在 18 世纪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大学生和社团这三者在功能和内容上已交织成一种轨迹。大学生正是从结社生活中吮吸了“民族共同体”、“国家”等概念的初乳。这一点为大学生运动日后的崛

起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大学生社团统称为“Korporation”，该词来源于拉丁语“Corpus”，意为“身体”。这个组织内部的成员既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又有兄弟般的情意，互相以“你”称呼，<sup>①</sup>只要宣誓遵守“规章”，都可以自由加入。它的基础建立在“结社自由”和“劳动自由”上，具有义务性特征，成员必须谨守誓言和组织规定，老成员在社团内部享有较高地位，受人尊重，他们组成了“长老会”(Alter Herren)。

虽然“Korporation”是一种等级性的社会组织，但它同时也是从等级制向现代性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团体的过渡形态。1810年创立的柏林洪堡大学将大学的宗旨确立为“塑造”人，而非“教育”人，这就为传统大学生社团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土壤。从那时开始，社团也成为了一种教育手段，填补了学术自由矫正力量的空白，在其团体内部“性格培养”的框架下，完善了大学的“科学—职业”教育功能，同时，也具备了为德国社会的上等阶层培养接班人的功能。简而言之，大学“教育”人，社团“培养”人。

没有参加大学生社团的大学生为数不多，因为参加某个社团能使大学生找到一种归属感，得到一种世界观的认同。社团大学生们自己起草纲领，严格遵守社团规章并以此为生活原则。但是，成员也要履行传统义务，例如缴纳会费、穿制服、进行击剑训练，为下一代树立榜样等。传统大学生社团的作用在于，以相似的生活方式掩盖大学生个体之间不同的目的和文化冲突，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对组织的忠诚感。


1900年前后，哲学家和教育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就从高校结构上高瞻远瞩地阐明了传统大学生社团的意义：“自由结社是德意志大学生生活的突出特征，正如高校生活对于英国人的意义一样。在自由意志和自我选择的基础上，一些成员对其社团充满了坚定与忠贞的信念，他们断然不会同时参加别的团体。这对于资格老的、建立在持久的和强有力的传统之上的色标团

---

<sup>①</sup> 德语中不太熟识的人之间用“您”(Sie)称呼，而朋友和家人间才用亲切的“你”(du)相称。

(Farbenverbindungen)尤其重要,它给予在校大学生们一种故乡情结。”<sup>①</sup>包尔生本身就是一名社团大学生,他将大学生社团看作大学生的代言人,是高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传统的大学生社团中,最重要的当属“大学男生联合会”(Burschenschaft)。“Burschenschaft”的含义为“全体男生”。“Bursch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Bursarius”,指大学生宿舍(Burse)的住户,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初用来指代大学生。因此,从那时开始,“Burschenschaft”就常常用来指代大学生。

“大学男生联合会”(Burschenschaft)起源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为了反抗拿破仑的统治,争取自由,由大学生组建的“德意志文化社”(Kultur Deutschlands)决定奋起反抗。据估计,德意志地区大约20%~50%的大学生参加了自由反击战。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参战的比例都高。这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组织,他们佩戴色标、穿制服、戴统一的帽子,常常组织军事训练。传统的“大学男生联合会”的色彩为“黑—红—金”,这三种颜色其实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模仿法国国旗,代表德意志的统一、自由。大学男生联合会的一大特色为“击剑决斗”(Mensur),绝大多数大学男生联合会都进行击剑决斗,训练成员的意志。他们的徽章也很特别,采用特别的花体字,即“Ziekel”,例如, ,这种自成一体的书法风格很难辨认,无法拆分,只有内部人士才能明白。正是从这种“心照不宣”中,大学生感受到一种集体归属感。

当然,德意志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团体,如“天主教大学生联盟”(Katholische Studentenverbindungen)、“同乡会”(Landsmannschaften)和“大学生军团”(Korps),但是公众经常用“Burschenschaft”来指代大学生社团。

“原始大学男生联合会”(Urburschenschaft)于1815年6月12日在耶拿成立。当时四支“同乡会”(Landsmannschaften)——“Thuringia”、“Vandalia”、“Franconia”、“Curonia”——的成员齐聚

---

<sup>①</sup> Friedrich Pauls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Olms Verlag, Hildesheim, 1966, S. 472.

“绿杉树”(Grüne Tanne)酒馆,解散了各自的长老会(Senioren-Convent),组建了第一支“Burschenschaft”。最初拥有143名会员,多为民族主义者、基督教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以建立在“忠诚、自由、祖国”概念之上的公民责任、民族战士和个人自由权利为奋斗目标。

1817年10月17日,“原始大学男生联合会”邀请全德意志大学的学生来到的埃森纳赫(Eisenach)的瓦尔特古堡(Wartburg),参加纪念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发表300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欢庆1813年莱比锡战役胜利,史称“瓦尔特堡集会”。全德共有500名大学生参加了这次盛会,大会提出了组建全德大学生联盟的构想,也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①统一德意志的政治、宗教和经济;②废除关税壁垒;③建立国防军;④发展立宪君主制国家,制定国家宪法。并建立“祖国的”、“防卫的”君主制;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⑥建立法治国家(*nulla poena sine lege*,没有法律依据不能定罪);⑦保护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⑧言论和出版自由;⑨迁徙自由。市民权利也首次被提及。“瓦尔特堡集会”成为“原始大学男生联合会”的行动标杆,也成为其日后政治姿态的基础,因此,认同《瓦尔特堡宣言》成为各地方“大学男生联合会”(Burschenschaft)的首要准则。

“瓦尔特堡集会”后,“大学男生联合会”蓬勃发展。1818年,“原始大学男生联合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来自全德意志14个大学的大学男生联合会共同组建了“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联盟”(Allgemeinen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但将全德境内所有大学生组织都纳入这个全国性组织的愿望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在近代欧洲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发展中,1819年“德意志同盟”通过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也是一部在欧洲大学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影响意义的法案,它深刻影响着后来大学的发展。<sup>①</sup>

---

<sup>①</sup> 参见杨克瑞、张红霞:《“卡尔斯巴德决议”及其对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历史意义》,《现代教育管理》2009年第5期。

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将学术自由视为大学的基本原则，认为“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此两点为依据”。<sup>①</sup>但是，随着欧洲反法联盟的胜利以及1815年“神圣同盟”的成立，欧洲政治很快走向复辟，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对当时欧洲政治风云激荡下出现的大学生运动深感不安，甚至设想要取缔大学，而以政府控制的公务员培训机构取而代之，欧洲大学面临着一场“白色恐怖”。

在高涨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下，德意志各大学热血沸腾，希望由知识分子领导民众起义，推翻统治阶级的压迫。在瓦尔特堡集会上，大学生销毁一切被认为是反动的东西，其中包括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茨比(August von Kotzebue)的书籍，他被怀疑是俄国间谍。1819年3月23日，神学大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刺杀了科茨比。梅特涅遂以此事为借口，于8月6日至31日在波希米亚(Bohemia)的卡尔斯巴德组织召开了德意志联邦会议，出席者除奥地利、普鲁士外，还有8个德意志邦国。梅特涅趁机劝谕邦联议会打压大学生社团，压制传媒自由，并限制学术自由。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9月20日获得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批准，史称“卡尔斯巴德决议”，它包括四项法案<sup>②</sup>：①大学法：设立国家全权代表(大学学监)，监视大学生和教授，对于超越教学职责而“毒害”青年学生心灵的教师，各邦国应将其解职。解散一般性大学生社团，只有得到特殊的许可才能存在。②新闻法：严格检查一切印刷品，对20印张以下的所有作品实行预检制度，凡被取缔的报章杂志编辑，五年内禁止再就业。③在美因茨设立联邦中央机关，查究“革命的颠覆活动”。④临时执行权：联邦有权在各邦执行权力，在发生动乱的情况下进行干涉。最后一项法案实际上是赋予奥地利利用武力对各邦进行干涉和控制的权力，并对

①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② Walter Rüegg,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76.



所有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四项法案一直实施到1848年4月2日联邦议会解散为止。

《卡尔斯巴德决议》意在镇压一切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运动。该决议实施之后，大学生组织遭到严格管治，“黑—红—金”三色旗被视为反政府的标志，不准悬挂，此外，参加过“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联盟”的成员不允许成为医生或律师，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师也纷纷被解职。例如，1837年汉诺威大学的七名教授由于抗议专制的新宪法被解职；在德意志诸侯的联合镇压下，数百名知识界人士被逮捕和监禁；极度反感《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洪堡被免职。这一系列事件彻底颠覆了洪堡的“教育自由”原则。

同时，《卡尔斯巴德决议》的高压政策也激起了大学生的反抗高潮。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之后，德国境内再次掀起民主运动高潮。1832年5月27日—30日，在汉巴赫庆典(Hambacher Fest)上，3万名与会者高呼德意志自由、民主和统一。大学男生联合会的代表色——“黑—红—金”，也首次成为献身德意志统一和民主事业的标志。

1832年5月27日，德意志三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其中有大量大学生。他们呼吁德意志统一，呼吁新闻自由及宗教自由，甚至主张共和，结果招致当局的大举拘捕，并颁布限制自由人士的法律。

1833年，在大学生运动史上非常有意义的“法兰克福卫兵营风暴”(Frankfurter Wachensturm)爆发了。4月3日，法兰克福的大学生试图发起革命，要求释放政治囚犯。有五十名学生袭击卫兵营房及警察总部，并计划拘禁国会代表及成立革命政府，有几个士兵被杀。但因警察告密和德意志同盟的武器和资金支持，这次事件被镇压。起义失败后，贵族当权者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列出一连串的黑名单，禁止异见人士入境和在德国就业，并同时开始镇压大学生社团。在这种形式下，大学生社团不得不转入地下联谊，或者干脆不再过问政治。

大学生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自由运动一度陷入低谷。直到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消息传来，大学生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

张。在欧洲大革命的浪潮中，梅特涅逃跑了，联邦议会也于1848年4月2日解散，《卡尔斯巴德决议》寿终正寝。奥地利教育大臣再次宣布恢复教学自由，由大学自行选举的学术委员会领导大学自治，国家“特别代表”也被正式取消。

1848年5月，“法兰克福议会”公布了现代大学基本原则，即“科学和学术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这一原则在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67年奥地利宪法中获得承认。

1848年圣灵降临节，不少大学生云集爱森纳赫，并重申：大学生参与大学自制，实现教学与研究的自由。

1848年7月31日，“大学男生联合会”的“黑—红—金”三色被确定为德意志联盟的色彩。此时，大学男生联合会如雨后春笋般再次复兴。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大学男生联合会组织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850年8月，15个持进步主义姿态的大学男社团在埃森纳赫成立组建了“大学男生联合会联盟”(Allgemeine Burschenschaft)。他们否定军事训练，反对社团内部的格斗，要求进行爱国主义政治教育，主张大学生人人平等，并成立了“名誉法庭”(Ehrengericht，社团为涉及内部名誉事件而组成的制裁法庭)。但由于内部分裂，1852年5月31日该组织解散。

1855年，一些赞成改革运动的左派大学男生社团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大学男生联合会联盟”(Bund deutsch-demokratischer Burschenschaften)，该联盟吸收了大部分德意志北部及中部的大学男生社团，还包括奥地利的一些大学男生社团。后来常被人称为“北德意志联盟”(Norddeutsche Kartell)。它积极参与进步运动，致力于由大学生领导的德意志的统一。作为教育成员的手段，该团体还积极开展“政治—学术论坛”(politisch-wissenschaftliches Kränzchen)，在聚会上畅所欲言，互通思想。到了1859年，席勒一百周年诞辰时，大学生社团才得到了政府更大的宽容。大学生对社会的批判传统也随之复兴，他们要求政府承认大学生的公民权和请愿权，并希望制定一条有关结社的法律，这些要求也得到了自由主义教授们的支持，近代欧洲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步入了政府向学术自

由做出有限让步的新阶段。1861—1866年,“德意志民主大学男生联合会联盟”发行了自己的刊物——《大学生报》(*Akademische Zeitung*),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成员当中引起强烈共鸣。此外,“北德意志联盟”还鼓励其成员加入“体操团”、“合唱团”和“射击团”。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是“大学男生联合会”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它还要求成员以德意志民族主义团体和普鲁士自由主义进步党派理想为己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但是,1866年,在“大德意志路线”还是“小德意志路线”的分歧上,“北德意志联盟”内部产生了大分裂,终于在1872年分道扬镳,团体解散,它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向大学生灌输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1年,作为左派男生社团的对立派,奉行保守主义大学生的团体成立了“南德意志联盟”(Süddeutsche Kartell)。此外,影响力较大的右派团体还有“红色联盟”(Roten Kartell),其成员主要是保守主义大学生,将击剑决斗作为社团的主要活动,参与政治尚在其次。

19世纪60年代,左-右两派大学男生联合会团体之间展开激烈争执,一直持续到70年代,这大大削弱了大学男生联合会的力量。

1864年,“埃森纳赫大学男生联合会”(Eisenacher Burschenschaft)成立,有22支大学男生社团参加。但“南德意志联盟”和“红色联盟”没有参加。而“北德意志联盟”成为“埃森纳赫大学男生联合会”的领导力量。但是,到1869年夏,由于内部的纷争,该团体解散。1870年1月20日,右翼社团缔结“埃森纳赫协定”(Eisenacher Konvention),成员包括1869年成立的中间派团体“绿—白—红联盟”(Grün-Weiß-Rote-Kartell)。“埃森纳赫协定”将击剑决斗传统贯彻到底,每个成员都有义务参加。但它们内部之间也有分歧,很快,在同年5月22日最终解散。

在德意志统一帝国建立后的1874年11月10日,怀着统一全德意志大学男生团体的理想,“绿—白—红联盟”邀请各大学男生团体齐聚埃森纳赫,召开大会。大会成立了“埃森纳赫代表会”(Eisenacher Deputierten-Convent,简称EDC),有20支大学男生团

体参加。鉴于以往分分合合的内部之争，EDC 没有讨论击剑决斗的问题，而是将大学男生联合会的声望与荣誉作为首要目标。虽然 EDC 在最繁荣时期有 30 支二级团体，但“南德意志联盟”和“红色联盟”却与之保持距离。因此，EDC 影响力有限，大学生统一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最终，南部的保守主义男生社团中，只有三支来自耶拿的团体——“Arminia”、“Germania”和“Teutonia”参加了埃森纳赫大会。另外 35 支大学男生社团、“南德联盟”及“红色联盟”组成自己的联盟——“全体代表会”（Allgemeiner Deputierten-Convent，简称 ADC），并于 1902 年更名为“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但这个联盟建立的基础是尊重各二级社团的自决权，牺牲了作为整体组织的权威，并且拒绝奥地利大学生社团的加入。在政治态度上，初期的 ADC 坚决抵制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

在“大学男生联合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是 1887 年社团喉舌刊物《大学男生联合会期刊》（*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开始发行。它在宣传大学男生联合会的组团理念、巩固内部团结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同时，这份刊物也对兄弟团体——如技术高校的“大学男生联合会”和奥地利的“大学男生联合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另一个对“大学男生联合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则是其内部的“长老团”（Alte Herren）。如果没有许多老成员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大学男生联合会”就无法实现更大的发展。1890 年，在“大学男生联合会”成立 75 周年纪念日上，“长老联盟”（Vereinigung Alter Burschenschafter，简称 VAB）成立了。各个地方性团体的长老团除了组织筹办例行的大会（Burschentag）外，还召开长老工作例会（Altherrentag），处理内部的误会或制定改革措施。

除了外部的努力，他们也没忘记组织内部丰富的生活：“学术-政治演讲之夜”（Wissenschaftlich-politische Vortragsabende）成为一个广泛的、义务性活动，每个成员都必须参加，后来被称为“大学男生联合会之夜”（Burschenschaftliche Abende）。在演讲之夜上，新老社团成员齐聚一堂，对工作、课业、教学问题畅所欲言，博得广大

成员的积极响应和大力称赞，其影响力在国外社团中也如雷贯耳。正是这种广泛的影响力为“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带来了良好声誉，吸引了诸多其他社团的加盟，如“全德意志团”(Alldeutscher Verband)、“外国德意志人协会”(Vereine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德意志殖民地协会”(Deutschen Kolonialgesellschaft)、“北部及东部边境协会”(Nord-und Ostmarkenverein)和“德国海军协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在演讲之夜的带动下，民族自由主义国家议员雨果·伯特格尔(Hugo Böttger)博士创办了“大学男生联合会图书馆”(Burschenschaftliche Bücherei)，用广闻乐见的形式探讨历史、文学及政治问题。但是，建立全国性大学生组织的愿望由于种种内部的争论而夭折。并且，各个地方性大学男生社团还缺乏一种集体主义观念。

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大学男生联合会”完成民族统一和解放的目标得以实现，但它也逐渐丧失了自身进步主义的特点，反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堡垒，陷入狂热的爱国主义之中，对皇帝唯命是从。与此同时，大学生对军事武装的热情却高涨起来，这使得大学生迷失在“击剑决斗的狂热”之中。而且，这也几乎成为较大的大学生团体的普遍问题。

总之，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源于反对拿破仑战争的“大学男生联合会”已背离了民族进步主义传统而走向了保皇主义，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成员成为了响应皇帝战争号召的踊跃的从军者。

## 第二节 结社生活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

欧美历史学家常常对德国大学生团体感到迷惑，因为它们与欧美的大学生团体迥异，不能用一般的理论来概括。德国大学生一方面严肃认真、目标明确，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吵闹聒噪、不拘小节。他们常常穿着缤纷的制服、戴着奇怪的帽子，豪歌畅饮，彻夜娱乐，迷恋危险的击剑决斗。这种结社生活为他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塑造正是通过历史传统的复兴、社团

生活的仪式化、独特的性格培养以及民族主义的激进化来完成的。

第一，大学生社团开始了历史复兴运动。与以往的大学生运动不同，帝国时代的大学生运动处于一场历史的加速转变之中。因为德意志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半立宪式的民族—国家，但国家内部真正统一尚需时日。而且，此时的大学生们经历着大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外部世界处于转型之中。同时，他们还要面对人口的迅猛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例如，在科学进步和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宗教权威日渐丧失。

在大学领域，这种改变更加突出。1871—1914年，大学数量猛增，专业分布更加细化，老一代教授将其视为“学术大工厂”（*Großbetrieb der Wissenschaft*），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的专利。此外，大学生人数的倍增以及大学的更加开放——19世纪、20世纪之交允许女生上大学，下层中产阶级的子女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天主教大学生和犹太大学生的比例很高——这些都是高校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大学生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蜂拥而至的问题？

相对于现代化进程，大学生社团更愿意寻求历史复兴，在历史中寻求发展。他们延续了中世纪的德意志风格，例如聚会礼堂、穿着式样都弥漫着浓厚的中世纪遗风，甚至许多社团刊物封面采用了中世纪的圣像画字体，印有徽章、武器、标志、骑士或者宫廷抒情诗人（多为骑士）的画像。特别在社团庆典上，要隆重地穿上传统服装。

这种复古情结的出发点是尊重传统、发现传统，它成为了帝国时代大学生政治文化的特色。复古风潮的积极作用在于，它使大学生更加具有归属感，融为一个整体，尤其是那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同时，它也是一种策略，起到了宣传传统大学生社团的作用，因而很快就赢得了大学生的共识。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历史化倾向也反映了他们对快速社会转型的矛盾心态和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对快速的社会转变并不能马上接受。或者说，大学生竭力复兴传统的出发点是对现实的不安全感的体现，要从“过去”中抓住他们熟悉的东西，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存在感。

第二, 社团生活逐渐成为一种仪式化的社交活动。年轻的大学生对于交际的渴望非常强烈。体育活动在巩固社团成员关系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团队竞技”(Mannschaftssport), 促进了个人的集体观和团队合作精神。同时, 通过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 如音乐、戏剧等, 培养了大学生的审美意识。与英美社团的“替代父母”(loco parentis)角色相反, 在德意志, 社团给予大学生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例如, 不再要求他们住在男生宿舍, 没必要吃食堂等, 鼓励他们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1879年, 对大学生违纪的惩罚条例也被废除。<sup>①</sup>

在英、美等国家, 大学生对于喝酒或者组建小团体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厌恶。可是在德国, 大学生社团的悠久传统之一就是饮酒, 而且将饮烧酒(Alkohol)作为一种制度执行。不仅晚上推杯换盏, 而且早晨也要在酒馆喝酒(Frühshoppen), 这是为了能在上午有个“好心情”。与其说小酒馆制度是一种固定的聚会, 不如说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竞赛, 因为它有奖惩制度。五花八门的行酒令——例如臭名远扬的“教皇游戏”(Papstspiel)——使他们必须发挥最大酒量。此外, 为了助兴, 他们还放声高歌, 最后往往是酩酊大醉。节日宴会上, 他们更是豪饮, 特别有名的风俗有“干杯”(Salamander, 祝酒前把斟满的酒杯在桌上敲击以表敬意)和“国王”(Landesvater)。这种饮酒文化虽然过足了酒瘾, 但也因为无节制常常妨碍学业。

另一个典型仪式就是——“通过仪式”(rite de passage), 即“击剑决斗”比赛(Bestimmungsmensur), 它被写入社团规章, 成为增强集体认同感的方式。自18世纪以来, 大学生社团就奉行准军事路线, 当时举行的是更危险的搏斗和拼刺刀比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击剑决斗”代表了一种进步, 既是一种有效的考验勇气的方式, 又避免了更严重的身体伤害, 因为, “击剑决斗”本身具有体育运动的特征, 有利于强健体魄。但是, 虽然比赛的时候会带上面罩, 穿上防护服, 却仍难以避免发生事故, 在发生严重事故时责任

<sup>①</sup> 由政府执行, 送进警察局关禁闭反省, 目的是培养荣誉感。

者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在帝国时代，“击剑决斗”发展为一种“勇气测试”(Mutprobe)，通过它使成员在无法避免的伤害面前仍学会服从组织命令，颇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意味。

除了击剑决斗外，大学生社团还有更多形式的军事训练(Duell)秉承了“决斗”(Satisfaktionsfähigkeit)理念，只有军官、贵族、高级公务员家庭出身的、所谓的“精英”大学生才能参加这些活动，而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则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大学生社团的这些典型活动逐渐成为一种专属的仪式化社交活动，必须具备成员资格的人才能参加，禁止外人参加，这些社交活动培养了社团成员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经历，有助于形成共同体意识。但社团严格的阶级划分和排他性特征，是知识分子内部贵族化倾向的表现，使“有知识的市民”(Bildungsbürgertum)与威廉二世时代的其他社会阶层明显区分开来。这些交际仪式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常常耽误学业，在决斗中受伤、甚至死亡等。

因此，面对诟病，乘着移风易俗的理念，最先在新教大学生团体“温高夫”(Wingolf)和天主教大学生社团中发起了净化运动，旨在清除大学生社团的“放荡”，提倡健康的业余消遣方式，也得到其他团体的响应，例如，“德意志大学生协会”(Vereine Deutscher Studenten，简称VDSSt)开始摒弃喝酒及“击剑决斗”传统，自由大学生(Freistudenten)和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开展非强制性的社交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政治成为一些大学生的“新宠”，这是对传统大学生社团厌恶政治活动的一大突破，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大学生的主要活动。

第三，大学生社团对其成员还起到了一种特殊的“性格培养”作用。在英美大学中，大学宿舍的集体生活、文化活动以及体育竞赛，给大学生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在德国，大学生的流动性和自由程度更高，大学不强制住宿，因此，大学生缺少一种这样的集体生活。但是这个“漏洞”恰好成为大学生社团的用武之地，从而成为完善大学教育功能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大学进行学术能力上的培养，而大学生社团则通过非学术的性格教育来完成“人”的塑造。在“荣誉、勇气及忠诚的信条”下，大学生社团成为大学生



自由的必要矫正力量。

19世纪80年代,一些大学生社团相继发行了自己的刊物,成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手段”。长老团、老社员和新社员之间在生活上的联系首次出现突破。例如,1884年出版发行的《大学生月刊》(*Academische Monatshefte*)上,一名长老认为,“大学生社团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机构,它的价值在于使年轻的社员自愿接受教育”<sup>①</sup>。

性格培养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就是学长(*Fuxtum*),正是通过他们,新生懂得了社团的功能和价值。例如,奥托·比尔鲍姆(*Otto Bierbaum*)在其小说中鲜活地将老生比喻为一支打入新生中的“楔子”。<sup>②</sup>但是,虽然老生为孤独的新生提供了帮助,传授了重要的学习经验;但在社团内部,新生处于较低的地位,要为老生服务。

大学生社团的教育功能被称为“新骑士制度”。主要目的在于形成牢固的友谊关系。战斗性社团尤其注意维护良好的兄弟情义,培养其成员的男子气概和荣誉感——击剑决斗正是这种培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在对大学生开展的性格教育中,内容和侧重点是多种多样的。在政治态度上,一向具有精英观的“军团”(Corps)只注重军事训练,实行政治禁欲主义,这与高级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紧密相关。而“大学男生联合会”(Burschenschaft)则延续了他们自反法战争以来的民族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完成“国家使命”。其成员不遗余力地向公民宣扬爱国主义。<sup>③</sup>在天主教大学生社团,如“德意志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Cartellverbandes der Kathol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verbindungen,简称CV),则将“巩固信仰”作为首要任务。同乡会致力于加强地方联谊,体操团则主张体能训练,合唱团鼓励

<sup>①</sup> *Die Bedeutung der studentischen Verbindungen in unserer Zeit*, In: *Academische Monatshefte*, 1. 5. 1884, S. 259ff.

<sup>②</sup> *Otto Julius Bierbaum, Stilpe. Ein Roman aus der Froschperspektive*, Schuster & Loeffler, Leipzig, 1921.

<sup>③</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1*, 1887, S. 50ff.

大学生唱歌，每个社团的诉求都各不相同。

在社团的强制性服从体制中，也逐渐延伸出监护个体成员的任务。开始只是宣传社团价值，帮助成员消除孤独感，培养友谊和社团生活模式，后来还关心成员的就业问题，注重新老成员之间的代际交流。在天主教大学生团体内部，还进行世界观的教育、道德教育。老成员对新成员开展一对一帮助，这些都是大学生社团履行自身职责，教育民族精英的积极作用。

但它也有消极影响，因为，社团生活的监督管理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去个性化”倾向(Entindividualisierung)。作为团体义务，社团活动需要占用大量时间，仪式性的小酒馆聚会对成员的经济和时间都是无益的消耗，影响学业。此外，成员还要履行经济上的义务，必须交纳一定会费，购买制服、肩章、团帽、徽标，自己购买决斗的武器和服装，参加地方性和全国性大会的食宿花销都得自行解决。而且，古老的击剑传统，新封建主义的军事训练，使这些知识精英们没有学到与现代国家体制相称的自由民主观，反而强化了他们对权威、权力的崇拜。

第四，大学生在社团生活中慢慢形成了激进的民族主义情感。到威廉二世时代，社团大学生的政治立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在其他西方国家，大学生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但德国大学生的民族主义却有独特特征，或者说负面特点。一方面，大部分教授和公务员认为党派纷争是无益的，政治不应当走入高校，大学生应与政治活动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对祖国的热爱并不被视为政治姿态，而是被视为国家公民的义务，因此，民族主义情结自然而是值得肯定的，没有受到任何批判。在这种矛盾的观念下，大学生的民族主义也成为一种非政治产物，影响深远。<sup>①</sup>

在国家观念上，如果说马基雅弗利以非道德的方式看待权力争夺，那么德国学者就把它上升到一种道德原则。例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认为，当国家追求

<sup>①</sup> Konrad H. Jarausch,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Rise of Academic Il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60.

更高利益时，它没有罪。因为通过追求这些利益，它促进了道德发展。只有在强大的国家中，自由、法律和文化创造力才能获得保证。战争的胜利通常意味着更高的道德力量的胜利。<sup>①</sup> 1871年后，德意志民族自由主义越来越向着“整体民族主义”发展。<sup>②</sup> 在外部形式实现统一后，民族主义要求进一步实现内部统一。

作为新时代的代表，大学生在民族化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且重新定义了忠诚，陷入了民族主义狂热之中。这种渴望统一的问题在于，他们将普鲁士强权政治视为榜样，反对其他的思想——如天主教。对统一的狭隘界定引起了高校中的歧视性排他运动，从1905年开始，高校掀起了反对俄国、犹太和社会主义大学生的运动。

新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生社团的军事化，尤其是“大学男生联合会”，他们常常追忆前辈们在反对拿破仑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用赞歌和赞美诗颂扬为国捐躯的烈士。通过这种方式，军国主义被美化了，并且导致了大学生英雄主义的上升，新封建主义开始抬头，他们呼吁用武器保卫荣誉，进行击剑决斗和军事训练。同时，为期一年的志愿军制度也建立起来，成员必须在大学期间服役，这一措施目的是培养未来的有能力的军官和指挥官。这样的军事氛围激励了大学生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抛头颅洒热血，并使他们成为了魏玛共和国末期颠覆民主的力量。

19世纪90年代，狭隘的民族主义通过反犹主义变得更加激进，反对犹太大学生很快成为风气，很多大学生团体开始驱逐犹太大学生，这只是将犹太人赶出大学、进而赶出德意志领土的前奏。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意志民族主义更加激进。海军舰队计划、开辟殖民地的狂热得到大学生热烈欢迎，威廉二世时代的大学生走向了帝国主义。

---

<sup>①</sup>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三联书店2007年版。

<sup>②</sup> Otto Dann, *Nation und Nationalismus in Deutschland 1770-1990*, C. H. Beck, München, 1994, S. 1517ff.

大学生社团的这种政治教育背离了其早期的自由主义路线，逐渐丧失了大学生的进步主义热情，以及 1848 年革命和宪政改革的优良传统。到 19 世纪 80 年代，“德意志大学生协会”（Vereine Deutscher Studenten，简称 VDSt）领导的大学生政治联盟已经完全投入了激进民族主义的怀抱。他们的这种反自由化倾向在一首诗中得到明确表达：

清醒吧，德意志男儿（Burschenschaft）！古老的摆摆在面前，为了全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拿出年轻人的勇气，甘愿献上财产与鲜血；为了吾国与吾皇，高举盾牌，全心全意，枕戈待旦，忠贞之口号从未过时：“为了荣誉、自由、祖国而战！”<sup>①</sup>

从中可以看出，德意志的统一、军事反抗、对皇帝和祖国的敬爱都融于“自由”之中。自由大学生发起的自由主义运动并未遏制住反自由浪潮，19 世纪 80 年代，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战前大学生“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浪潮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19 世纪 50 年代后，“大学男生联合会”发展与分裂并存。为实现全德意志大学生的统一，它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其内部对政治改革和高校改革的见解常常水火不容，尤其是击剑决斗和军事训练问题成为了矛盾的中心。在经历了历次分合之后，“大学男生联合会”逐渐迷失了自身的进步传统，成为封建秩序的维护者。

###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前线青年”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曾提出，士兵将会成为大众的教育者，战争会产生“新人”，<sup>②</sup>这个论断应用到经历过第一

<sup>①</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1, 1887, S. 1ff.

<sup>②</sup> Bruendel, Steffen, *Volksgemeinschaft oder Volksstaat. Die Ideen von 1914 und die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m Ersten Weltkrieg*, Akademie Verlag, Berlin, 2003, S. 131.

次世界大战的大学生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他们就是所谓的“前线青年”(junge Frontgeneration),也常被称为“战争大学生”(Kriegsstudenten)。<sup>①</sup>

究竟有多少大学生是自愿参加战争的,至今也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这一点可以肯定,随着战争的持续,不断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由于每所高校阵亡大学生和受伤大学生的数量各不相同,人们能够从当年高校的注册率上简单推测出大学生的参战人数。

根据入学注册率,22所德意志高校的注册情况如下:1914年夏季学期61 200人,1914—1915年冬季学期52 500人,1915—1916年冬季学期53 300人。大学生人数的减少原因,一是大约有2 500名来自“敌国”的大学生回国,900名来自中立国,还有一部分已经上前线了,没有注册。实际的入学人数为:1914—1915年冬季学期22 500人(包括4 000女大学生和1 500名外国大学生),1915年夏季学期16 800人(包括4 300名女生和1 200名外国学生),1915—1916年夏季学期15 100人(包括4 650名女生和1 400名外国学生)。<sup>②</sup>

比较注册率和入学率,不难得出参加战争的大学生人数:1914年下半年38 000人,1915年上半年43 000人,1915年下半年50 000人。到1915年下半年,当时约80%的大学生上了战场。

1915—1916年夏季学期,《大学男生联合会期刊》的一篇文章写道:“全德国64 000名大学生(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包括矿业学院等)中只有18 000名学生在校……其中有5 000名女生,2 400名外国人,因此只有10 000名德国男生还在学校(而战争爆发前最后一学期则有66 000名男生),56 000名在战场上或者在军队待命。”<sup>③</sup>这个数量在1917年时达到顶峰,当时全德49所高校(综合

<sup>①</sup> 与“前线青年的一代”相对应的是“年轻一代”(Jüngerengeneration),也称为“战后大学生”(Nachkriegsstudentenschaft)。两代人之间的一代成为“战争青年一代”(Kriegsjugendgeneration)。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sup>②</sup> Wilhelm Bruchmüller, *Das deutsche Studententu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In: *Aus Natur und Geisteswelt*, Bd. 477, Leipzig/Berlin, 1922, S. 134ff.

<sup>③</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30. Jg., Nr. 8, 15. 7. 1916, S. 133.

大学、技术高校等)有72 000名学生注册,其中6 000名女生,1 800名外国人。因为52 000名男生在军队服役,因此只有12 000名男生在学校。完全没有上过战场的大学生的人数大概最多只有7 000人,而这些后方的大学生也参与到照顾伤员、安抚难民等工作当中。据估计,所有高校中大概90%的大学生参加过某种形式的服役。

如此之高的从军热情反映出德意志大学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积极态度。因为1914年的德意志大学生们是怀着与他们的先辈在1814年参与反法战争的同样热情投入到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去的,但是在他们看来,这场一百年后的世界大战同样是一场维护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和自由的战争,一场防御之战,因此,他们高喊着拥护皇帝、热爱祖国的口号,冲锋陷阵。

1914年之前,大学生成长和学习的环境还是稳定的,他们的国家观念和社会情感还是传统式的。因此,尽管战争的爆发很突然,但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诧。在最初的一周,大部分大学生都受到战争的鼓舞,因为战斗冲破了当时的精神和社会藩篱,用大大的惊叹号结束了经年累月的国内纷争。所有的危机都凝聚成一个目标——保卫祖国。大学生的民族意识——祖国和民族受到威胁——因为战争的爆发而更加清晰。他们抱着“古来征战几人回”的信念参与到战争当中,勇于担负起时代的重任。<sup>①</sup>大部分大学生是志愿投入战争的,他们坚信献身祖国和皇帝的紧迫性,个人必须服从集体意志,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懵懂状态,没有过多考虑将来所面临的危险。

战时的歌曲、书信、号召等舆论宣传不断强调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强大和力量以及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任务,并且极尽其能地侮辱敌人的劣等地位。这犹如一剂强心针,使大学生的“英雄主义”情结无限上升。例如,《大学男生联合会期刊》是这样宣传战争的爆发的:“只有少数人想留守后方,‘大学男生联合会’倾尽全力派出

<sup>①</sup> E. Stadler, *Das deutsche Nationalbewußtsein und der Krieg*, Volksvereins Verlag, München-Gladbach, 1917, S. 53.

战士……越受打击就越振奋，大家一心向战，只有一个想法：德意志在哪里受到的威胁最大，她的勇气和力量就要在哪里创造新的奇迹！这样，不仅吾皇和祖国能够安然无恙，而且战争还能提升威望和力量。它(指 Burschenschaft)带着对祖国耀眼的热爱投入这神圣的战斗，对和平的忠诚至死不渝。”<sup>①</sup>

德国历史学者威廉·布鲁赫米勒(Wilhelm Bruchmüller)认为：“尽管对祖国的热爱高涨……但年轻人并不醉心战争和世界沙文主义”，<sup>②</sup>而是基于一种相信民族受到威胁的心理。例如1914年10月，一名大学生在信中写道：“我们是德国人，我们为了民族洒热血。我们希望我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我们奋斗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光荣的德国，不再有困难和负担。”<sup>③</sup>

大学生的这些言论表明，他们的参战受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鼓舞，而且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鼓舞，他们相信有必要回击敌人对祖国的进犯，并且战争有助于解决德意志民族的内部困难。总之，他们将参战的原因归结为“祖国在危难之中”、“民族和文化受到威胁”。但对于战争的侵略目的——如吞并、扩张——大部分人没有概念。大学生并没有对战争的目的和实质展开政治讨论，而是用19世纪民族统一战争时期大学生的任务作对比，布雷斯劳的大学生在一份致皇帝的电报中说：“尊敬的陛下，布雷斯劳大学生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赞美，我们与其他大学生兄弟们一样，以自由和统一战争为己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放下书本，拿起枪杆投入战场。”<sup>④</sup>显然，民族统一信念成为大学生参战的一致信念和首要动力。祖国、民族和皇帝是统一的，神圣的战斗是为了保卫祖

<sup>①</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28. Jg., Nr. 10, 15. 8. 1914, S. 29.

<sup>②</sup> Wilhelm Bruchmüller, *Das deutsche Studententu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In: *Aus Natur und Geisteswelt*, Bd. 477, Leipzig/Berlin, 1922, S. 123.

<sup>③</sup> Philip Witkop, *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Georg Müller Verlag, München, 1929, S. 25.

<sup>④</sup> *Academia*, 27. Jg., Nr. 11, 15. 3. 1915, S. 625.

国、皇帝和德意志精神文化，“每一滴血都属于吾皇”<sup>①</sup>。

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原本生活环境已经面目全非，触目惊心的战斗对大学生个人而言是一道深深的伤口。他们经过好几个月才逐渐清醒过来，这对他们是一种灵魂上(seelich)的折磨。

参战的大学生，在其不长的生命历程中，只参与过高校的政治论战，已经适应了市民生活，因此军事生涯对他们无疑是震撼人心的。他们必须放低“精英”姿态，要学会融入出身于不同阶层的士兵群体。狭窄的生活圈子、体力的极大消耗、恶劣的生活条件、流血和死亡的巨大阴影，以及和平的遥遥无期占据了他们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活动。尽管战争刚刚爆发时大张旗鼓的战争动员鼓舞人心，但精神的膨胀禁不起肉体的消耗，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的内心世界逐渐发生改变，一名阵亡大学生曾在家书中这样写道：“这(内心的绝望)不是来自战争，它绝不会改变。”“直到1914年底，我们都受到大德意志理想的鼓舞。但1915年开始，我们意识到，这种鼓舞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义务。我们成为前线战士，沦为战争工具……战争已经完全变了味，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sup>②</sup>一名大学生在信中写道：“最后，还是有大学生深陷回忆之中，犹如无法消除的心病和阴影。青少年时代一去不复返，黑暗时代已经拉开帷幕。”<sup>③</sup>一位莱比锡神学大学生回家之后说道：“‘香槟美酒宴’上，我们站在一堆污秽上，每人一勺半过期果酱，14小包糖度过了圣诞节。”<sup>④</sup>

每天，“战争青年”们都直接经历着最悲怆的人类生存方式。“活下来”成为大学生们每天唯一的奋斗目标。正是通过这种生与死的体验，他们与战友形成了亲密关系，原本的出身和生活的差别消失了，这种人际关系成为他们最深刻的战争经验。残酷的战场现

<sup>①</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28. Jg., Nr. 10, 15. 8. 1914, S. 239.

<sup>②</sup> Herbert Cysarz,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Weltkrieges. Die dichterischen Wandlungen des deutschen Kriegsbildes 1910-1930*, Halle, 1931, S. 77f.

<sup>③</sup> *Witkop, 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Georg Müller, Verlag München, 1929, S. 46.

<sup>④</sup> *Witkop, 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Georg Müller, Verlag München, 1929, S. 163.



实对德意志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在战壕中缔结的友谊使他们弱化了阶级界限，更支持社会统一，转向左派。德国著名记者汉斯·蔡勒(Hans Zehrer)写道：“从战场上归来的一代应何去何从？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代人将转向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深刻地体会到社会的不平等，懂得了社会仇恨的原因。”<sup>①</sup>

然而，战争的作用只是唤醒了这些大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德国式的、倡导阶级合作的“社会主义”是他们能接受的最大尺度，而“所有阶层愉快合作”则是他们从未曾设想过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只是平均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永远是“洪水猛兽”。

从1917年开始，赢得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大学生对和平的向往更加迫切，爱国热情也锐减。因此，当1918年11月一个民主制共和国突然出现时，这对于这些历经战争的大学生们来说是毫无准备的。那个为之浴血奋战的“祖国”霎时间改头换面，她还是那个值得为之倾心付出的祖国吗？所以，他们是抱着怀疑、抵制、的态度复员回国的。截至1919年1月17日，当全部“前线青年的一代”都回到祖国时，战争的创伤，复员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几乎令他们窒息。历经四年的艰苦奋战，国内文化和政治发展已经完全是另一幅天地，现在，他们已经脱节了，原先的认知和信念变得一文不值了。如今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标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坚持呢？他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当年懵懂的少年如今已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可是在社会角色上，他们还是新生儿。

## 本章小结

1795—1815年，一系列政治事件促使德意志知识分子从“启蒙

---

<sup>①</sup> O. E. Schüdekopf, *Linke Leute von rechts, Die nationalrevolutionären Minderheiten und der Kommun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 Kohlhammer Verlag, Stuttgart, 1960, S. 42.

思想”向“历史主义”转变。在拿破仑军队的横冲直撞下，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也一并渗透到了德意志地区，德意志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统一国家的巨大力量和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德意志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但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的英雄主义也一并被唤醒，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主义理念。这种以“义务、秩序、祖国”为理念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和统一运动的口号。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大学生社团及其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根源于非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悲观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这一进程一发不可收拾，大学生们高喊着“保卫祖国”的口号，成为德意志民族自由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先锋。

1871年，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虽然形式上是一个宪政国家，但实质上仍然延续了强烈的封建主义传统，大学生社团及其运动在强权政治的“光环”下也逐渐丧失其进步主义观念，成为君主制的卫道士。

19世纪末，战争舆论的甚嚣尘上使大学生们陷入狂热的爱国主义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怀着保卫祖国和人民的信念浴血奋战。但是战争亦是一把双刃剑，惨烈的伤亡使他们意识到和平安定的宝贵，也使他们打破了排外性的精英观，他们从战壕中学会了宽容，不再自视为高高在上的“精英”，与各个阶层出身的战友组成了“行动共同体”(Tatgemeinschaft)，这一共同体成为了日后“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根基，德国著名文化史专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就把这种“行动共同体”等同于“战斗合作社”。<sup>①</sup>战争的惨烈也使他们懂得和平稳定的重要意义，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态度。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正是这些“前线青年的一代”通过大学生团体的日常集会将和平、合作等民主主义价值观灌输给了新一代大学生。

---

<sup>①</sup> Ferdinand Tönnies, *Die Sozialpolitik nach dem Kriege*, In: Friedrich Thimme & Carl Legien (Hg.), *Die Arbeiterschaft im neuen Deutschland*, S. Hirzel, Leipzig, 1915, S. 153.

## 第二章 “前线青年的一代” (1919—1923)

魏玛共和国的初期，即1919—1923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德国丧失了拥有7 325 000人口的73 485平方公里的国土，即丧失了10%的总人口和将近1/7的土地，并且要承担起总额达1 320亿金马克的赔款。这一系列打击造成了魏玛共和国初期的经济困境，陷入了通货膨胀与生产停滞。这一时期也是德国大学生与新生民主制之间博弈、磨合的时期，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德国大学生生活的多面像。在这段时间里，德国大学生的主体是从前线复员的“前线青年的一代”，这些大学生们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震惊，到勉强接受现实，最终积极合作的转变过程。本章关注的问题是：“前线青年的一代”怎样影响了魏玛初期大学生的政治态度？这一时期的大学生面临什么样的生存困境？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参与到保卫国家和自身精英地位的行动当中？唯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弄清“前线青年的一代”的真实面貌。

### 第一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与大学生的政治态度

魏玛共和国时期，存在三代不同的青年人，第一代是1890至1900年之间出生的一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已经接近20岁，他们是亲身参与到战争当中的一代，对战争有最直接的体验，是“前线青年”(junge Frontgeneration)；1900—1910年出生的人被称为“战争青年一代”(Kriegsjugendgeneration)，他们虽没有上过前线，但却通过兄长们的言传身教，对战争形成了深刻、残酷的印象，并在政治上走向激进。1910年之后出生的一代则被称为“战后

一代”(Nachkriegsgeneration), 他们并没有亲身参与战争, 人生最深刻的印象是超通胀时期, 因此他们对共和国几乎没有什么好感。<sup>①</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大部分大学生都上了前线, 战争结束后, 他们作为复员士兵重新回到校园, 截至1919年1月, 全部“前线青年”复员回国。根据统计, 战争的最后一年(1918年)时德国所有高校共有大学生25 079人, 而到了1919年, 这个数字飙升至111 671人, 增长率为345.3%。<sup>②</sup>根据往年的正常增长率——5%左右——可知, 战后德国的高校中, “前线青年的一代”成为大学生的主体, 因此, 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大学生从总体上能够被称为“前线青年的一代”。

### 一、“前线青年的一代”与新生共和国

1918年, 一个共和国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 就像突然从天而降的怪胎一样诞生了。与1848年“三月革命”不同, 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是一场没有大学生的革命。他们没有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在于: 革命爆发时, 大部分大学生还在战场上, 尚处于战争的封闭状态, 对国内形势一无所知, 这就能够解释为何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对政治和革命抱有偏见, 许多大学生将战后的政治转变视为对民族的背叛, 对皇帝的不忠。

“十一月革命”后, 大学生们目睹了国内骚乱的暴力和血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尚历历在目, 他们不能容许祖国再经历一场残酷的内讧。因此, 传统大学生社团强烈反对左派“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Arbeiter-und Soldatenrat), 反对暴力革命及激进倾向, 向往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缓和, 即使服从一个从未有过的共和国。他们表明了自己对“十一月革命”的立场: “在经历了革命一周的破坏后, 我们的民族仍保存了有生力量, 我们能找到通往未来的光明大

<sup>①</sup> Ulrich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 - 1989*, Dietz, Bonn, 1996, S. 43.

<sup>②</sup> *Deutsche Hochschultatistik*, Bd. 7, Berlin, 1930, S. 4.

道……对于我们而言，君主制思想从来不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幌子，而是一种荣誉的、最深层次的认同。虽然国民议会是反对君主制的……但(维护共和国能够使)我们民族的思想大厦不倒塌。我们不是要支撑整个大厦的某根柱子，而是要维护它整个根基的稳健，维护我们民族的世界观。”<sup>①</sup>

1919年1月，一篇文章更加明确地呼吁大学生应认清现实：“只有自我反省才能正确认清现状。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实是这样的：国家总理这个新领导是德意志共同生活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将革命视为发展进步的硕果，将我们从狭隘的视野和黑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的现实，不要妄想重新回到老的制度中去，我们必须接受眼前的现实。”<sup>②</sup>这些大学生的言论说明，虽然对1918年革命的态度有诸多保留，但在一周之内，大学生还是积极地改变了无政府状态，参与了国家的新政。

11月30日—12月2日，全国大学生举行了大学生委员会选举。<sup>③</sup>在这次选举中，“高校党团”获得5个席位，“德意志大团体联盟”获得2个，“统一团”与“社会主义大学生党团”各获得1个。

---

<sup>①</sup> K. Maßmann, *Der Weg in die Zukunft*, In: *Akademische Blätter*, 33. Jg., Nr. 9, 1. Dez. 1918, S. 89ff.

<sup>②</sup> H. Gerber, *Selbstbesinnung*, *Akademische Blätter*, 33. Jg., Nr. 10, 1. Jan. 1919, S. 111.

<sup>③</sup> 在大学生团体中，有四支主要力量。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是“高校党团”(Hochschulpartei)，成员多来自保守阵营学术团体。该团体主张建立大学生议会，使大学生享有高校自主权和自治权，包括任命讲师的权利；在魏玛国民议会召开后，他们支持新政府。第二支是奉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德意志大团体联盟”(Deutsche Großgruppe)，几乎囊括了所有传统大学生社团(Korporationen)。它倡导高校改革，大学生自我管理，改变生活结构，反对外国移民。魏玛国民议会召开之后，他们也是支持新政府的。第三支团体由广大犹太大学生组成——“统一团”(Einigungsgruppe)，他们是“高校党团”政策的追随者。最后一支是由左派大学生组建的“社会主义大学生党团”(Sozialistische Studentenpartei)。他们坚持其一贯主张，如废除学杂费、改变考试规则、由国家为大学生提供生活资助等。

在这次选举大会上，大学生们做出决定：不论新国家如何，为了秩序与安全的重建，都与政府合作，呼吁召开“国民议会”，进行高校改革。在随后一周之内，传统大学生社团组建了柏林大学生志愿军，目标是保卫民主共和政府不受斯巴达克党暴动的侵害。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保守主义者和君主制的拥护者，大学生的本质立场没有改变，但这并不能用来断定他们是反动的。只是他们需要时间来消化、理解战争的结果。对于新的共和制，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信任。但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决定与新政府合作。正如新教大学生社团“温高夫”的刊物所讲的那样：“亲爱的兄弟们，无论我们内心怎么讨厌祖国发生的新变化，但现在是放下所有批评和懊恼的时候。当航船在暴风骤雨的海面上航行时，水手们不应去指责船长或者舵手的失误，而是要相互扶持，要呐喊：全体船员，各就各位！携起手来乘风破浪……今天，我们要顶住一切困难与新政府合作，每个人坚守好自己的岗位。我们遇到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乌云密布、雷声轰鸣，看不到曙光，举目环顾暗无天日。但我们也深知，在这乌云背后就是万丈霞光，风雨过后是彩虹。父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为新时代而战，走上新的道路，压制向往美好旧时光的浓浓乡愁。”<sup>①</sup>

其实，在大学生的心目中，“国家”与“祖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家”(Staat)是一个短时段概念，是暂时性的，是建立在有形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的全民“约定”，其社会基础是个体“公民”(Staatsbürger)。而“祖国”则是一个长时段的概念，是由无形的语言、血统、文化等软因素形成的“民族”(Nation)或“种族”(Volk)组成的，与政治无关，其社会基础是“人民”(Volksbürger)。国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因此，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强权国家(Machtstaat)，只要有助于达到最终目的，就是好国家。反正，采取何种国家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这

<sup>①</sup> F. Streetz, *Sursum corda*, In: *Wingolfsblätter*, 48. Jg., Nr. 4, 26. Nov. 1918, S. 83.

个国家体制内，能否使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国家领导者。大学生心目中的国家典范是“专制国家”(Obrigkeitsstaat)，霍亨索伦王朝领导的普鲁士就是最佳代表。

但是，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前线青年的一代”出于对战争的心有余悸，出于对国家的义务感，才号召全体德国大学生拿出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重新帮助国家恢复稳定，建立秩序，这当然也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 二、“前线青年的一代”参政思想动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接由战争和革命导致的“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对政治参与的兴趣是空前绝后的。按照德意志大学生的一般传统，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应驰骋于精神世界，远离喧嚣的政治世界。但这代大学生在魏玛时代的政治热情尤其高涨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失败和纷繁的政治动乱交错在一起，艰难的生活困境和传统地位的岌岌可危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看法和参政动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实践，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前线青年的一代”的政治参与为大学生新的政治态度定下基调。他们通过宣传自己的战争经历，表达了不同的世界观。通过他们的教育，年轻大学生朦朦胧胧地接受了对“人民”、“祖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观念，但却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这种非理性主义看法不一，主要与“德意志民族”、“人民”、“祖国”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民族意识”(Nationalbewußtsein)是所有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其他的动机都是这个主要动机的变形，例如“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动机和“社会主义”(sozial)动机，但是各动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常常交织成一种整体性的政治理想。

首先，“前线青年的一代”参政议政的动机是“民族主义”(National)。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是为了“故乡”(Heimat)而战的，将保卫国家与民族作为己任，因此，毫不奇怪，战后，大部分大学生自然将保卫民族作为义务。为了捍卫民族统一，他们要拯救文化

和思想，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这种思想被定性为“民族—文化主义”(national-kulturell)思想。

与战前不同，战后的“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将政治态度转化为道德问题，因而也就将政治态度与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民族的任务现在是建立“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这不仅是政府和议会的责任，而是整个民族需要殚精竭虑的事业。<sup>①</sup>人们不再是单个的社会或者政治分子，而是要结成集体意义上的“人”(Menschentum)。讽刺谚语“政治使人堕落”(Politik verdirbt den Charakter)遭到大学生的否定，变为“不全心全意参与政治的人，他的道德便荡然无存”<sup>②</sup>。国家公民观念成为大部分“前线青年的一代”的共识。他们对国家利益无比忠诚，对共同体的福祉具有高度责任感。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在大学生中间极受重视。

其次，“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e)思潮也成为战后大学生们参与政治的重要推动力。早在帝国时代，德意志大学生就具有了“人民”(Volk)认同感，他们认为要为“意志共同体”(Willensgemeinschaft)和“行动共同体”(Tatgemeinschaft)而奋斗。因此，对他们而言，“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e)和“民族主义”(national)基本上是同义词。但这两者之间是有微弱差别的，“民族主义”是从国家政治发展的立场出发的，而“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从种族文化发展的立场出发的。

例如，在很多保守主义大学生眼中，“人民”(Volk)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特质上的生活集合体，是与国家政治不相关的。这种思想是建立在非理性和感情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一种对自身种族狂热的信仰和崇拜。“人民”(Volk)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秩序和利益都要服从人民的利益。正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e)的不断激进化，导致了极右“种族主义”(rassisch)的

<sup>①</sup> Krasser, *Die modernen Aufgaben dees katholischen Akademiker*, In: *Academia*, 32. Jg., Nr. 12, 25. 4. 1920, S. 363ff.

<sup>②</sup> H. Roeseler, *Die Pflicht der Jungen*, In: *Die Hochschule*, 3. Jg., H. 7, Okt. 1919, S. 198f.



出现。

最后，解决面临的现实困难也成为大学生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19年维尔茨堡大会开始，由于现实困境所造成的生活压力，“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简称DSt)就将为大学生谋福利作为自己的任务。它不仅是一个类似于工会的经济组织，而且有自己的文化责任——如果大学生能够在政治上团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最终就能团结全体人民，实现民族共同体的愿望。在哥廷根召开的全国大学生大会上，大会所宣布的纲领的第二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责任：“处理涉及大学生的祖国、社会和文化问题……无论信仰及政治倾向如何”<sup>①</sup>。

1921年1月18日，“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t)的执行委员会发出号召：“德国的需要，德意志民族未来的担忧，德意志精神的保持，是我们德意志知识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应为祖国而献身”<sup>②</sup>。在1922年5月31日的《莱茵纲领》中又重新声明：“德意志全体大学生的目标是为未来德意志文化的发展以及为民族共同体而奋斗”<sup>③</sup>。为此，“社会主义”(social)——即倡导各阶级合作，消除阶级隔阂——成为大学生的新任务，尤其在天主教大学生和新教大学生中。“UV赞成天主教今天的任务……消除非社会主义的偏见。”<sup>④</sup>只有消除社会鸿沟，才能建设健康的民族。<sup>⑤</sup>

魏玛共和国初期，在“前线青年的一代”的影响下，大学生在政治方面比之前更加主动，其政治参与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民族—保守—民主主义(national-konservativ-demokratisch)阶

---

<sup>①</sup> Hellmut Volkmann,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ihrer Entwicklung seit 1919*, Quelle & Meyer, Leipzig, 1925, S. 213.

<sup>②</sup> *Nachrichtenblatt der DSt*, 2. Jg., Nr. 5, 24. 1. 1921, S. 41.

<sup>③</sup> Hellmut Volkmann,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ihrer Entwicklung seit 1919*, Quelle & Meyer, Leipzig, 1925, S. 265.

<sup>④</sup> J. Vincke, *Unitas*, S. 3, In: *Unitas*, Beilage zur *Unitas*, 60. Jg., Nr. 7, Juli 1920.

<sup>⑤</sup> A. Timpe, *Die katholischen Akademiker und der Wiederaufbau Deutschlands*, In: *Unitas*, S. 6, Beilage zur *Unitas*, 60. Jg., Nr. 7, Juli 1920.

段，即从十一月革命到1919年初。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开始改变。试图将战前的保守主义态度与他们的政治经历相调和。协调阶级关系的“社会合作主义”思想成为他们政治的新主题。第二阶段，民族—民主主义(national-demokratisch)阶段，从1919年初到《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数月，大学生希望“以现实为基础”重建国家。首当其冲的是“前线青年的一代”，建立“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t)，接受魏玛政治体制。积极寻求与新国家的沟通。第三阶段，民族—种族主义(national-völkisch)阶段，从《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数月至1922年上半年。“前线青年的一代”的影响开始减弱，大学生走上了“文化民族主义”道路。“德意志高校圈”(Deutscher Hochschulring，简称DHR)得以成立且快速发展，最终成为强有力的大学生政治组织。第四阶段，“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阶段，该阶段从1922年第四届威尔茨堡大学生大会开始，“前线青年的一代”的影响进一步减弱，“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的主导角色变为奉行“文化民族主义”的大学生。

总之，为了捍卫国家的统一，为了造就一个文化民族的共同体，同时也为了排除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生活压力，魏玛初期的德意志大学生一改过去不参与政治的传统，开始相当积极地投入到魏玛政治生活中来，但这种参与最初并不是政党政治性质的，而是以祖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然而，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

### 三、“前线青年的一代”与代际关系

理解大学生参与政治的动机，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社会学分析。一般而言，大学生在18—20岁时进入高校，然后进行五至六年的学习。这是人生中相对较短的一个时间段，这个学习时段被社会观念定义为青年时期。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很特别，他们既不是儿童，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成年人，因为他们既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但并没完全脱离家庭，也没有参与公众生活、法律生活和经济生活当中。虽然年轻的大学生心理和生理都尚未成熟，但他们却拥有政治选举权，要离开他们早已习惯的家庭开始独立生活，要为自己的

行为承担一切后果。

年轻人这种两面性正是他们进入高校这个时间段中的特点，“大学生身份”意味着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未来生活的铺垫，但这种自我认同被浓缩进魏玛共和国时期后，尤其是复员大学生回国后，就变得十分复杂。

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本来能够通过教育完成“向上爬”的理想，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或是找到一份安稳高薪的工作。但在魏玛共和国，这种理想却因为“知识分子的过剩”而破灭了。<sup>①</sup>

共和国初期，“前线青年的一代”首先遭遇的是社会与心理变迁的困境。战争失败，使他们必须完成从“精英”到“失败者”的角色调试，这对他们而言是痛彻心扉的。复员大学生士兵大概有11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军官。但现在，他们又一贫如洗了，状况十分凄凉：“虚度了五年光阴，健康没了，工作没了，什么都没了。他们却不得不重新回到课堂，在作业本上继续做作业，没有朋友，没有学习的热情，与19岁刚通过高考的学生并肩而坐”<sup>②</sup>。此外，他们还陷入了经济困境，社会地位大大下降。“75%的已婚大学生已经无力承担起父亲的责任——租得起房子，养得起家人，付得起听课费及其他杂项支出。至少40%的大学生申请不到房屋补贴，最多有10%至15%能够获得1200~1500马克的津贴。奖学金也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了。”<sup>③</sup>更凄惨的是，未来的希望也很渺茫。大学生杂志上充斥着对就业的警告：律师、化学家、医生、物理学家、教师，这些行业全都亮起了红灯。原因在于：①人文中学毕业生不能担任军官，因此，现役军人退伍进入了大学，导致毕业生人数增多。②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意志—波兰地区、德意志—捷

<sup>①</sup> Morris Beatus, *Academic Proletariat. The problem of overcrowding in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1918-1933*, Diss. Phi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5.

<sup>②</sup> *Akademische Blätter*, 15. 10. 1919, S. 128.

<sup>③</sup> *Wingolfs-Blätter*, 5. 2. 1919, S. 181.

克地区、德意志—丹麦地区的德意志人必须回到德国本土。大学生不能够抢夺他们的职位。③糟糕的经济状况迫使国家和私人精简人员。①

此外，代际落差也是导致战后大学生苦闷的原因。根据曼海姆的理论，上一代人在代际传承中是“文化承载者”(Kulturträger)。战后，许多大学生希望能回到1918年前父辈的生存状态。然而在魏玛共和国超通胀最严重的20年代初期，两代人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首先遭受冲击的是中、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上一代人接受的是古典式的精英教育；年轻一代强调自己的成熟，他们要减少父辈的庇护，形成独立的人格。《凡尔赛和约》首先触动了经济和社会，接着是政治、教育，大学生成长的根基被动摇。中产阶级父母无力再为大学生提供经济支持和“向上爬”的台阶，上一代人的精神榜样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已然是“无本之木”。正如德国文化史学家奥托·皮珀尔(Otto Piper)恰如其分评价的那样：“知识青年们从未过过无忧无虑的富贵生活，因为他们的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德国战败的影响”②。他们期盼上一辈人为他们开辟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正如1931年一名柏林的高中生对成人世界的职业教育表现出的漠不关心那样：“我不想总是重复：我们的漠不关心根本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是你们的问题，你们这代人的问题，你们没有能力，为我们铺平一条康庄大道”③。

在对父辈的批判中，知识青年形成了一种“反理智”(Antiintellektuell)论，这种理论的大发展，最终形成大学牢固的“实证主义”风格：大部分大学生认为空洞的理想是“无前提的学

① Josef Hofmiller, *Hand! nicht Kopf!* *Frankfurter Zeitung*, 23. 7. 1919.

② Otto Piper, *Der politische Radikalismus auf den deutschen Hochschulen. Ein Beitrag zur Sozialpsychologie und Sozialpädagogik*, In: *Deutsche Rundschau*, Feb. 1932, S. 99.

③ Reinhold Schairer, *Die akademische Berufsnot. Tatsachen und Auswege*,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Jena, 1932, S. 83.

术”(Voraussetzungslose Wissenschaft)。由此,作为政治精英的大学生走上了反对教育的道路,因为此时的高等教育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物质生活的改善或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正是纳粹主义对大学生的突破口。

战后,大学生也将矛头指向高等教育,以前他们或是能保持父辈的社会地位,或是有社会晋升的希望,现在社会流动性停滞了,未来没有了希望。到1924年,一个大学生在大城市要等八年才能当上的士司机。<sup>①</sup>大学生无产者化了!陷入危机的不仅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而且洪堡的教育理论也陷入困境。原本代表着学者阶层声誉的高等教育现在却沦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种对高等教育的失望也导致了大学生不再将其奉若神明,而只是当作一种谋生手段。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强烈反对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和朗贝恩(Langbehn)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以此来维护学术的优先权。<sup>②</sup>哲学家埃德加·斯普朗格(Spranger)也认为,大学生不愿再思考,只是机械地学习。他将这称之为“文化病态的学术敌人”(Wissensfeindschaft als Kulturkrankheit)<sup>③</sup>。实际情况比他预料的更严重。托马斯·尼培代指出,当时的大学生只是将学术作为一种生存手段。<sup>④</sup>

代际冲突也表现在大学生团体中,角色期望值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个体成员与集体之“我”产生摩擦。主要矛头指向长老团,指责他们在困难的现实下,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不关心年轻

---

① Rudolf Rust, *Die Berufsaussichten der Juristen, Die Schwarzburg*, Feb. 1932, S. 61.

②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③ Eduard Spranger, *Psychologie des Jugendalters*, 11. Aufl., Quelle & Meyer, Leipzig, 1929, S. 278.

④ Thomas Nipperdey,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dolf Grimme (Hg.), *Kulturverwaltung der zwanziger Jahre. Alte Dokumente und neue Beiträge*, W. Kohlhammer, Stuttgart, 1961, S. 29-32.

人的艰难处境。<sup>①</sup>大学生在大学生组织中找不到位置，这也加快了大学生团体的碎片化。

这种代际冲突是市民阶层内部的分裂，是“未来知识精英与其出身的疏远”。<sup>②</sup>社会文化上明显陷入孤立、迷惘的大学生在 20 年代处于“认同真空”(Identität-Vakuum)中。随着这种精英感的崩溃，大学生的思想危机达到高潮。

#### 四、大学生社团内部的政治教育

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实践中，“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逐步认识到从理论上理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的政治教育活动在各个领域展开，向大学生灌输“民族主义”(national)的社会价值观，沟通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联系，以此来巩固民族和社会内部的团结。

这种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运作以及一种新的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它包括判断力训练和责任感教育。他们希望用精神、伦理的国家秩序和统一来取代马基雅弗利机械式的国家理论。在他们看来，谁真正盼望德意志民族的重生，谁就有义务在思想上用国家、民族或人民的思想武装自己。这种政治教育的手段既包括了思想熏陶，也包括了对具体的国家政策、政治事件及现实问题的讨论，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反对议会主义和议会民主制，主张推行人民观教育的，与此同时，也是通过大学生社团内部的政治教育来推行这项工作的。

首先，无论是广大的“前线青年的一代”还是战后新一代大学生，都厌恶政党政治，反对议会主义和议会民主制。表面看来他们态度一致，但背后却出于不同的原因。

“前线青年的一代”和年轻一代大学生中赞成“民族主义”(national)的人认为，党派在碎片化的相互斗争中，操纵着价值观，

---

<sup>①</sup> Herbert Engst, *75 Jahre Leipziger Burschenschaft Suevia zu Köln. Vom Werden und Wesen einer deutschen Korporation*, Köln, 1961, S. 119.

<sup>②</sup> Jenö Kurucz, *Struktur und Funktion der Intelligenz während der Weimarer Republik*, Grote, Köln, 1967, S. 119.

只为一己私利，缺少真正的国家思想和民族统一原则。他们不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民族真正的利益则成为党派利益的牺牲品。因此，他们批评的矛头不仅指向党派政治，而且指向与之相关的议会政体和政治机构。他们反对马基雅弗利的机会政治主义，赞成各种社会利益团体的理性合作，是一种理想模式的议会民主制。

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的大学生则认为，党派政治是一种小团体主义，它分裂了人民的力量，不能公正地对待人民的需要。“党派政治就是强权政治的变体，是与人民为敌的。”<sup>①</sup>“只有党派政治的罩子被拿走了，人们才能自由观察，党派和阶级仇恨才会消失。”<sup>②</sup>因此，在他们看来，大学生的品格教育不应当包含任何党派教条或党派词语，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应当是大学的目标，而党派政治则是对大学生最严重的犯罪。党派政治“应当成为每个大学生的天敌”<sup>③</sup>。而且，大学生还决定要从源头上反对党派政治，因为现今的党派政治都是起源于威廉时代的。因此，要建设新的、真正的保守主义生活，要具有“集体观念，民族意识与责任感”<sup>④</sup>。

其次，大学生政治教育的两大重要内容即“公民观教育”与“人民观教育”。公民观教育的核心是“国家”，这种教育是由国家教育当局发起的，目的是维护魏玛共和国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而人民观教育的核心则是“人民”，这种教育是由大学生社团的主流派们发起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所谓日耳曼人的民族共同体，两者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是完全对立的。

在“公民观教育方面”，为了使大学生“对公共事件有坚定的评

---

① J. H. Garbe, *Die metapolitischen Grundprobleme der neuen Generation*, In: *Die Hochschule*, 3. Jg., H. 10, Jan. 1920, S. 333.

② O. Bethke, *Burschenschaftliche Hochzeit und Parteipolitik*, In: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H. 1/2, 37. Jg., Okt.-Nov. 1922, S. 1.

③ K. Hoffmann, *Die Akademische Jugend und die Parteien*, In: *Grenzboten*, 78. Jg., Nr. 46 u. 47, 12. u. 19. 11. 1919.

④ *Politik und Jugendbewegung*, In: *Die Hochschule*, 3. Jg., H. 10, Jan. 1920.

判，在动乱中形成坚定的立场”，<sup>①</sup>魏玛国家的各个机构对大学生开展了政治教育活动。教育局弗里德里希·拉布(Friedrich Raab)认为，人们要用科学的观点指明现实的政治意义。政治教育、政治责任、政治理解和判断能力相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人们接受某个预设的思想，而是教会人们做决定的方法，给他们选择的机会。<sup>②</sup>政治教育本应是广泛的、无偏见的，以个人形成自己的观点为目标的。

这种“公民观教育”的目标是教育大学生具有国家公民意识，支持现在的国家——魏玛共和国。“公民教育就是要让人们知道，作为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什么。”<sup>③</sup>其中包括勤奋劳动教育、公民教导、经济和技术教育、唤醒社会意识的教育、道德教育，所有内容都是以热爱国家为主题的。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国家公民、建立国家观念。但它没有特定目标，比如民主制国家观念，而是仅仅以国家为主题，是一种广泛的教育。

然而，大学生们自己却主张一种所谓的“人民观教育”，这种“人民观教育”并不关心政治问题，而致力于民族的自我认同。因为他们认定，“政治是一种艺术，并不是科学”<sup>④</sup>。因此，他们希望放弃原来理论化的公民教育，其理由是，大学生生活在国家中，他们应当学会将自己理解为国家的主人。毫无疑问，这种“人民观教育”灌输的是“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观念，目的是建立德意志民族的内部统一，建立生气勃勃的民族共同体。从《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人民观教育”更加兴盛了。

“人民观教育”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政治评论家威廉·斯塔普

<sup>①</sup> Spectator, *Politische Bildung, eine Umschau II*, In: *Die Hochschule*, 4. Jg., H. 11, Feb. 1921, S. 324.

<sup>②</sup> Friedrich Raab, *Politische Bildung auf deutschen Hochschule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Berlin, 1922.

<sup>③</sup> H. Roeseler, *Eine deutsche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In: *Die Hochschule*, 4. Jg., H. 7, Okt. 1920, S. 204f.

<sup>④</sup> F. Koepf, *Politische Erziehung*, In: *Akademische Blätter*, 36. Jg., Nr. 15, 1. 12. 1921, S. 179.



(Wilhelm Stapel)。他认为“人民”(Volk)是最高的世俗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命运的人类的天然道德共同体。个人并不是个体，而是人民的一分子。教育必须与民族现实相符合。民族文化应包括：对德意志的虔诚，德意志艺术和德意志科学。教育的目标应以民族共同体为己任，培养出“人民”(Volksbürger)。

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公民观教育”与“人民观教育”之间的对立尤其加深。奉行“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的大学生希望废除《凡尔赛和约》，解放德意志民族。他们反对共和国，认为国家不是目标，只是手段，教育应培养“德意志品格”，因而走向了非理性主义。这是“人民观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而这里已经涉及反犹太主义的内容了。虽然“人民观教育”也有很多派别，但它们都有共同的坚持——一个种族是靠血统凝聚而成的。<sup>①</sup>

最后，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是由社团开展的。在大部分团体和教育组织中，教育都是有前提的，或是以党派政治为目标，或以信仰为目标，或以理想为目标。

在天主教大学生阵营中，政治教育与天主教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公民”与“人民”的差别不是特别明显。天主教大学生团体的政治教育原则是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疏导。

新教大学生以“温高夫”为代表，1922年6月的瓦尔特堡大会声明新教大学生的任务是：“①致力于建设文化共同体；②政治教育与民族(national)教育意义不同。后者的目标是理解历史价值。民族意识(Nationalbewußtsein)是一种道德任务。③政治教育不是政治，相反，它承担起政治的许多任务，使后者失去必要性。④政治教育是建立在超党派的基础上的”<sup>②</sup>。

<sup>①</sup> F. Koepp, *Politische Erziehung*, In: *Akademische Blätter*, 36. Jg., Nr. 15, 1. 12. 1921, S. 179.

<sup>②</sup> F. Lüpsen, *Verbindungserziehung*, In: *Die Ausschüsse der Wartburgtagung und ihre vom Wartburgkonvent genehmigten Richtlinien und Beschlüsse*, In: *Wingolfsblätte*, 51. Jg., Nr. 12, 11. 9. 1922, S. 269f.

“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 简称DB)最初曾试图融合公民观教育和人民观教育。例如在其1920年的《政治手册》中这样写道:“政治教育是德意志人精神贵族化的手段。理想的教育是民族和政治的统一。”<sup>①</sup>然而,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已明显转向“人民观教育”的立场:“今天和将来,德国生存的形式不是国家,而是国家化的种族,通过共同的历史组成的语言、种族、权利、经济、生活和精神共同体。”<sup>②</sup>正如一名学者所比喻的那样:“政治教育如果缺乏对祖国的爱,犹如没有罗盘的航船,没有品格教育的政治教育犹如没有罗盘的船缺少舵手。”<sup>③</sup>因此,“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政治教育注重品格培养,以塑造个性、丰富思想为主题,唤醒大学生的祖国和种族意识。

进行深入“人民观教育”的是右翼团体“德意志高校圈”(Deutscher Hochschulring, 简称DHR),他们关注的主题是民族的内在价值,此外还有德意志种族纯净(反犹太主义)和民族健康问题。“德意志高校圈”在发展中最终成为了最积极地向纳粹主义靠拢的大学生组织。

## 第二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生存困境与 “知识行业超员”

战后,“前线青年的一代”认识到,解决自身困境的唯一出路

---

① H. Hauseke, *Burschenschaft und politische Bildung*, In: K. Hoffmann (Hg.), *Burschenschaftliches Handbuch für Politik*, W. Grunow, Leipzig, 1920, S. 5.

② H. Hauseke, *Burschenschaft und politische Bildung*, In: K. Hoffmann (Hg.), *Burschenschaftliches Handbuch für Politik*, W. Grunow, Leipzig, 1920, S. 8.

③ H. Hauseke, *Burschenschaft und politische Bildung*, In: K. Hoffmann (Hg.), *Burschenschaftliches Handbuch für Politik*, W. Grunow, Leipzig, 1920, S. 13

是重新恢复稳定秩序，因而，他们在左翼极端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大学生之间维持着一种基本的平衡。但是，正如大学生内部的左翼极端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所反映的那样，1919—1923年，战争的失败所带来一系列后果——巨额赔款、领土骤缩、大量的复员军人、国内冲突和骚乱、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导致大学生不得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通过行使政治话语权来争取自身权利，可以说，他们的动机正是出于解决自身经济困境的需要。此外，与大学的经济困难交织在一起的还有魏玛时代的高校新政和大学生人数猛增，这恶化了从19世纪以来日渐趋于严重的知识分子就业难问题。

### 一、经济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是相互关联的。战败的现实与国内的革命对大学生的经济状况构成了双重打击。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印钞机开始全速运转起来。它就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迅速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1920年时，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尚且稳定，比如，1920年5月30日—11月30日，汇率徘徊在37.25到70.75马克之间。但从1921年起，汇率开始暴跌，到1923年11月，汇率已经是1:4 200 000 000 000，简直是骇人听闻，因此，在德国历史上，大学生从未遭遇像1918—1923年这样的困难。

大学生还没有实现经济独立，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家庭、国家及奖学金。战前，中产阶级家庭尚能供养大学生，他们也是大学生的主体。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对于支付大学的生活费用是足够的。此外，大学生还有一些副业收入，如代课、做校对等。但战争的失败严重损害了这些经济来源，他们的副业门路也被封闭了。

政治力量的削弱、殖民地的丧失、军队的解散、巨额赔款及经济的崩溃，所有这些都使就业难上加难。但战争复员的大学生却使高校中的新生数量大幅提高，而且新国家的教育改革使各个阶层的

子女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这霎时使高校人数激增，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

早在1919年，来自家庭的“月汇票”就不够支付大学生的生活花销，大学生们不得不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在就业领域，战争年代“积压”的大学生也迫切地等待进入知识行业。此外，政治和经济现状却很难再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需求量锐减。1921年秋开始的通货膨胀到1923年达到高峰。大学生平均收入的购买力已经缩水十分之一。此外，从1919年开始，大学宿舍也开始告急。

1920年，魏玛政府首次统计了大学生的生存状况。例如，在德累斯顿，1920年5月，大学生的平均“月收入”为600~700马克。207名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低于300马克，531名低于400马克，699名低于500马克，只有80名每月生活费超过500马克，50名超过700马克。<sup>①</sup>

1920年5月，大学生的最低生活标准在德累斯顿为683.33马克，在柏林为639.42马克，这笔生活费主要用于支付新购置物品和听课费，此外，不与父母同住的大学生还要支付房租、膳食、洗漱、新鞋等，他们平均每月的支出为367马克。这个必要支出在1921年5月增长到510马克(约38%)。1920年11月，在柏林，不与父母同住的大学生每月支出为639.42马克，年花销为7673马克：其中膳食3041马克，房租1200马克，取暖费和照明费540马克，衣物1964马克，教育520马克，其他435马克。<sup>②</sup>

以法兰克福和达姆施达特为例，大学生整体的月收入情况见表2-1<sup>③</sup>：

<sup>①</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f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25.

<sup>②</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f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25.

<sup>③</sup>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zeitung*, Nov. 1920, H. 11; *Darmstädter Hochschulzeitung*, 10. Jg., 1921, H. 5.

表 2-1 法兰克福与达姆施达特大学生月收入状况

	法兰克福	达姆施达特
200 马克以下	1%	3.9%
200~300 马克	17.8%	24.5%
350~500 马克	35.5%	—
500~600 马克	19.6%	40.9%
600~800 马克	15.7%	19.7%
800~1 000 马克	9%	—
1 000 马克以上	2.2%	—
其他	0.2%	3.3%

法兰克福的平均水平为 583 马克，达姆施达特为 520 马克。达不到 600 马克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大学生比例为：法兰克福 73.1%，达姆施达特 72.6%。<sup>①</sup>

1920—1921 年冬季学期，图宾根大学 65% 的大学生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各个专业平均每月的开销为：神学 530 马克，医学 450 马克，牙医 460 马克，人文科学 360 马克，自然科学 400 马克，化学 480 马克，经济学 410 马克，法学 495 马克。整体平均水平为 420 马克。但仍有 6% 的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不足 200 马克，远远低于最低生活水平。<sup>②</sup>同样在 1920—1921 年冬季学期，一项调查显示，5 214 名慕尼黑大学生中的 20% 陷入“毫无希望”的境地。平均生活费为 600 马克，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生活在最低水平下的大学生比例为：综合大学 61%，技术高校 72.1%，商业学校 29%。只有在商业学校中超过半数以上的学生超过最低生活标准。<sup>③</sup>

<sup>①</sup>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zeitung*, Nov. 1920, H. 11; *Darmstädter Hochschulzeitung*, 10. Jg., 1921, H. 5.

<sup>②</sup> Hans Gehrig, *Übersicht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Studenten an den einzelnen Hochschulen (SS1922)*, In: *Nachrichtenblat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III*, Wien, 1922, S. 2.

<sup>③</sup> Hans Gehrig, *Die Entwicklung der studentischen Lebenshaltung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Wirtschaftsnot und Selbst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de Gruyter, Berlin/Leipzig, 1923.

一年之后，即 1921—1922 年冬季学期，一项对慕尼黑地区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支出需要 600~800 马克，而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仅为 400 马克。在低于 400 马克的群体中，综合大学有 14.2% 学生位于此列，技术高校有 16.6% 的学生位于此列；收入在 400~800 马克之间的群体中，综合大学有 53.8% 的学生位于此列，技术高校有 57.8% 的学生位于此列。<sup>①</sup>

20 年代初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令这种生存情况雪上加霜。美元兑马克的汇率从 1921 年开始增长，1921 年 5 月 31 日，美元兑马克的汇率为 63.25 马克，11 月 31 日，暴长到 245 马克。<sup>②</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23 年，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大学生的生活花销、收入状况见表 2-2<sup>③</sup>：

表 2-2 美元兑马克汇率

年 份	美元兑马克汇率	月生活开销	月收入
1913—1914	4.20	100	80
1919—1920 年夏季学期	46.48	876	350
1920—1921 年冬季学期	77.24	872	475
1920—1921 年夏季学期	62.30	880	520
1921—1922 年冬季学期	262.96	1 397	825
1921—1922 年夏季学期	290.11	3 048	1 200
1922 年 10 月	3 190.87	22 066	5 700

① H. Schruff,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Cöthener Studentenschaft. Ermittlung auf Grund einer die gesamte Studentenschaft umfassenden statistische Erhebung im WS 1921-1922*, *Der Ingenieur Zeitung*, 1922, S. 34.

② Jürgen Schwarz, *Studen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23 und ihre Stellung zur Politik*,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1, S. 63.

③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35.

续表

年 份	美元兑马克汇率	月生活开销	月收入
1922 年 11 月	7 181. 10	44 610	—
1922 年 12 月	7 589. 15	68 506	—
1923 年 1 月	17 972. 40	112 027	30 000
1923 年 2 月	27 900. 00	264 300	45 000
1923 年 3 月	21 190. 00	285 400	50 000
1923 年 4 月	24 450. 00	295 400	—
1923 年 5 月	47 670. 00	381 600	70 000
1923 年 6 月	109 906. 00	765 000	110 000
1923 年 7 月	348 842. 00	3 765 100	400 000
1923 年 8 月	4 620 000. 00	58 604 600	—
1923 年 9 月	98 860 000. 00	1 500 000 000	—
1923 年 10 月	25 260 000 000. 00	490 000 000 000	400 000 000 000
1923 年 11 月	4 200 000 000 000. 00		

从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可以看出，生活开销同大学生的月收入在三年半的时间内急剧恶化，生活花费从 1914 年到 1922 年 10 月增长了 4 倍，1923 年 5 月增长了 5 倍，7 月增长了 9 倍，10 月增长了 12 倍。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922 年 4 月，平均的月生活费能够买 19 千克黄油，而这个费用到 11 月仅能买 1/4 千克黄油。<sup>①</sup>受此影响，很多大学生陷入了生活困境，解决大学生的困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战前，大学生的零工工资大约为没有大学文凭的正式工人的 3/4，而到了 1922 年 9 月，不到 1/4。1922—1923 年夏季学期末，

<sup>①</sup> Hans Gehrig, *Die Entwicklung der studentischen Lebenshaltung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Wirtschaftsnot und Selbst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de Guyter, Berlin/Leipzig, 1923.

最多只有没有大学文凭的正式工人的 1/5。<sup>①</sup>在大学生们的眼中，传统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报酬颠倒了。在巴伐利亚的公职人员中，没有大学文凭的技术人员比上过大学的工程师的薪水还要多。在不莱梅，低等的邮递员比一些上过大学的高级官员挣的钱还多。<sup>②</sup>

此外，魏玛初期的大学生们原本能通过假期的临时工作赚钱来弥补生活费的短缺，但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货币大幅贬值，使这个可能也没有了，能得到的生活费同最低生活保障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后，在校大学生们如果能够挨过在校期间的这些困苦，毕业后获得一份有身份、有地位、收入不错的职业，他们至少还能有所指望。但是，这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似乎也靠不住。因为，在魏玛共和国初期，从 19 世纪以来就显现的知识行业超员的现象更加恶化了。

## 二、“知识行业超员”

魏玛共和国时代知识分子的超员现象并不是一个新的或者独特的现象，大学生过剩问题盛行于 19 世纪并持续至 20 世纪。“过剩”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某个行业内部人员饱和，容纳不下更多的就业者。二是“多知”并不等于“厚禄”，个人对自我价值的估计与社会实际能够给予他的金钱和地位之间是有差距的，因此不得不忍受失业或者从事“低贱”的职业。

但在市场相对自由、经济稳步发展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过剩的问题是慢性的，正如威廉二世时代一样，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导致国家政权的不稳定。但是在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下，它的破坏性也许是致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改变了一

---

<sup>①</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22.

<sup>②</sup> *Akademische Nachrichten*, 14. 2. 1921, S. 108.



切，预示了中产阶级的衰落。在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逆转下，超员问题重新变得激烈起来。随着积蓄的崩溃，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遭遇了更大的困难，由于巨大的财政赔款负担，对教育的投资也变得更加昂贵，并且很可能是没有回报的。中产阶级长期以来代代相传的维护社会地位的方式被打破了。

在战后紧张的气氛下，“超员”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从德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局势来看，1918—1919年的德国是相当糟糕的：货币贬值50%、割地赔款，作为中产阶级的成员，知识分子比战前更穷困了，他们预见了一个经济残废的德国，这使他们的职业机会前景黯淡。1918年末，一份学术刊物推测，尽管战争期间有大量知识分子流失，但幸存者却没有得到“战争好处”，知识行业的竞争仍然激烈。人们使用“悲惨的”和“灾难的”这样的词汇来形容。<sup>①</sup>

1919年中期以后，形势越来越严峻了。超员的威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大的不幸，也许是当今德国最悲惨的苦痛”<sup>②</sup>。大部分评论家认为，知识行业已经连年超员，因此，复员的士兵和高中积压了五年的毕业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职业。从1913—1914年冬季学期到1919年战后第一学期，综合大学的学生从60 017人增至89 443人，增长率为50%。在专业学院中，学生增长率更令人惊愕。从1913—1914年冬季学期到1923—1924年冬季学期，技术学院的学生人数从11 542人飙升至20 084人，增长率为115%。<sup>③</sup>从整体上看，高等教育机构中每10万德国公民中的大学生数量从1914年的115人跃至1923年的197人。<sup>④</sup>根据1923年的就业市场和大学注册率的统计，柏林大学的学术信息中心称“如今，没有一个知识行业能够提供就业机会”<sup>⑤</sup>。

<sup>①</sup> K. Würzburger, *Genie, Geist, Arbeit*, In: *Die Hochschule* 2, Dez. 1918, S. 373.

<sup>②</sup> Otto Baumgarten, *Die Not der akademischen Berufe nach dem Friedensschluss*,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19, S. 2.

<sup>③</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ummersemester 1932, S. 17.

<sup>④</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ummersemester 1932, S. 17.

<sup>⑤</sup> *Berliner Hochschul-Nachrichten*, Semester 11, Mai 1924, S. 2.

大学生，特别是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必须在他们踏入大学校门伊始就考虑学费问题，因此他们的支付能力有限。根据莱比锡大学学术信息中心的调查，一些人选择专业时的出发点就是学习的年限及花费。<sup>①</sup>

在这段时期，大部分专业的人数都显著增长了。魏玛共和国头四年的注册率及职业倾向可参见附录表1。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学生选择专业不再紧盯国家公职，而是为日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做准备。通货膨胀引起了经商热，许多人认为私人经济是大有前途的，有关公职人员和教师已经严重过剩的报道更加促使他们坚持这样的选择。<sup>②</sup>

据报道，医学是所有专业中最凄惨的专业。1921年有6000名医生失业——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估计认为全德国已有40000名医生。<sup>③</sup>超员如此严重，以致德国医学协会建议应当在课堂上建议学生们放弃医学专业而从事较不过剩的专业。<sup>④</sup>与超员混杂在一起的公众健康保险体系更加深了医生的悲观主义。医学教师和学生经常表现出受到“灾难性”的医生的“无产者化”发展局势的影响。医学的惨淡使其大学注册率飞速下降。到1925年，医学系学生的数量仅为1914年的1/2或1919年的1/3。<sup>⑤</sup>事实上，超员是大城市和大学城的普遍现象。但在农村里，医生还是比较缺乏。

中学教师的境遇与医生类似。1919年初，中学教师联合会也建议大学生“远离大学！远离绝望的教育过剩！”<sup>⑥</sup>舆论不断重复警告说，大学培养的教师正在用失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无产者”将德国拖入泥潭。<sup>⑦</sup>

从教师行业空前之多的求职者来看，教师联合会和普鲁士教育部

① *Akademische Nachrichten*, 5. 5. 1920, S. 5.

②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ummersemester 1932, S. 30.

③ *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47, 15. 9. 1921, S. 1116-1117.

④ *Akademische Nachrichten*, 31. 5. 1919, S. 12.

⑤ *Akademische Nachrichten*, 16. 11. 1922, S. 51-52.

⑥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27, 22. 1. 1919, S. 32.

⑦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27, 13. 8. 1919, S. 406-407.

在1919年预计，形势稍微好转大约需要10年之久。战前，这个时段几乎没有超过5年的。对于刚刚开始上大学的人而言，则需时间更长，一份大学刊物预计时间为32年，另一份刊物则稍微乐观地预测为18至20年。<sup>①</sup>科学、数学和现代语言学教师的状况比人文科学教师的状况稍好，但即便如此，前者群体也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在医学和教育工作中，展开了一场有关制定人数限制政策的激烈讨论。<sup>②</sup>

到1920年，就业危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sup>③</sup>1920年初，普鲁士教育部长向各州学校发布通告，表达了由于教师过剩而产生的担忧，并建议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应认清形势。<sup>④</sup>随后几年，期望做教师的大学生数量下降了。1922年，一项对高中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只有2%的学生打算做中学教师，而这一比例在战前则高达46%。<sup>⑤</sup>大学生的供应量和实习教师的数量都下降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到1925年，大学中教育专业的学生数量只剩1911年的一半。<sup>⑥</sup>

法律职业中的超员则更加复杂。进入国家法律的前景是黯淡的，至少十年之内的需求已经饱和，因为每三个已经有人的法庭职位上尚有两名替补在等待空缺。<sup>⑦</sup>同时，准备从事法律顾问的人数也大大萎缩，因为十年之内后备雇员都供大于求。<sup>⑧</sup>

1921年，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司法部都发布了公文，“强调法律系学生应认清法律机构和法律职业中绝望的过剩，应换成其他的专业”。<sup>⑨</sup>许多法律系学生蜂拥至工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怀抱。另一些则转学经济，因为学习时间短，费用便宜，而且能大大增加在商业中谋到职位的可能性。由于这个原因，经济领域也很快出现

① *Niedersächsische Hochschul-Zeitung* 1, 8. 10. 1919, S. 39.

② *Deutsche Juristen Zeitung* 24, 1. 8. 1919, S. 675.

③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28, 3. 3. 1920, S. 96-98.

④ *Deutsche Akademische Zeitschrift* 1, 15. 3. 1920, S. 606.

⑤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30, 25. 1. 1922, S. 40.

⑥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31, 12. 12. 1923, S. 368.

⑦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48, 1. 4. 1919, S. 214f.

⑧ *Die Hochschule* 2, Feb.-März, 1919, S. 512.

⑨ *Deutsche Juristen Zeitung* 26, 1. 9. 1921, S. 606.

了没有“面包和黄油”的局面。<sup>①</sup>但这也没能阻挡这场洪流，从1914年到1923年，经济专业的学生从2 400人增长到14 000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年轻人比比皆是。

工程师和化学专业的学生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大量地增长。<sup>②</sup>例如，从1913—1914年冬季学期到1923—1924年冬季学期，化学专业的学生增加了312%，机械工程师专业增加了177%，电气工程师增加了312%。从1919年至1921年，关于化学就业前景的报道都持悲观态度，但是，普遍而言，这个时期没有持续性的失业。20年代初，不稳定的经济实际上也许对技术职业是有益的，因为通货膨胀刺激了“邪恶的资本主义”，正是它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新教神学的学生处境相对较好。战前和战后牧师数量都比较缺乏，而这也是战后少数几个没有出现学生激增的专业之一。除了在工业化时代，很多人不愿皈依基督教外，1919—1920年国家与教会的分裂也是导致人数停滞的原因。

其他的知识群体——如农学家、兽医、档案保管员、图书管理员、作家、编辑和记者——处境各不相同。<sup>③</sup>记者行业存在着异常激烈的竞争。而这由于20年代初报纸和出版物的纷纷倒闭更加恶化了，其后果是，1924年记者失业率达到了20%。<sup>④</sup>

总之，知识行业的就业形势几乎毫无例外地糟糕或不稳定，对于“前线青年的一代”而言，超员的威胁更加赫然耸现。作为劳动力市场最年轻的、最新的和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的经济能力不堪一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处境才更加反映出问题的紧迫性。“知识分子无产者化”的幽灵正在四处蔓延。

### 三、公共救助与自力更生

面对大学生恶劣的生存境况，共和政府致力于改善这种困境。

<sup>①</sup> *Volkswirtschaftliche Blätter* 18, 1919, S. 56.

<sup>②</sup> *Volkswirtschaftliche Blätter* 21, Apr.-Mai 1922, S. 54.

<sup>③</sup> Paul Starke, *Der Mediziner, Die Akademische Berufe* Bd. 4, Furche Verlag, Berlin, 1919, S. 104.

<sup>④</sup> Martha Prochownik,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geistigen Arbeiter Deutschlands*, R. Hobbing, Berlin, 1925, S. 53.

1920年，普鲁士教育部长康拉德·海尼士(Konrad Haenish)写信呼吁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状况。1921年，总统艾伯特也提出帮助大学生渡过经济困难。国家内政部和劳工部开始积极制定工作计划，国家议会建议在文化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sup>①</sup>1924年，货币稳定后，国家内政部有能力为大学生提供资助：1924—1925学年达180万马克，1925—1926学年达300万马克，1926—1927学年达330万马克，1927—1928学年380万马克，后来又增补了90万马克。1930年，由于在危机期间政府采取通货紧缩政策，支持有所下降，仅为320万马克，1932—1933学年只批准了220万马克，但实际发放只有180万马克。<sup>②</sup>

地方政府的帮助也是重要的方面。尤其是普鲁士政府，比如实行优惠公交和铁路票价，还有剧院入场费减免。大学生遭遇的另一个困境是住房：从1926年开始，大学生住房建设纳入计划。

私人资助机构主要来自国外。从1919年开始，美国、英国、荷兰和北欧国家都开始为德国大学生提供资助。1922年秋，德国红十字会收到来自美国的一百万马克资助，用于大学生肺结核的防治工作。1924年1月，美国的“国家路德委员会”(National Lutheran Council)也捐了款。1925年2月，仅梵蒂冈就捐赠三百万马克和大量食物及物资。<sup>③</sup>

德国国内私人的捐助则显得比较冷漠。1924年以前，农业、工业及私人总共只捐出12.5万马克改善大学生的经济困境，这与国外捐款相比显得微不足道。<sup>④</sup>1924年3月，卡尔·杜伊斯堡(Carl Duisberg)尖锐地指出，德国经济本身为大学生提供的资助还远不

<sup>①</sup> *Deutscher Studentenwerk*, 1921.

<sup>②</sup> *Deutscher Studentenwerk*, Apr. 1921; Aug. 1932.

<sup>③</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77.

<sup>④</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77.

及外国，富裕阶层没有承担起国家的责任。<sup>①</sup>

但是，公共及私人资助领域的措施对于广大的贫困大学生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所能提供的帮助是极其有限的，于是，在“前线青年的一代”的推动下，大学生的自助行动得以展开。他们要通过经济上的辅助不仅来达到物质上的目的，而且还将此视为“通过经济上的自救工作，作为重塑精神、高校改革和其他文化的手段”<sup>②</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社会、国家带来的决定性的改变以及继发性的经济困境催生了大学生代议制组织——“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llgemeinen Studentenausschüssen，简称 AStA），在它的督促下，大学生经济自助组织燃起生机。

1919年7月16日至19日，在全德大学生大会上，高校代表就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展开讨论。他们呼吁采取措施来提高大学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德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体力的脑力劳动者”——“工读大学生”（Werkstudenten）。这种新型的将工作和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学生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支持，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持，给他们提供了危机时代的援助，有利于大学生融入社会，接触工人阶层。其中，“前线青年的一代”对“工读大学生”的出现产生了巨大影响。

直到1920年，边打工边读书的大学生仍是少数，与战前水平相当。这不仅是因为马克的贬值幅度尚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而且还源于诸多的社会偏见。工读大学生并不符合大学生的传统观念，作为知识精英是不应该进行体力劳动的。但1921—1923年，迫于经济压力，工读大学生的数量大大增长。

1921年，爱尔兰根大学生大会提出了经济自助的目标：“<sup>①</sup>不

---

<sup>①</sup> Carl Duisberg, *Die Wirtschafts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und der deutsche Werkstudent*, In: *Der Arbeitgeber*, 15. 3. 1924.

<sup>②</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85.

既要消除居间贸易或者降低生活物品的价格，而且还要保证大学生以及高校生活能够维持下去。这是每个大学生面对生死存亡和危机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拯救德国理想的直观表现。<sup>②</sup>整个工作建立在自助思想之上。因此，救助局限于‘前线青年的一代’、患病大学生、参加考试的学生和毕业生。通过积极的合作使他们明白德国的困境，且做好准备拯救祖国。<sup>③</sup>每个陷入困境的大学生都要踏上自助之路。他们可以在上大学前打份工，或者利用假期打工，或者暂时中断一段时间的学业去赚生活费。<sup>④</sup>未来进入高校的门槛不是看父亲的经济地位，而是要与大学生的精神意愿挂钩。通过经济自助，使德国大学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才开放。”<sup>①</sup>这种自助思想得到了大学生的广泛接受，“从来没有哪个经济计划能够如此深入人心”<sup>②</sup>。

表 2-3 列出了工读大学生的增长状况及其占大学生总人数的百分比<sup>③</sup>：

表 2-3 工读大学生人数及占大学生总人数百分比

时间	工读大学生人数	占总人数百分比
1920 年暑假	10 000	9%
1921 年暑假	36 000	33%
1921—1922 年冬季学期	8 000	7%
1922 年复活节	29 000	26%
1921—1922 年夏季学期	15 000	14%
1922 年暑假	47 000	43%
1923 年暑假	62 000	56%

<sup>①</sup> Hans Sikorski, *Studentische Selbsthilfe. Ein Blick in studentisches Leben*, Universität Marburg, Marburg, 1923, S. 8f.

<sup>②</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114.

<sup>③</sup> H. Graven, *Gliederung der heutigen studentenschaft*, In: *Das Akademische Deutschland*, Bd. III, A. Weller, Berlin, 1930-1931, S. 317ff.

但是，在超通胀之下，兼职所赚取的薪水并没有真正缓解大学生的生存困境。例如，1922年夏，“工读大学生”的总体收入为5亿马克，但到了9月，实际购买力只有70万美元，到了10月缩水为31.4万美元，到了11月则仅为13.9万美元。<sup>①</sup>另一方面，生活费则从1922年10月的220马克增长到11月的446马克，再增长到1923年3月的2854马克，工资购买力在一学期之内缩水了80%。<sup>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工读大学生”是大学生们在情急之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为了生存而奋斗的大学生很少是真心想“参加国家的物质生产，以此来直接服务人民”<sup>③</sup>。他们更多的是想赚钱，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可以说，他们是被迫工作的，被迫参与社会联系，被迫开眼看社会，而这在战前对于他们而言不啻天方夜谭。正如研究大学生自助运动的德国历史学者鲁道夫·乌尔姆(Rudolf Wurm)所说：“虽然自由大学生运动首次将自助思想搬上了历史舞台，但战后的工读大学生却是迫于严酷的现实而不得不工作养活自己，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准备充分的计划，而是一项工作。”<sup>④</sup>

自助思想的基础理念就是拒绝一切“外来”援助。例如，社会民主党在“埃尔福特计划”中呼吁免除上课费。此外，废除学杂费、听课费、学生税等。1921年5月13日，国家劳动部、工会联盟和“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t)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帮助没找到

<sup>①</sup> Hans Gehrig, *Die Entwicklung der studentischen Lebenshaltung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Wirtschaftsnot und Selbst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de Guyter, Berlin/Leipzig, 1923, S. 76.

<sup>②</sup> Hans Gehrig, *Die Entwicklung der studentischen Lebenshaltung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Wirtschaftsnot und Selbst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de Guyter, Berlin/Leipzig, 1923, S. 76.

<sup>③</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80.

<sup>④</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95.



工作的大学生，如何使他们避免因经济困难而中断学业。但这些计划全都遭到大学生们们的拒绝。1921年7月，“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致国家劳动部的备忘录上写道：“因为来自各个方面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因此‘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的委员会于1921年7月1日至4日在爱尔兰根召开的第四届大学生大会上，就保险、统计、就业问题同其他科学工作者展开讨论，但大学生对‘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的经济援助一致表示否定”<sup>①</sup>。因为大学生认为这是一种施舍制度，“大学生的自助思想就是反对任何外来的帮助。虽然他们希望得到帮助，但并不赞同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几百年来，大学生都在遭受着外部约束，而外来的辅助也是一种非常父权制的做法，大学生不仅成为了被帮助的对象，而且还成为了某种教育对象。无论是国家、某个基金会或者个人，总是认为这是半义务性质的，对年轻人的金钱或其他帮助也成为某种教育手段，并逐步成为一种施舍，而大学生则成为接受施舍的最大群体”<sup>②</sup>。

德国经济史学家汉斯·格里希(Hans Gehrig)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工读大学生是这样一群大学生，他们明白，陷入灾难的世界并不能通过言语，而是要通过个人的行动来拯救自己。因此，在面临自身的困境和民族的困境时，他们不是加以责难或者搞政治运动，也没有乞求施舍或向他人索取，而是自己解决问题。”<sup>③</sup>通过集体协作，大学生逐渐形成了集体与个人之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关系。

毫无疑问，集体自助进一步培养了以“前线青年的一代”为代

---

<sup>①</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l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46.

<sup>②</sup> Jürgen Schwarz, *Studen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23 und ihre Stellung zur Politik*,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1, S. 82.

<sup>③</sup> Hans Gehrig, *Die Entwicklung der studentischen Lebenshaltung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Wirtschaftsnot und Selbst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de Guyter, Berlin/Leipzig, 1923, S. 83.

表的大学生们团结一致的感情。在同志关系下，他们共同致力于解决经济困难，并乐于接受新型的共同体思想。这不仅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且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这种同志关系越是活跃，越有利于他们寻找理智的经济政策。民众也对他们的自助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通过相互协作，他们与其他生活阶层之间的隔膜减少了。

### 第三节 “前线青年的一代”精英观与军事参与

对“前线青年的一代”来说，相对于战前的环境，现在残破的魏玛社会完全是一种变态。面对紧迫经济的形势和知识行业的超员形势，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加清晰，希望由大学生来领导国家，参与政治决策，从而解决自身的生存困境，这也是他们自身精英观的一种体现。

#### 一、捍卫知识精英的特权思想

关于1918—1923年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可以肯定的是，绝大部分大学生都来自于中产阶级(Mittelstand)家庭，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年轻堡垒。出身特别富有的家庭的大学生或社会底层的大学生人数非常少。这个现象从1871年以来就是如此。

例如，1921—1922年冬季学期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出身状况为：传统资产阶级家庭(包括退休人员，不包括高级公务员)为24.1%，新晋中产阶级家庭为20.5%，“无产者”的中产阶级家庭为52.55%，工人阶级家庭为2.9%。<sup>①</sup>1922年，慕尼黑15000名大学生在各种高校的分布为：出身经济水平较差的中产阶级家庭者在综合大学中的比例为25.2%，在技术高校中的比例为29.0%，在艺

---

<sup>①</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elfarbei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7f.

术学院中的比例为 39.6%。<sup>①</sup>出身高级公务员和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学生在综合大学中的比例为 28.45%，在技术高校中的比例为 29.0%，在艺术学院中的比例为 59.6%。<sup>②</sup>

虽然直到 1928 年，才出现对大学生父辈的职业分布的确切统计(详见表 2-4)，但这基本也是德国大学生家庭出身的一贯传统<sup>③</sup>(见表 2-5)：

表 2-4 大学生父辈的职业分布

职 业	1928 年	1929 年	1931 年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 高级公务员、军官	15.5	15.8	15.4
2. 中级公务员	27.8	27.9	28.6
3. 下层公务员	1.7	3.0	2.7
4. 自由职业者(有大学文凭)	6.3	6.1	6.1
5. 自由职业者(无大学文凭)	1.7	1.9	2.0
6. 大地主	1.5	1.4	1.2
7. 中小地主	4.4	4.2	4.5
8. 工商业者	24.5	23.6	22.7
8a. 工厂主、大商人和银行家	5.7	5.6	5.0
8b. 独立手工业者和小工商业者	13.2	10.6	11.4
8c. 其他工商业者	5.6	7.5	6.3
9. 领导层私人职员	5.2	5.2	6.4
10. 其他职员	7.1	7.2	6.4
11. 工人	2.0	2.7	3.2
12. 其他职业者，无职业者	2.3	1.0	0.8

<sup>①</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fearbei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7f.

<sup>②</sup> Rudolf Wurm,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fearbei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S. 7f.

<sup>③</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d. 7, Berlin, 1931, S. 41.

表 2-5 大学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分布

职业阶层	1928 年	1929 年	1931 年
官员(1-3)	45.0	46.7	46.8
大企业家(6, 8a, 9)	12.4	12.2	12.6
小企业主(7, 8b, 8c)	23.2	22.2	22.2
职员(10)	7.1	7.2	6.4
自由职业者(4, 5)	8.0	8.0	8.0
工人(11)	2.0	2.7	3.2
社会阶层	1928 年	1929 年	1931 年
上流社会(1, 4, 6, 8a, 9)	34.2	34.1	34.1
中产阶级(2, 5, 7, 8b, 8c, 10)	59.8	59.2	59.2
社会底层(3, 11)	3.7	5.7	5.9

(表中括号中数字对应表 2-4 的职业分布)

如上表所示，几乎 90% 的大学生出身于所谓的“市民阶层”（Bürgertum），下层最多只占 6%。

“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是将自己作为中产阶级的后备军来看待的。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对 1918 年 11 月的政治事件不感兴趣，在十一月革命与国民议会期间的政治混沌中，他们关注的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宗教的神圣性、私有财产、保持知识分子“正当薪水”、反对工人大众的“错误倾向”上。<sup>①</sup>大学生期刊《学术瞭望》（*Akademische Rundschau*）警告读者，如果“激进的左派和斯巴达克党掌权的话……那么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将简单地作为资产阶级而剥夺一切特权，成为工人阶级”<sup>②</sup>。除了对没收财产的强烈恐惧外，他们对社会结构的重组极其敏感。简而言之：革命威胁到了财富和教育的物质特权和社会特权，至少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1919 年初，《高校》（*Die Hochschule*）杂志抱怨：

<sup>①</sup> *Akademia* 31, 15. 1. 1919, S. 213.

<sup>②</sup> *Akademische Rundschau* 7, Dez. 1918-Jan. 1919, S. 25.

“革命剥夺了知识分子阶层未来的可靠垄断”。许多“特权”将被“废除”，通过资格考试而建立起来的职业划分将被抹杀。商业的国有化将限制“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大的影响力”的机会。对于知识行业市场，“新的事件(即革命)将会在所有的职业中制造成千上万的知识乞丐……”<sup>①</sup>因此，这些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大学生们为了保卫自己将来的地位是要反对“最坏的统治阶级”<sup>②</sup>。

尽管革命左派被镇压下去，但是在他们看来，新政府乃是手握政权的乌合之众在统治少数精英，其潜在的威胁是巨大的。因此，他们感觉自身所来自的中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对德国社会的控制权。

20年代初，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连同大学生们在内都普遍认为，工人的获益是以知识分子的牺牲为代价的。工人的势力上升了，但知识分子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却下降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政治权力下遭到歧视。<sup>③</sup>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工人阶级享受的物质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份律师杂志在1920年愤怒地写道：“现在手工工人仅凭每天低级的工作就能获得比任何从事经济、政治和道德上更高级活动的知识工作者更高的报酬。”<sup>④</sup>高级公职人员联合会于1924年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反感：“革命提拔了工人大众，今天，有组织的生活处于夺权的热望和工会冰冷的武器控制之下……总是以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将高级公职人员置于这样的经济和法律地位：它的手段已经完全贫困化了，并且必然会导致对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危险。”<sup>⑤</sup>

十一月革命被称为一场欺骗，《大学男生联合会之路》(*Burschenschaftliche Wege*)如此写道：“……革命之徒只能够理解手工工人和所谓的无产阶级白领的政权。至尊的冶金工人、至尊的清洁工人和至尊的办公室职员，这些在他们的沙龙和宴会上被自由、

① *Die Hochschule* 2, Feb.-März 1919, S. 515f.

② *Die Schwarzburg*, Jan. 1919, S. 35.

③ *Deutsche Akademische Zeitschrift* 1, 30. 6. 1919, S. 127.

④ *Deutsche Rechtsanwalts-Zeitung* 17, Feb. 1920, S. 14.

⑤ *Zeitschrift des Bundes höherer Beamten* 6, Feb. 1924, S. 9.

平等和团结的理解冲昏了头脑的人们，欣然接受了这一理念，仅仅是出于近水楼台的自私想法，而丝毫不顾这些会把共和的精神和整个德国都葬送掉的危险。”<sup>①</sup>“智力工作正在贬值，除了经济崩溃的幽灵外，这成为我们整个智力工作系统的灾难。”<sup>②</sup>大学生们感到自己正在失去社会地位，遭到叛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大部分不过是大学生们在发泄内心的愤怒而已，对于推翻共和国，他们实则没有什么行动。相反，他们此时意识到，再纠结于颠覆共和国不利于德意志的本质——“文化”和“民族”。暴动只会丧失更多的利益。尤其是战场上复员的大学生，不愿再经历流血冲突，他们意识到现今唯有恢复稳定的秩序才对自己最有利。正如一份期刊所评论的那样：“无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存还是灭亡……不仅是我们的存在危如累卵，而且捍卫我们崇高的文化价值也岌岌可危。”<sup>③</sup>

出于这种担心，“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才归顺新政府。正如他们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目的就是防止政治形势恶化而殃及自身——“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东西”。虽然大学生们可能小心翼翼地接受了革命的后果和共和国，但他们一致的信念仍然是防止社会局势放任自流，“只有统一和秩序才能拯救我们”。<sup>④</sup>

## 二、保卫国家的军事行动

为了实现国家稳定，恢复秩序，“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动员，参加“市民卫队”（Bürgerwehren）、“安全队”（Sicherheitskompanien）、“临时志愿军”（Zeitfreiwillige）、“志愿军”（Freikorps）等。

“志愿军”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作用不能忽视。复员伊始，“前线青年的一代”希望继续学业，补回失去的时光，他们

<sup>①</sup> *Burschenschaftliche Wege* 11, Okt. 1920, S. 2-3.

<sup>②</sup> *Bayerische Hochschulzeitung* 1, 6. 7. 1920, S. 75.

<sup>③</sup> *S. V. -Zeitung* 35, 16. Dez. 1918, S. 73.

<sup>④</sup> *Akademische Rundschau* 7, Dez. 1918-Jan. 1919, S. 51.

再也不想服任何形式的兵役了。但突发的革命打断了他们继续学习的计划，因为他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使命——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保卫国家的安全，重建内部的平静和秩序。许多“前线青年的一代”并不是自愿服兵役的，而是为了自身学习的安定环境和经济状况。他们内心希望再建立君主制国家，在“皇帝的”精神下重建军队，因为他们比任何阶层都需要“祖国”。但这种幼稚的想法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们才转而支持一个社会民主制政府，面对混乱和骚动，他们准备好应对一切麻烦。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是具有深深的义务感，对民族忠贞不贰。对他们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和平与安全，是市民社会秩序的平复。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采取军事运动。

为了整顿柏林的秩序，一些大学生卫队和骑兵队成立。当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爆发动乱时，许多大学生参与了维护稳定的斗争。他们还组织了志愿队保卫市民的安全，保卫城市的选举环境和国民议会的召开，反对斯巴达克党颠覆政府。1919年1月，符腾堡的大学生保安队成功阻击了斯巴达克党的一次暴乱。在关于战后斗争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大学生卫队……从一开始就是百分之百可靠的，是新战斗力量的坚强核心。”<sup>①</sup>他们数次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到反对骚乱的战斗中。但泽也成立了大学生卫队，保卫国民议会选举和秩序重建。在明斯特成立了由传统社团大学生和自由大学生组建的“大学生人民国防军”(Adademische Volkswehr)。在马尔堡，传统大学生社团(Korporation)承担起保卫选举的任务。在弗莱堡，大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与组建“预备役民兵大队”(Reserve-Miliz-Bataillonen)。在汉诺威，大学生与国防军展开合作。在哈勒，大学生武装起来，保卫一月份的选举。

1919年2月6日，“制宪国民议会”在当地志愿军的保卫下于魏玛举行，其中就有大学生临时志愿军。“国民议会”任命诺斯克(Noske)为国防军首长，且通过了“临时国防军培养条例”。

<sup>①</sup> *Die Kämpfe in Südwestdeutschland 1919-1923*, E. S. Mittler, Berlin, 1939, S. 13.

在共产主义骚乱和3月的总罢工中，斯图加特政府向图宾根大学生求助。在柏林的3月骚乱中，大学生重新武装起来。由于大学生人数有限，普鲁士政府不得不下令停课，全力以赴参加政府行动。他们成立了“保卫家乡知识分子团体”（*Akademische Heimatschutz*），它的任务是反对左派激进革命，保卫大学生的经济安全。大学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使命的：“我们知识分子是人民和祖国未来的精神领袖。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参与政治，保卫国家。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真正成为人民领袖。”<sup>①</sup>这个观点清楚地表明了“前线青年的一代”对国家领导权的看法——他们才是民族真正的领袖。

但在大学生纷纷加入军事组织的浪潮下，巴伐利亚州是个例外。州长艾斯纳（Eisner）禁止一切志愿军。他支持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希望以此建立共同体防御体系。因为这个原因，诺斯克任命艾普（Epp）上校带领巴伐利亚志愿军离开巴州，在图林根听命。

1919年2月21日，艾斯纳在政治骚乱中被大学生谋杀，这件事激起了工人和左派士兵的愤怒，他们斥责大学生为“反革命”，高校则是“反革命中心”。但事实上，大部分大学生并不是反革命的。即使在巴伐利亚，他们也是支持政府，保卫安定的，只是他们反对左派激进主义。

3月13日，文化部长海尼士发表了新的呼吁（*Aufruf an die akademische Jugend Preußens*）：“祖国再一次呼唤你们这些武装的年轻力量。再一次要求你们志愿地，肩并肩地与你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一起，建立新秩序。保卫你们父辈的文化遗产，拯救你们的未来。帮帮忙，德意志青年！”<sup>②</sup>

为了解决大学生自行组建军队的问题，诺斯克建议：“大学生

---

<sup>①</sup> *Akademische Heimatschutz*, In: *Akademische Turnzeitung*, 36. Jg., H. 2, 21. 4. 1919, S. 18.

<sup>②</sup> Gustav Noske, *Von Kiel bis Kapp*, Verlag fü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1920, S. 119.



应当先加入国防军，这样，在必要时就能参加战斗，不需要动员。”<sup>①</sup>1919年4月29日，第二届大学生大会上，大学生就加入军事团体的问题进行讨论。诺斯克在大会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国家充分信任大学生。他宣称，新形势是：“布尔什维主义威胁已经清除。大学生不需要再组建特别的团体。虽然工人阶层并不信任大学生……大学生由此背负了反革命的罪名。但我毫不怀疑，大学生是人民的一分子，是保卫民族国家不受恐怖和混乱威胁的力量！”<sup>②</sup>大会决定响应诺斯克的号召。

随着巴伐利亚的政治分裂越来越严重，在巴伐利亚北部高校举行的全体大学生大会上，大学生决定加入艾普的志愿军：“在和平时代我们宣誓对祖国忠诚，在危难中，我们更不能离弃……1914年以来老的德意志男儿思想重新激励着我们……在现实的困难下，我们迫不及待地加入志愿军，这样我们能够结识来自爱尔兰根、维尔茨堡和慕尼黑的新团体……一种崇高的、甘愿牺牲的精神笼罩着我们。只要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抛弃一切个人利益……不遗余力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只要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我们的学业就无法继续。”<sup>③</sup>

1919年4月9日，慕尼黑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件导致维尔茨堡的斯巴达克党同市民发生激烈冲突，斯巴达克党占领了大学生和士兵的军营。4月21日，大学生呼吁维尔茨堡志愿军行动起来。此外，还有两支图宾根大学生卫队也追随志愿军，1919年5月1日至2日，苏维埃共和国被志愿军消灭。这次事件之后，左派激进运动平息，大学生暂时完成任务，回归校园。

通过参与平定国内形势的斗争，“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重新找回了自信，找回了领导国家的感觉。但由于国内骚乱已经平

<sup>①</sup> *Der akademische Heimatdienst und seine Aufgaben*, In: *Wingolfsblätter*, 48. Jg., Nr. 15, 2. 5. 1919, S. 310.

<sup>②</sup> J. Hollenbach und F. Pinkerneil, *Tagung der Senate und Studentenschaften deutscher Hochschulen*, In: *Academia*, 32. Jg., Nr. 1/2, 15. 6. 1919, S. 25ff.

<sup>③</sup> H. Hagemeister, *Der Erlanger Wingolf in Ohrdruf*, In: *Wingolfsblätter*, 48. Jg., Nr. 15, 2. 5. 1919, S. 39.

息，国家内外局势平定，大部分大学生临时志愿军解散，但他们并不想放弃这个想法——通过大学生加强军事力量，组成长期志愿军，然而政府却拒绝承认独立的大学生军队。1920年4月14日，普鲁士教育部长禁止所有大学生及高中学生自发加入志愿军和市民卫队(Einwohnerwehren)。在汉堡，大学生议会呼吁解散志愿军团，重回学习，否则将被取消学籍。在全德，除巴伐利亚外，8月11日起，志愿军开始解散。大学生武装斗争的高潮过去。

从“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在魏玛初期对军事行动的参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矛盾的，他们既迫于现实而拥护魏玛共和国制国家，又出于维护自身特权利益的立场而坚持自己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路线。

## 本章小结

知识精英与1918年革命和魏玛共和国之间的爱恨交加，最直接的表现是在德国“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身上。在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魏玛共和国初期这样，战败和通货膨胀如此之大地打击了中产阶级。而绝大多数“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都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他们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但中产阶级的贫困化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就造成了他们的苦闷感和压迫感以及对上升的工人阶级的敌意。

当1918年11月9日旧政权崩垮台时，大学校园中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旧政权溃得太突然，另一方面是由于此时80%的大学生正在战场上。从战场上复员归来的“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从未宣誓效忠十一月革命或“社会民主”，而是忠于“秩序”和“祖国”。因此，他们对新政府的支持是十分不情愿的。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如果共和国能够停止继续左倾——即“独裁”和“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可以站在共和国一边。但是，支持政府并不意味着承认共和制和议会民主制，他们是迫于“既定现实”才这样做的。这种有保留的支持是为了达到“秩序和安全”的目的，

“保护德意志文化价值”和反抗“世界主义及阶级斗争”。<sup>①</sup>

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了20年代初所谓的“工读大学生”运动。知识行业超员的问题使“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渴望重新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他们认定：只有“知识精神”才能拯救并复兴德国，因为“无产者从来不懂建设，只会破坏，因此，大学生有责任担负其领导者的角色”<sup>②</sup>。

综观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的状况，不难发现，尽管对共和国的失望与实际的生活困境并存，但“前线战士一代”大学生不愿再陷入国内混战，在他们看来，与其与新生的共和国作对，不如拿出战争时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重新帮助国家恢复稳定，建立秩序。此时的大学生积极参与政治是出于一种恢复秩序的义务感。在他们看来，人民和祖国应该从“内心”统一并获得更新，应该体现德意志精神和文化价值，应该重新振兴德意志。

---

<sup>①</sup> *Akademische Blätter* 33, 1. 12. 1918, S. 92f.

<sup>②</sup> *Wingolfsblätter* 48, 28. 2. 1919, S. 261.

## 第三章 “相对稳定的一代” (1924—1929)

魏玛共和国中期，即1924—1929年所谓“金色的20年代”，是这个民主共和国发展史上的“相对稳定时期”，此时，在“道威斯计划”下，美元流入德国，帮助德国重振经济，魏玛德国的经济逐渐克服了战后初期的通胀，并呈现出明显的恢复与发展倾向，民主制度在同时代政治观察家们的眼睛里似乎已趋于稳定了。那么在这个“相对稳定时期”里，这一代德国大学生的经济状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高校入学者的增长对社团组织产生了什么影响？学术行业的超员与大学生的“无产者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大学生在政治发展上出现了哪些新的倾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清楚地回答这一时期的德国大学生对魏玛共和政体究竟是更加接近，还是更加疏离的问题。

### 第一节 社会变革与“相对稳定的一代”生存状况

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威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威斯计划”，该计划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在该计划的实施下，到1924年8月，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影响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终于结束了。1924—1928年，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德国偿还《凡尔赛和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魏玛共和国的国内形势趋于稳定，自1924年起，经济迅速恢复并实现稳定发展，到1927年，工业已接近战前水平。在这一时期，大学生的生活状况也较之超通胀时期有了明显好转，然而，由

于之前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以及挥之不去的知识行业的超员问题，从整体来看，大学生们面临的经济局势仍然不容乐观。

### 一、“相对稳定的一代”经济状况

魏玛共和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是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引入联系在一起，由于美元的流入，德国经济明显好转，并出现了恢复和发展。例如，1914年7月，1千克鲜肉的价格是黑麦面包价格的5倍。1921年7月，通货膨胀期间，这个比例上涨到13.7倍，1922年上涨到19.7倍。到1924年7月，这种价格比已重新回落到1914年的水平，即约为5.5倍。由于在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形势已明显好转，到1927年，这种价格比为3.8倍，1928年为2.9倍。<sup>①</sup>这充分说明德国经济已开始稳定发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甚至已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较之魏玛共和国初期，广大的大学生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随着马克的稳定，有大约80%的大学生的生活水平能够居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上。例如，1925年，哥廷根大学生的最低月生活费为75马克，当时，黑麦面包每千克售价为34芬尼，1千克猪肉售价为2.7马克，<sup>②</sup>而且，大学也开始致力于改善他们的饮食状况，大学生食堂在这样的局势下逐渐繁荣起来，这在餐馆吃饭便宜了很多。到1925年，哥廷根67%的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大学生在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全德有70%的大学生能够负担得起这笔费用。<sup>③</sup>1929年经济危机前，大学生的伙食费为每月60马克，占生活费的一半，<sup>④</sup>全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44.

<sup>②</sup>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6, S. 259, S. 261.

<sup>③</sup> Hans Sikorski, *Die studentische wirtschaftliche Selbsthilfearbeit*, In: Hans Sikorski (Hg.), *Wirken und Werke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Marburg, 1925, S. 34.

<sup>④</sup> Hans Sikorski, *Die studentische wirtschaftliche Selbsthilfearbeit*, In: Hans Sikorski (Hg.), *Wirken und Werke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Marburg, 1925, S. 72.

德大约有 65% 的大学生能够维持这种生活水平。<sup>①</sup>这说明，大学生的饮食状况改善了，但是，大学生也只有在食堂才能享受这样的饮食水准。

由于生活状况的改善，在魏玛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营养不良的大学生减少了。例如，1920—1921 年冬季学期，在格赖斯瓦尔德，45.2% 的大学生营养不良，<sup>②</sup> 1923 年，在德累斯顿，42.5% 的大学生营养不良。<sup>③</sup>但在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的 1925 年夏季学期后，1927—1928 年冬季学期，全德大学生贫血或营养不良的大学生比例为 15%。<sup>④</sup>

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特殊体制，大学生有选择是否住校的自由，所以德国高校的校舍是非常有限的。一般而言，除了少数当地大学生与亲戚或父母同住外，大部分大学生是以租房的方式来解决住宿问题的。在战前，城市出租房屋的数量能够满足大学生的需要，但是战后的情况急转直下。一方面，战争中断了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战后经济极其低迷。1913—1923 年，综合大学和技术高校中的大学生数量从 71 828 人增长到 112 012 人。<sup>⑤</sup>但空房量却减少了一半：1913 年，法兰克福每 1 000 名居民中多出 5.83 间房屋，但 1923 年只有 2.34 间剩余。<sup>⑥</sup>因此，房屋成为奇货可居的东西，价格飞涨，没有哪个阶层比大学生更迫切地需要租房。1924 年，

① Hans Sikorski, *Die studentische wirtschaftliche Selbsthilfearbeit*, In: Hans Sikorski (Hg.), *Wirken und Werke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Marburg, 1925, S. 72.

② E. Friedberger, *Untersuchungen über Ernährung und wirt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 des Greiswalder Studenten im Sommersemester 1920 und Wintersemester 1920/1921*, In: *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68, 1922, S. 902.

③ Philateles Kuhn & Rainer Fetscher,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der Gesundheitsüberwachung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In: *Medizinische Klinik*, 27. 5. 1923, S. 712.

④ Anna Schönborn, *Zur wirtschaftlichen Lage der deutschen Studentinnen*, In: *Studentenwerk* 2, 1929, S. 81.

⑤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1-1922, S. 320f.

⑥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4-1925, S. 103.

在地产抵押马克体制下，房屋比以前好找了，莱比锡大学还计划解决大学生的住房问题。从1926年开始，大学生住房建设纳入国家计划。到1929年，即稳定时期的最后一年，所有德意志高校大学生的每月最低生活费为120马克，最便宜的租金，莱比锡为30马克，占生活费的1/4。<sup>①</sup>

## 二、“相对稳定的一代”就业前景

在相对稳定的20年代后期，就业市场整体仍被长期失业率的阴影所笼罩。这一时期，德国的失业人数几乎没有低于100万的时候，而且在1926年冬至1927年春这段时间，失业人数超过了200万。<sup>②</sup>但是，由于之前的通货膨胀，许多在职的、兼职的和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被迫退学，所有大学入学率有所下降。此外，“前线青年的一代”也离开校园。到1925年，德国大学生总人数缩减为9万人，是魏玛共和国的最低水平。<sup>③</sup>

这种状况也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高等教育的光环似乎有了重现的可能。因此，1925—1926年第一学期，德国高校注册率以惊人的速度飙升，特别是那些以文科为主的大学。1925—1929年，大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20年代末大学注册率比五年前增长了67%。<sup>④</sup>技术学院的状况有所不同，注册率断断续续地下跌或停滞，直到1928年才达到最低水平。商学院学生的数量持续下降。到1930年，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在读人数达到了132 000人，其中综合大学的学生人数有99 577人。<sup>⑤</sup>

“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上也出现了新趋势。此时，自由职业变得不稳定，20年代初曾蓬勃发展的工程和商业专业鲜有人问津，大学生选择的新趋向为安定的公职人员或自由职

<sup>①</sup> *Leipziger Neueste Nachrichten*, 25. 10. 1929.

<sup>②</sup> Josef Nothaas, *Die Stellenlosigkeit der Angestellten*, In: *Allgemeines Statistisches Archiv* 16, Jena, 1926, S. 291.

<sup>③</sup> *Kölner Universitäts-Zeitung* 8, 30. 7. 1926, S. 15-16.

<sup>④</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ummersemester 1930, S. 40.

<sup>⑤</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ummersemester 1930, S. 17.

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行业比私人行业更有保障，而是由于曾经大受欢迎的专业如今都泛滥成灾，因此，大学生必须转而选择那些人员较少的、能保证工作的行业。所以，20年代初热门但中期衰落下去的医学和中学教师专业再次出现了学生人数飞涨的状况。1930年达到了1925年水平的两至三倍。牙医增长了四倍。但另一方面，法律专业增长几乎停滞，经济学、化学、药学和农业科学也衰退了。

中学教师在经历了20年代初严重的过剩之后，因为学校入学率的激增和大量教师的解聘，1925—1926年就业市场形势好转。特别是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学教师紧俏。<sup>①</sup>1927—1929年，因教师短缺，所以工作前景十分乐观。学校出现了“教师危机”，以致退休教师和未取得资格证的教师都得临时代课。<sup>②</sup>1925年某教师团体的报刊写道，“缺少数学、自然科学及现代语言学教师”，这个趋势导致了大学中的数学专业的学生人数首次超过了其他专业。<sup>③</sup>1930年之前，教师岗位都有空缺。

与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知识分子整体的收入情况还是不错的。1928—1929年，工业工程师和化学家的起薪为每月260马克，工作几年后则可增长到每月550马克。<sup>④</sup>药剂师和经济学者的收入水平也差不多如此。<sup>⑤</sup>知识分子中薪水最高的在从业十年后的年薪可达到6000马克。

有大学文凭的公职人员的薪水也相当不错。20年代末，经历过漫长的无薪或微薪试用期后，一名刚工作的公职人员每月可挣400马克。二十年后，可增长到每月800马克。倘若能够升任最高级别的公职人员，每月可挣900~1200马克。<sup>⑥</sup>因此，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公职人员正式工作十年后，年收入可达7000马克。

①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32, 13. 2. 1932, S. 34.

②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35, 9. 3. 1927, S. 145f.

③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34, 3. 3. 1926, S. 129f.

④ *Der Angestellte Akademiker* 10, 15. 4. 1928.

⑤ *Die Tat* 21, Okt. 1929, S. 527.

⑥ *Zeitschrift des Bundes höherer Beamter* 10, Jan. 1928, S. 2-3.



这份收入与工人阶级相比是不错的，1928年，魏玛共和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一名受过训练的建筑工人每年最高可挣3 000马克，而一名未受过训练的男裁缝每年最低收入为1 500马克。<sup>①</sup> 一名小学教师的收入每年从2 500~5 000马克不等。<sup>②</sup> 所以，到20年代末，知识分子虽然抱怨过剩和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但工资仍是同时代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几倍。

然而，必须承认，魏玛共和国时期知识中产阶级丧失了相对优势的地位，这正是他们耿耿于怀之处。无论一个医生的收入比一名工人多六倍，还是一名工程师的收入比一名秘书多四倍，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他们需要的、期望的和记忆中的要比这多得多！

### 三、“相对稳定的一代”与美国主义

在魏玛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里，由于美元的流入，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一并影响了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大众文化可以浓缩成一种“美国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大学生自然也受到影响。

例如，1929年，德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京特·德恩(Günter Dehn)这样写道：“如果人们想问青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们仅仅只会回答：更多地享受生活。‘挣钱’和‘娱乐’已成为了他们生活存在的两个支点。这些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打算，用结实、强健的骨骼站在这个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地球上，寻求从这个世界中，为自己捞取所有能够捞取到的东西。这个民族从思想上讲已经有意识地，也自然是肤浅地、真正地‘美国化’了。当人们与他们发生接触的时候，就会想到：不是什么民主主义，也不是什么社

---

<sup>①</sup> Friedrich Zahn, *Wirtschaftsaufbau Deutschlands*, In: Ludwig Elster, Adolf Weber, Friedrich Wieser (Hg.),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G. Fischer Jena, 1929, S. 992.

<sup>②</sup> Ottoheinz v. d. Gablentz & Carl Mennicke, *Deutsche Berufskunde. Ein Querschnitt durch die Berufe und Arbeitskreise der Gegenwart*,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Leipzig, 1930, S. 345.

会主义，更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美国主义’成为了所有事物的最后目标。”<sup>①</sup>

美国的电影、艺术、歌舞、流行乐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大众流行的生活方式。在教育领域，也受到这种影响，“包豪斯”（Bauhause）艺术学院是一个典型代表。它的教学风格开放明快，给予大学生充分的自由，教学方式也丰富多彩，例如，家具设计、书籍装帧、舞蹈艺术。这里犹如一个大的实验室，破除迂腐的陈词滥调，鼓励学生去发现美、创造美。

然而，“美国主义”给“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德意志民族长期以来克制、冷静、内敛的性格受到了美国式的放纵、狂热、张扬风格的猛烈冲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快感正在用最快的速度侵蚀着德意志未来文化的代表。

充满现代韵味的爵士乐正在从厚重的欧洲古典音乐中掠夺着“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暴力的拳击运动迎合了年轻人叛逆狂野的一面，宣告着“绅士”的覆灭；好莱坞电影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夜总会”等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年轻人性格中阴暗的一面，并使他们认为这不再是一种内心的“罪恶”，只有寻欢作乐才能不枉此生。

美国式的性解放对于古板的德意志民族而言不啻一场飓风。妓女成了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主角。与此同时，德国高校的长学制以及经济状况导致的在校时间延长，也延长了本来早应走入家庭生活的年轻人的“青春期”，因为就业推迟而导致结婚推迟，年轻的大学生内心的蠢蠢欲动与美国性解放观念一拍即合，轻率的性行为比比皆是，性病泛滥成灾。

整个德国社会渗透着拜物主义、功利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气氛，成为了“相对稳定的一代”欲罢不能的“毒瘾”。正如德国文化评论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所说：“这些舞女的表演与

---

<sup>①</sup> 李工真：《“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载《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6页。

做作中，不仅有着一种色情的魅力，而且还有着一一种军国主义的魅力。这种唯有久经训练才可能学会的排列，和着节奏的跳动，是一种对看不见的、但又不可摆脱的命运的付出，一种‘漂亮的驯服’，一种通过对个性征服的成功才带来的结果。”<sup>①</sup>

以大众消费为导向的美国文化受到了德国知识界的强烈批评。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强调的只是伪善的理想而毁灭了人类英雄的精神，用自由的名义造就了无拘无束和道德败坏，以进步的名义培养了守财奴和奢侈浪费……用慢慢破坏民族道德结构、剥夺民族对权力的热情和愿望的方法来促使民族的崩溃”<sup>②</sup>。德国知识界对未来知识分子的接班人十分担忧，因此，许多声名显赫的学者开始号召年轻人摒弃美国主义，重新回到古老、单纯、质朴、荣誉、英勇的普鲁士品质当中，应担负起德意志新生代对民族的使命。<sup>③</sup>“新保守主义革命”的代表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一次对青年的演说中这样讲道：“人类的野兽正在向我们爬来，非洲的阴影正笼罩着欧洲，但我相信，在前面的艰难岁月中，强有力的任务将会出现，他们肯定需要他们所能依靠的人，他们需要连俾斯麦都没有能找到的一代新人！这个命运是不可改变的！青年们，勇敢地服从于你们的责任吧！”<sup>④</sup>

而真正促使大学生对“美国主义”从心理上失望的则是快速现代化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模仿美国式民主的共和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还他们以帝国时代知识精英的地位。因此，当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袭来时，“美国主义”彻底化

<sup>①</sup> Detlev. J. K. 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7, S. 180.

<sup>②</sup> Detlev. J. K. 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7, S. 316.

<sup>③</sup> 李工真：《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0页。

<sup>④</sup> Gordon A. Craig,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45*, S. 429. 转引自李工真：《“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载《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1页。

为泡影，德国大学生坚定地走上了“纳粹救国”的道路。

#### 四、“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前途恐慌症

在魏玛共和国中期，虽然“相对稳定的一代”就业前景有所好转，但与帝国时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传统的知识精英的收入、地位、独立性、生活方式及名誉都处于不断的下降中，或者说至少也处于潜在的下降威胁中。特别在20年代末期，对超员的担心已成为经济混乱和社会不安定的晴雨表。

在大学生刊物中，作者们竭尽所能用切实的数据证明“无法避免的”超员、失业和“无产者化”。例如，1928年，基于现存的大学注册率，最“悲观”的预测是，到1932年，知识分子的失业率将翻一番。<sup>①</sup>其他“悲观”的估计也都不抱希望。<sup>②</sup>德国经济绝不可能再吸纳魏玛教育工厂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而这种无能为力将导致知识分子以及大学毕业生们的“无产者化”。<sup>③</sup>这些舆论造成了“相对稳定的一代”内心产生忧虑、彷徨的情绪，陷入了对未来的恐慌之中。

“相对稳定的一代”指责德国的教育录取体系是造成人员过剩的罪魁祸首：“对教育程度的过高要求是愚蠢的，这种规定完全不必要，只会延长受教育时间，造成过剩。”<sup>④</sup>由于高等教育被看作在工业或公职人员领域谋求一份差事的更好保证，因此，当知识分子越来越被贬低到从事低级职业和商业的地步时，这些工作当然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无产者化”。

与高等教育前提条件的螺旋上升相对应的是，这一代大学生认为，正是魏玛时代病态的经济迫使别无出路的年轻人不得不延长在校时间。所以，从理论上讲，大学研究的趋势与学术责任已经背道

<sup>①</sup> Georg Müller, *Die Not der deutschen Geistesarbeiter und ihre Behebung*, Köln, 1924, S. 11f.

<sup>②</sup>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30, 27. 4. 1929, S. 330-331.

<sup>③</sup> *Volkswirtschaftliche Blätter* 27, 1928, S. 95.

<sup>④</sup> *Deutsche Hochschule* 16, Aug. 1927, S. 104-105.

而驰，高等教育普遍化是危险的。例如，海德堡大学校长威廉·迪贝利乌斯(Wilhelm Dibelius)指出：“如果说些许的智慧是危险的，那么过多的智慧则是灾难。以前，大学生数量的增长是国家富足的表现，现在则是可怕的压力的象征。今日的大学变成了无数毕业生避免落入无产者行列的避风港。从1926年开始，每年约有30%的大学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进入大学的。在煽动和社会苦难的推动下可以想象一下，多么庞大的危险大军正涌进德意志传统的文化家园。”<sup>①</sup>

但是，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是为了将来培育人才的，无论现实可能怎样，这个神话对于精英的自身认同是非常必要的。战后，知识行业市场的现实开始动摇了这个神话。在知识分子中流传一个说法，即大学越来越变得如同一般的中等专业学校，直接以经济为导向生产产品。大学生们选择某个专业仅仅因为它有更好的商业前景。这就是所谓的“面包学术”(Brotstudium)现象。<sup>②</sup>1928年，一名大学生在大学刊物上写道：“人们想在哪所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就在哪所中等专业学校学习。他们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少的足够谋生的知识。”正如图宾根知识分子安置办公室主任所评价的那样：“一种肤浅的大学生被制造出来，他们或是被登记在册，或是被录取，或是通过了考核，但没有人进行思索或研究。”<sup>③</sup>

“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控制“每学期新的知识无产者涌入从事任何辅助性工作的人口大军……”<sup>④</sup>因此，许多大学生刊物的目的是使大学生及在校生抛去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一纸大学文凭来谋求一份体面的收入和高等的社会地位。1928年，《大学男生联合会之路》(*Burschens-*

<sup>①</sup> *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n* 10, Juni 1930, S. 56f.

<sup>②</sup> Ferdinand Degenfeld-Schonburg, *Geist und Wirtschaft.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Aussichten der deutschen Akademiker*,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27, S. 206-207.

<sup>③</sup>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29, 25. 8. 1928, S. 724.

<sup>④</sup> *Deutscher Akademischer Rundschau* 6, 1. 6. 1925, S. 17-18.

*chaftliche Wege*)报道：“今日，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正在从事着根本不需要上大学就能轻松获得的职业。另一方面，大量非知识行业为年轻有为的人敞开了营造满意人生的大门。”<sup>①</sup>所以，任何削尖脑袋想挤进大学的人实际上都无法逃脱“无产者化”的宿命。<sup>②</sup>

这些报道当然不足以劝服人们止步于大学校门之外，超员正威胁着知识中产阶级的精英基础，因为它摧毁了高等教育的可选择性。也就是说，不断增长的知识分子供给降低了教育市场的价值。大学生们将超员的原因归结为教育水平的下降，因为通过高中毕业考试并进入大学的学生的平均成绩比任何时候都低，对大学生的要求太过于宽松，完全不合格的人有机会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和知识行业。因此，社会需要进行一场“冷酷无情的”筛选来重塑正统的学术水准，或者至少保证它不堕入庸俗的窠臼。<sup>③</sup>否则，人们将要担心，曾经拥有无上光环的“博士”头衔将要史无前例地失去在公众中的崇高地位。<sup>④</sup>

超员带来的不仅是人才质量的下降，而且因为整个行业都被“无产者化了”，所以其成员陷入了物质贫困导致的道德腐化。<sup>⑤</sup>在法律职业中，有人批评到，超员的压力导致其内部成员道德的败坏——从事炒股、投机买卖、不正当竞争和私吞挪用客户资金等。超员及其经济压力正是导致“阶级良心”丧失的罪魁祸首，一份校友期刊认为，“正因为如此，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重罪犯才呈增长趋势”。<sup>⑥</sup>

底层社会群体向上爬也被认为恶化了知识行业已有的困境。一

① *Deutscher Akademischer Rundschau* 9, 1. 12. 1927, S. 2.

②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29, 21. 1. 1928, S. 41.

③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30, 27. 4. 1929, S. 331.

④ *Zeitschrift des Reichsbundes der höherer Beamten* 7, Okt. 1925, S. 130.

⑤ Ferdinand Degenfeld-Schonburg, *Geist und Wirtschaft.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Aussichten der deutschen Akademiker*,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27, S. 191-192.

⑥ *Burschenschaftliche Wege* 17, Dez. 1926-Jan. 1927, S. 119.

名当时的校领导写道：“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有力地提升了社会下层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空前地加大了培养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力度……”<sup>①</sup>这在知识中产阶级间引起了相当大的痛苦。海德堡大学校长威廉·迪贝利乌斯认为，虽然每个市民都有权进入大学学习，但这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光环，高等教育仅被视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而已，这就是致命的口号——“大学全民化”的起源，而它只能意味着大学的终结。尽管战前的德国统治阶层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阶级，但仍有一部分来自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作为“新鲜血液”注入了统治群体。不幸的是，现在，“芸芸大众步步为营紧逼直上，他们已变成一种危险，这可能会导致俄国式的上等阶层的毁灭”<sup>②</sup>。迪贝利乌斯总结到，如果人们接受了“大学为人人敞开”的观念，那么“某一天，不仅初中教师会涌进大学校园，而且紧随其后的还有地方教师和整个中级官僚系统。工会干事将使工人阶级在大学中掌权；出于声誉的考虑，每个银行和商业实体都将安排一个政治上的监督人；出于同样的渴望，工匠们也会步其后尘”<sup>③</sup>。

“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对魏玛时代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口诛笔伐，并最终将其罪名定为“摧毁德意志民族生活”，<sup>④</sup>这类批评文章认为，接受传统的高等教育的目的应是为造福几代人的生活，而非急功近利地追求政治上的显达。但左派的目的却是为了攫取高等教育机构，以进一步达到使邪恶的左派极端主义篡夺国家政

---

① Georg Müller, *Die Not der deutschen Geistesarbeiter und ihre Behebung*, Köln, 1924, S. 16.

② *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n* 10, Juni 1930, S. 63f.

③ *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n* 10, Juni 1930, S. 69.

④ Harald Lauen, *Die Stellung des Akademikers in den sozialen Umsichtungsprozessen der Gegenwart*, In: Harald Laeuen (Hg.), *Volk und Hochschule. Neue Folge des Burschenschaftlichen Handbuchs für Politik*, Brönnner, Fankfurt a. M., 1927, S. 116.

权的目的。<sup>①</sup>

这些舆论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大学生未来潜在的威胁却是无疑的。依稀可见的“无产者化”引起了广泛的绝望。“德国大学生会”(Deutsches Studentenwerk)的一名领导在大萧条前写道，对超员的预警不仅增加了“家庭对下一代前途的担忧，而且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忐忑不安。除了经济停滞外，对超员和失业的担心成为最沉重的心理负担”<sup>②</sup>。传统大学生社团的衰落就是这种表现之一。

## 第二节 “相对稳定的一代”结构变化与传统社团的衰落

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德国教育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推动大学教育普及化的改革。例如，在国家的根本大法《魏玛宪法》中，第四章专门规定了国家的教育制度。其中，第142条规定，“艺术、科学及这方面的教育享有自由，国家予以保护并关心其培育”，<sup>③</sup>第145条、第146条规定，各校招收学生，应根据其能力和志向而定，不得因父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的派别而有所歧视，对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应提供奖学金等。<sup>④</sup>这些改革一方面将当年参加战争而又未能毕业的大学生重新接纳进校园，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各阶层更宽地打开了高等教育的大门，因此，大学生的数量得到了可观的增长。即便当“前线士兵一代”离校之后，“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的数量从总体上讲也是多于战前时代的。但由于大学生的家庭来源结构上有所变化，以及中产阶级的“无产者化”，因而也引起了传统大学生社团结构上的变化。

<sup>①</sup> *Der Student* 10, Mai 1929, S. 5-6.

<sup>②</sup> *Studentenwerk* 3, 1929, S. 4.

<sup>③</sup> 翟葆奎、李其龙、孙祖复：《教育学文集·联邦德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sup>④</sup> 翟葆奎、李其龙、孙祖复：《教育学文集·联邦德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 一、高校发展与大学生结构变化

从1907年至1931年，德国高校发展可以明显分为如下几个时期：战前1907—1914年，高校在较长的时间里学生人数缓慢增长，超通胀时期1919—1923年高校迅猛发展，1924—1925年突然放慢增长速度，进入平稳增长期。<sup>①</sup>

1907年以来德国高校发展状况见图3-1<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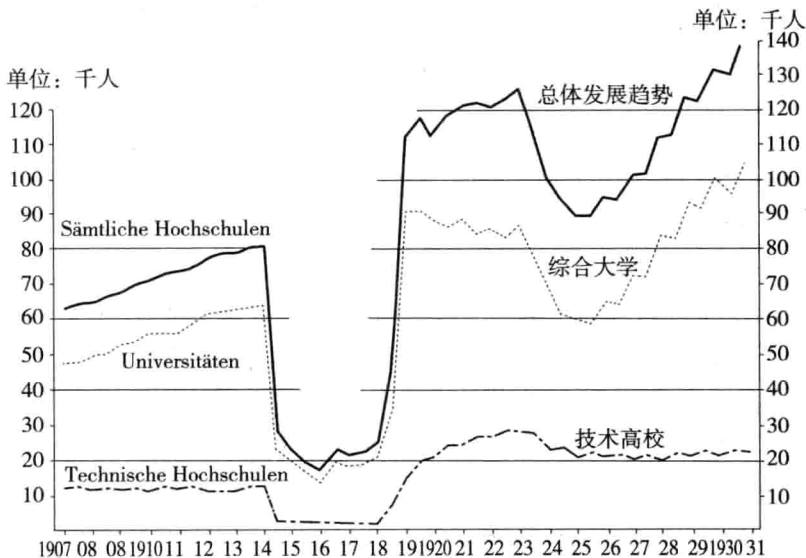


图3-1 德国高校发展曲线图(1907—19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夏季学期，大学生的数量突飞猛涨，比上一年增加了345.3%，有111 671名大学生。尽管德国有些

<sup>①</sup> 总体而言，女大学生的数量很少，1919年为9 000人，1925年为8 000人，可以忽略不计。

<sup>②</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d. 11, Berlin, 1934, S. 9.

领土被割让，但大学生总数仍比战前增长了40%。

到1923年，大学生的数量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来源主要是正常通过高中毕业考试(Abitur)的新生。因此，1923年底，大学生数量比战前水平增长了大约140%，尤其是专业学校如雨后春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学生数量增长飞快，但德国的领土面积缩小了13.05%，总人口减少了9.2%，失去了某些高校，如斯特拉斯堡大学、但泽技术高校和波茨南学院。

到1924年，随着经济和社会进入平稳期。在两年之内，“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的数量从125 728人减少到89 481人，即减少了28%。到1925年，大学生数量仅比战前多了16%。尤其是综合大学的学生数量锐减；到1925年夏季学期只有59 000人左右，甚至比战前水平还低。技术高校的学生也有所减少，尤其是商业学校、农林学校的人数减少得最明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1919年入学率的大幅增长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由于大量“前线青年的一代”的复员。平均的入学率和毕业率被打乱了。到1925年，他们基本完成了大学学业，离开高校，这种“闪进闪出”造成了1925年大学生人数的锐减。从1926年开始，大学的入学率和毕业率又恢复正常水平，大学生每年的增长率大概在5%~12%。<sup>①</sup>

在总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不高。1800—1930年每十万人中的大学生数量见图3-2<sup>②</sup>。

1910年，总人口64 925 993人，其中大学生64 000人，每十万人中约100名大学生；战后，人口60 898 584人，大学生112 000人，每十万人中约185名大学生，到1925年，人口62 568 753，大学生89 000人，每十万人中约140人。<sup>③</sup>但是，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人数却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以来，曾属于中产阶级上层的“有知识的市民”(Bildungsbürgertum)不断衰落。以符腾堡为例，1871—1876年，50.3%的大学生来自上层中

①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d. 11, Berlin, 1934, S. 9.

②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d. 11, Berlin, 1934, S. 9.

③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d. 7, Berlin, 1931, S.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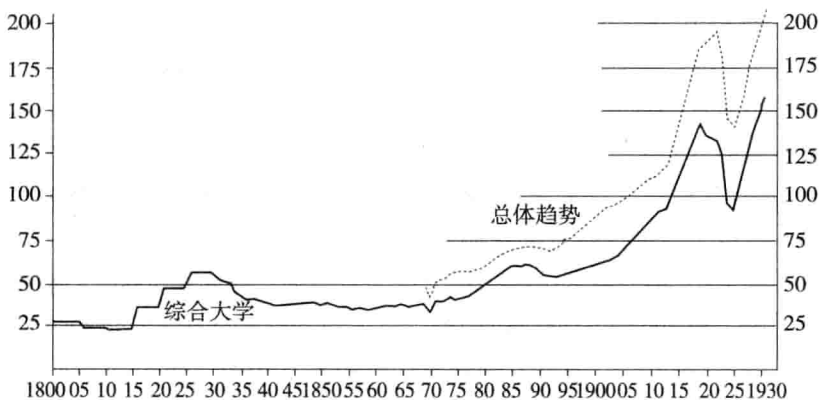


图 3-2 德国每十万人中大学生数量

产阶级；49.7%的来自中间和底层资产阶级；1881—1886年，44.5%的大学生来自上层中产阶级，55.5%来自中间和底层资产阶级；1906—1911年，43.3%大学生来自上层中产阶级，56.7%来自中间和底层资产阶级。<sup>①</sup>就整个德国而言，战前，2/3的大学生来自中上层中产阶级，1/3来自底层中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但从1918年开始，直到20年代下半期，底层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占60%，上层占30%。几乎完全颠覆了19世纪的传统。

对于下层中产阶级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改善阶层地位的手段，而对于高级的中产阶级而言，则是一种捍卫已有地位的方式。本来划分明确的阶层分界越来越模糊，向高层爬变得更加容易。这就能够解释，为何小资产阶级取代了传统的“有知识的市民”，这种暴发户式的上升途径成为德国大学生无法达成集体认同的重要原因。

<sup>①</sup> Albert Reinhardt,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der Württemberger seit der Reichsgründung.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liche und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en mit einer Darstellung und Beurteilung akademischer Gegenwartsfragen*, In: *Württembergische Jahrbücher für Statistik und Landeskunde* 1916, Stuttgart, 1917, S. 175-181.

中上层和低层中产阶级在选择专业上有很大区别，原因之一是受父辈的影响，其二是由于各个专业培养经费的差异。只有家庭条件好的才能够读得起法律、医科等专业，而家庭条件较差的则只能选择人文科学专业。例如，医生的孩子很多都是医生。自由职业者和律师等公职人员的孩子也多选择法律，这样就有机会成为国家高层公务员。但也有许多下层中产阶级大学生选择法学，他们希望能得到一个“铁饭碗”，一劳永逸改变自身前途。低层中产阶级偏爱的专业还有教育学、哲学。许多手工业工人的子女选择神学，这成为他们的传统晋升方式。在技术高校，测量学和建筑学成为最重要的上升手段，而机械工程师和材料科学则成为高级中产阶级的专属。此外，低层中产阶级上升的手段不仅在专业选择上，而且还通过选择学校来完成。兽医学院成了晋升为高层中产阶级的一个选择，但相比于人文科学和医学而言，兽医学院难以获得社会的尊重。因此多数是下层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选择教育、商业、兽医学校。

魏玛时期，大约只有 1/3 的父母能够无困难地供养子女上大学。因此，到 1924 年，主要是“有知识的市民”受到猛烈冲击。相反，“有财产的市民”则跟战前差别不大。因为一个做公务员的父亲虽然在阶层上是高的，但收入不一定高，他已经被“无产者化”了。财产已经越来越不是教育的前提了，教育同物质前提相脱离。高层公务员的贫困化成为了高层中产阶级共同的命运：低层中产阶级将取代他们的位置，中间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

1924 年，货币改革后，学费增长了 15%~20%，因此 1923—1924 年冬季学期，大约 18% 的大学生无法立即交清学费。而政府提供的小额贷款和奖学金的缩减，更加恶化了这一形势。1926—1927 年冬季学期，平均每月的听课费为 50 马克，这相当于当时大学生生活费的一半，但这并没有遏制住听课费的继续提高。

此外，“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与工人关系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等的体力劳动者”子弟开始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出身工人家庭的大学生比重很小，1918—1933 年不超过 7%。而且是从 1928 年才开始上升的，而整个工人阶级却占全国总人口的 40%。

据统计,工人子弟比较喜爱选择神学或教育学,而中高层公务员的子女则爱好选择医学和法学,其中经济原因占很大比重,因为神学的费用比较低,而医学和法学的学费很高。而且,神学和教育学毕业后,“向上爬”的路已经由国家铺好了,但医学和法学想要在社会立足,则需要更多的声望和社会关系。

知识行业的过剩和战后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后果使物质生活更加困难,这也加重了大学生们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不管在普鲁士还是在其他州,改革措施都触及高等教育。这就触及了大学生赖以生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反对扩大“大众(Massen)”升迁机会的政策。

高等教育机会的界限应当延伸到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引发了是否应该在和平时期允许通过高中毕业考试(Abitur)的小学教师上大学的讨论。民族主义期刊《汉堡大学生期刊》(*Hamburger Akademische Blätter*)叫嚣道:应为争取“德国大学的价值”而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允许小学教师这样“不合适”的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尊严扫地”和对高级公职人员及其他知识行业“垄断地位”的毁灭。相应地,高等教育也将失去它的社会特权。<sup>①</sup>

在绝大部分大学生的思想中,所有的一切看上去犹如一场阴谋,他们丝毫不怀疑左派用卑鄙的伎俩赢得了10万多张来自没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师们的选票。教育被说成“受到了大众政治和特殊利益的勒索”。<sup>②</sup>当然,他们最为担心的是,一旦小学教师进入大学,他们可能会以此为跳板进入中学执教或者其他的知识行业。在一个对超员感到焦虑的年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sup>③</sup>

削减预算被说成是政府中的左派使用的另一种武器,用以对付大学以达到“使智力退化”的目的。<sup>④</sup>这个观点被现实所证实,一方

<sup>①</sup> *Hamburger Akademische Blätter* 3, 15. 1. 1922, S. 5-6.

<sup>②</sup> *Deutsche Akademische Zeitschrift* 1, Apr. 1919, S. 44.

<sup>③</sup> *Niedersächsische Hochschul-Zeitung* 1, 1. 10. 1919, S. 8.

<sup>④</sup> *Bayerische Hochschulzeitung* 1, 23. 6. 1920, S. 135.

面，政府向公立高校(Volkshochschule)和工人夜校慷慨投资，但另一方面，大学和大学生却在走向赤贫。公立高校不仅被视为浪费纳税人的税款，还被看作社会的祸根，因为它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制度来打击，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对付。<sup>①</sup>大学生们还十分厌恶形形色色的技术职业堂而皇之地将自身的职业技能正式作为学术技能，他们将其称作对德国教育的“非学术化”。<sup>②</sup>

为了应对这种所谓的“学术危机”，“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呼吁通过提高“文化”和“奖学金”的门槛来反对社会主义者进行的大学改革。所有的知识分子团体都用这种手段来谴责普鲁士政府向一些小学教师敞开大学校门的做法。

在理解这些担忧时，有一点必须指出，正是由于在相对稳定时期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们仍然看不到自身前景有何改观，因而认定，正是1918年革命和魏玛共和国才将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策推上舞台的。因此，魏玛共和国已开始被他们视为“宿敌”了。

## 二、传统大学生社团的衰落

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学生团体的成员都受到社会经济低迷的损害。全德大约有60%的大学生都是社团成员。传统大学生社团由于内部的种种问题，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大学生原本的生活重心突然没有了，社团也无法给他们提供支持，尤其是他们信赖的“长老会”自身难保，更别提照顾新成员了。传统社团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衰落”也是相对概念，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脱离结社生活，而是意味着他们转向右翼新型社团，纳粹大学生团体开始兴起。

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中，色标团体尤其受到冲击，没钱支付制服和帽子。以“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为例，它像其他大学生团体一样，一直在为生存苦苦奋斗。由于奉行传统的击剑决斗，到

<sup>①</sup> *Deutsche Akademische Zeitschrift*, 15. u. 30. 12. 1919, S. 447.

<sup>②</sup> *Deutsche Akademische Zeitschrift*, 15. 7. 1919, S. 171-172.

20年代,许多成员甚至连正常的衣食住行都难以应付,更谈不上购置新制服和武器了。1925年10月,击剑和军刀的价格为6~36马克。<sup>①</sup>这样的花费大学生难以再承受,因此,“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呼吁,购买物美价廉的击剑。此外,社团召开地方和全国性的会议,花费主要来自成员缴纳的会费,而且参加会议的路费也由个人负担。因此,大量成员不堪重负。“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被指责为“假面舞会”,总是收取会费,以致成员连最重要的教科书都买不起。<sup>②</sup>其作为教育和道德教化手段的饮酒传统也被人们从健康角度上进行批判,但主要原因是啤酒太贵了。这些虽然都是传统,可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的正确性。许多成员在昂贵的社团义务下,开始考虑是否要退出社团。例如,1925年秋,一名成员——他是电器工程师兼机械工程师,同时是民族经济学博士,4个孩子的父亲——宣布退出社团。<sup>③</sup>1926年初,“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中找工作的大学生有223人,但职位只有165个。<sup>④</sup>而且情况仍在不断恶化。一名成员写信给“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主席,抱怨道:“我在考虑是否还要在社团待下去,还是鉴于收入原因退出……我母亲给我的考试费用已经很少了,如果继续缴纳社团费的话,我将无力支付考试费用。”<sup>⑤</sup>许多社团的大学生并不是因为内心对社团的兴趣消失,而是因经济原因无法继续社团生活。有社团成员公开表示,他一直到最后都在坚持

---

<sup>①</sup> Ernst Laudien, *Der Wirtschaftsverband alter Burschenschaftler*, In: Herman Haupt(Hg.), *Handbuch für den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ler*, 3. Aufl., Brönnner, Frankfurt a. M., 1925, S. 175.

<sup>②</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88.

<sup>③</sup> *Burschenschaftliche Rundschau*, Okt. 1925, S. 6.

<sup>④</sup> *Burschenschaftliche Rundschau*, März 1926, S. 101.

<sup>⑤</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89.

“大学男生联合会”的理想，但今天的社团生活令他无力承担，因此，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退出。<sup>①</sup>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魏玛共和国末期，罗斯托克的一名成员上书“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主席团，诉苦道：“人们对任何事不再抱有好转的信心。我们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恶化了。我每月只有 70 马克，除了要支付生活费和房租，还有其他开支。我向社团请求，收回会费，并取消以后的会费。”<sup>②</sup>

其他的大学生团体也存在同样的困境，如“同乡会”、新教“温高夫”团、“德意志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军团(Corps)等。例如，到 1927 年，1 142 名同乡会会员找不到工作，零收入。<sup>③</sup>“同乡会”呼吁制服降价，限制决斗，减少去啤酒馆的次数，限制购置新帽子和肩章。<sup>④</sup>

在如何维持社团运营的问题上，传统大学生社团内部产生了分歧。如前文所述的“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同乡会”等呼吁改变以往传统，而贵族倾向较重的军团(Corps)希望保持原来的传统不变，这样，为了保持社团的正常运营，就需要接纳一些小资产阶级成员。通过这个措施，虽然大学生团体内的结构金字塔在魏玛时代并没有完全倒塌，但传统的“教育与财产”的不可分割性却不复存在。

大学生团体内部长期以来的分裂，使成员与组织日益疏远，传统社团陷入一种“集体自私主义”(Kollektivegoismus)当中。例如，1928 年后，每 5 名高级公务员中就有一名是科森那军团(Kösener Corps)的长老。但从 1925 年夏季学期到 1928 年夏季学期，科森那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89.

<sup>②</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81.

<sup>③</sup> *Landmannschafter-Zeitung*, Mai 1927, S. 114.

<sup>④</sup> *Landmannschafter-Zeitung*, Dez. 1932, S. 144.



的所有成员占全体大学生数量的份额徘徊在 6.2% 至 6.6% 之间, 这充分说明了社团内部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使成员感到愤怒的是, 作为内部贵族的长老与干实事的成员间的分化。许多长老甚至担心仅以社团规章来约束成员会造成他们策反, 从而威胁自身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 “青年运动”分裂为持不同思想的小团体, 更加碎片化了。1919 年, “在自由德意志运动”(Freideutsche Bewegung) 的基础上组建了“青年德意志联盟”(Jungdeutsche Bund), 得到很多大学生的支持。它奉行“文化民族主义”(völkisch) 路线, 在它的带领下, 整个青年运动逐步转向右翼。魏玛时代, 各种青年运动团体的人数都维持在 2% 左右。非传统大学生团体的人数在魏玛时代从未超过大学生总数的 5%。<sup>①</sup> 1928 年后, 他们逐渐倒向“纳粹大学生联盟”(NS-Studentenbund)。

总之, “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为德意志民族而奋斗”的理想受到社会经济转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新的政治希望寄托于一位能将德意志民族带出危机境地的领袖人物, 因此, 传统的大学生社团逐步走向瓦解。正如埃施曼(E. W. Eschmann)预测的那样, 大学生的命运被挤压在“资本和大众”之间, 再也不可能建立新的拥护共和的大学生团体了。<sup>②</sup>

### 第三节 “相对稳定的一代”的政治态度

“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再次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政治与经济的敌意。超员的潜在隐患以及为接受高等教育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继续成为大学生讨论的焦点话题。虽然形势比通货膨胀

<sup>①</sup> 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8.

<sup>②</sup> Leopold Dingräve, *Warum sind die Studenten so?* In: *Die Tat* 21, 1930, S. 841-846.

胀时期稍有好转，但大学生刊物的报道仍在声明：“20年代末，25%~30%的大学生生活在众所周知的‘最低生存底线’水平之下。”<sup>①</sup>

在政治立场上，“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仍是右翼势力的拥护者。尽管稳定时期个人的愤怒不如20年代初那样强烈，但民众的情绪仍处于一片阴沉之中，纳粹运动在大学生圈子中很受欢迎。<sup>②</sup>

### 一、“前线战士神话”的复活

随着“前线青年的一代”在20年代中期离开高校，大学生中间失去了重要的平衡机制，失去了对共和国最主要的支持者。在“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中“前线战士”的经历却以另一种面貌成为了后继大学生追求的典范。例如军团大学生的报刊这样写道：“‘前线青年的一代’经历过‘死亡的净化’，因此他们的行为决不是源于肤浅的理性的：‘今天热爱祖国的年轻人能够受到前线英雄事迹的鼓舞。死亡体验强有力的洗礼能催生新一代德意志人。没有亲自上战场的人，可以通过荣格尔(Jünger)、绍维克(Schauwecker)或者贝姆默伯格(Beumelburg)的作品，如身临其境一般地体验战场的最近距离经历：人们将丢掉那些市民的琐事。’”<sup>③</sup>总之，战争不会令他们觉得是恫吓，而是荣誉，大学生战士则是英雄。

“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他们的很多思想都是非理性的，深深痛恨这个政治的世界。1924年1月，《德意志学术瞭望》(*Deutsche Akademische Rundschau*)在发表的文章中宣称：“德意志青年中占绝对优势的人从理性主义、老一代的实践唯物主义中撤退，承认非理性主义。”<sup>④</sup>基尔著名神学家鲍姆伽登

<sup>①</sup> *Kölner Universitäts-Zeitung* 7, März 1925, S. 5.

<sup>②</sup> *Akademische Blätter* 39, 15. 10. 1924, S. 121-122.

<sup>③</sup> *Deutsche Corpszeitung*, Jan. 1929, S. 295f.

<sup>④</sup> *Deutsche Akademische Rundschau, Wirtschafts-Sondernummer*, 28. 1. 1924, S. 1.

(Baumgarten)写文章指出：“世界大战的道德影响，对德意志民族的现实观造成了深刻威胁，尤其是对年轻的知识分子。”<sup>①</sup>结果，他们用理想、梦想和希望造就了幻觉，作为自己的保护伞。1927年大学生大会上，巴本的参谋官埃德加·荣(Edgar Jung)狂热地说：“现在什么才是德意志战争经历的精髓？首先是人们的轻松，死亡与生存可以并存。以前，生存是不言而喻的，死亡是恐怖的，生存的唯物主义倾向与对抗死亡是同样不言而喻的，但现在生存与死亡间却达到了新的和谐。死亡是不言而喻，而生存是一种恩赐。人们在哪里视死如归，哪里就有追求永恒和进步的动力。我认为战争经历的特征就是，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动力是先验性的，而其中则暗藏生机。”<sup>②</sup>

“前线青年的一代”现在已被认为是“精神的高级阶层”，是“反理性之神”，大学生们希望以此来建立“反对大众幻想、唯物主义和非种族思想的堡垒”。<sup>③</sup>这种思想背后的精神动机何在呢？1929年大学男生联合会成员奥托·施瓦布(Otto Schwab)在文章《德意志状况与前线精神》中认为：“当我们再提到前线战士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精神故乡，它不再理解为德意志荣誉和生存的斗争，而是醉心于世界转折的浮夸中……当我们对政治狂欢感到厌倦并且合上双眼时，就迎来了另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与穿着军装的人为伍，指挥炮火，陷入前线的一团乱麻中，向人群投掷手榴弹，当我们从想象中的战役中被唤醒时——我们看到的仍旧是全副失败的事实，自我毁灭涌上心头。因此，对于新国家，许多人虽然口中言‘是’，但内心却在说‘否’，在大众的喧嚣中，我们前线战士保持沉默。”<sup>④</sup>

反理性主义反对社会学关于社会“无血缘”的定义，赞扬种族共同体和血缘神话。不需要理解和理性，人们应当把感觉、信仰、

① *Deutsche Akademische Rundschau*, 16. 6. 1924, S. 1f.

② *Deutsche Akademische Rundschau*, 1. 8. 1927, S. 10.

③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Feb. 1929, S. 103.

④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März 1929, S. 127.

意志和生存本能作为更好的生活方式。显然，这为纳粹主义种子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这种反理性思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愈演愈烈，一名评论家将这种思想描述为“寻求世界观的毒瘾：大学生开始认为，这个我们被囚禁的时代，不可能有世界观，因为它没有形而上学。所以大学生长期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摒弃现世观；他们创造了一个来世神话；寻求绝对超然的价值观，寻找新的形而上学”<sup>①</sup>。

在“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心目中，新德国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有自卫能力的国家，而且应该有一种不同的体制。民主制是最懦弱的制度，它将被“等级制元首国家”所替代。对元首制的狂热拉开了序幕，1920年7月，在哥廷根大学生大会上，一篇名为《高校改革的真正原因》(*Die wahren Gründe einer Hochschulreform*)的演讲直接针对政治，它指出：“我们(大学生)热烈向往一个强大的领袖和塑造者。我们很清楚，这样的领袖总是行动的领导者，形式的完成者，心怀种族共同体的信念和愿望……每位贵族——出身、工作和命运决定了他的地位——必须全身心地以这个理想和责任为己任。”<sup>②</sup>

由“青年运动”发起的、被大学生组织所接受的“领袖制”，不久便成为一种政治共识。“一位领袖必须是有威信的……从战争结束后，我们就热烈期望一位民族领袖……上流社会必须成为领袖的‘核心群体’，以建立种族共同体。这种上流社会应该从大学生中产生。”<sup>③</sup> 1924年，《德意志学术瞭望》刊登了《莱茵兰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的发行人沃尔夫冈·谢德温(Wolfgang Scheidewin)的文章，文章强烈呼吁“选出领袖”。他还建议用抽象的历史神秘主义来代替现实的社会政治观念：“民族向往领袖的狂

<sup>①</sup> *Der Student*, Juli 1930, S. 4.

<sup>②</sup> Hans Roeseler, *Die wahren Gründe einer Hochschulreform*, In: *Die Hochschule*, Jan. 1921, S. 286.

<sup>③</sup> *Christliches Führertum in Deutschland und die höheren Schulen*, In: *Wingolfs-Blätter*, 24. 3. 1925, S. 70ff.

热、英雄向往民族的狂热，是每个人类神秘的发展过程的启示录，它的开始和结束以及他最深的起源都不为人所知，我们只能将它作为一种现象来接受，但我们智力拙劣的工具无法明白它的意义和目标。”<sup>①</sup>

正因为如此，当终于有一个符合所有领袖条件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那些在“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中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当然不是将他视为篡权者，而是将他作为国家政治目标的合法实施者来看待的。希特勒也不是被他们作为党派领袖，而是被作为整个右派、民族运动和意识清醒的民族价值观的领袖来看待的。

## 二、“相对稳定的一代”政治右转

19世纪以来，“有财产的市民”和“有知识的市民”就与贵族和军官共同构成社会领导阶层，梅尼克就曾经将他们视为“普鲁士专制国家的上流社会”，<sup>②</sup>“相对稳定的一代”与保守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

早在帝国时代，德意志大学生就拥护封建制度，并将自己视为民族未来的领导人。正如德国大学生史专家约翰内斯·赫尔曼·米特高(Johannes Hermann Mitgau)所说：“今日的大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贵族阶层，其意义将超越(大学生)团体本身，它将领导全体‘人民’(Volk)。”<sup>③</sup>因此，大学生们才将贵族制原则作为大学生社团的原则。例如，著名的大学生军团(Corps)的高级领导中等级森严，并认为自己效忠的最高统领是皇帝。1840—1904年，在它的600名成员中，只有20名成员是来自普通市民家庭的。英国学者

<sup>①</sup> Ernst Topitsch, *Hegel und das Dritte Reich*, In: *Der Monat*, Juni 1966.

<sup>②</sup> Friedrich Meinecke, *Der Geist der akademischen Jugend in Deutschland*, In: Goerg Kotowski (Hg.),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1. Aufl., Toeche-Mittler, Darmstadt, 1966, S. 338-343.

<sup>③</sup> Johannes Hermann Mitgau, *Der Student. Eine Einführung in Studium und Studentenleben an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er Gegenwart*, J. Hörning, Heidelberg, 1926, S. 181.

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在参观波恩的“波鲁西亚”(Borussia)大学生军团时惊讶地发现,其中“只有王子、公爵和男爵”<sup>①</sup>。

这种贵族体制也被“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大学生们认为是值得效仿的。1929年,一名“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成员写道:“大部分大学生社团(Korporation)的内部结构是值得民主制效仿的。”<sup>②</sup>因为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一名大学生将社团的阶层比作单细胞动物、软体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这样就能使每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最大。<sup>③</sup>“这个比喻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类型。不平等的划分及高度的分工符合大自然进步的基本法则,是最高级的生存形式,而民主制的平等却是相反的。”<sup>④</sup>

“击剑决斗”(Mensur)一直都是传统战斗性大学生社团的一个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高潮。1919年,魏玛共和国禁止决斗,对用致命武器进行决斗者将予以制裁,还制定了相关的惩戒法律。但大学生根本对此置之不理,因为决斗成为他们训练勇气,培养男儿气概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招募成员时必要的技能考察。从1929年开始,出于经济原因,战斗性大学生社团才开始讨论,要不要遵守国家禁止决斗的法律。最终,他们认为“击剑决斗”是一种自负的表现,而采取了更具杀伤力的新的军训方式——手枪决斗。

“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的这种坚定的保守主义使右翼政治党派——如“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简称DVP),“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简称DNVP)——在高校中找到了突破口。“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1920

<sup>①</sup> Paul E. Kahle, *Bonn University in Pre-Nazi and Nazi Times 1923-1939*, London, 1945, p. 23.

<sup>②</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Dez. 1929, S. 71.

<sup>③</sup> Hans Schüler, *Corps und Politik*, *Weinheimer SC-Nachrichten*, 15. 12. 1923, S. 15.

<sup>④</sup> Hans Schüler, *Corps und Politik*, *Weinheimer SC-Nachrichten*, 15. 12. 1923, S. 15.

年6月的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1924年5月的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受“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领导的大学生种族主义运动(Deutschvölkische Studentische Bewegung, 简称DVStB)不仅在柏林大学生会取得了席位,而且还建立了更多的地方组织。其他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走得较近的高校党派还有“民族主义大学生联盟”(Nationaler Studentenbund)和“青年德意志联盟”(Jungdeutscher Bund)。

早在1922年8月,魏玛大联合政府的三个共和派政党的高校分部共同组建“共和大学生团体”(Republikanische Studentische Kartell),希望能得到自由大学生的支持,加强民主力量,“与反动派和军事暴政作斗争”。<sup>①</sup>然而这个愿望落空了,因为右派力量更强大。1926年,一名中立的观察家恰如其分地评价到“共和大学生团体”：“(作为右派的)反对力量,它虽多次努力,但终未成功。因为它不像传统大学生社团那样,拥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它的内部分裂成许多小团体:社会主义者、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犹太人和部分青年运动成员,他们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虽然在战后第一个学期就承认了民主制,但却没有任何实际的高校改革计划。而且,他们自身内部的分歧亦无法解决,对日常问题的激烈讨论也偏离了客观目标。”<sup>②</sup>对于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多数派大学生而言,共和主义大学生团体的影响力太微弱了。

在“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越来越向右靠拢的情况下,右翼保守主义的大学生超党派团体——“德意志高校圈”(DHR)成立了,1920年7月,哥廷根第二届大学生大会后,许多地方性“德意志风格高校圈”(Hochschulringen deutscher Art)纷纷建立。“德意志高校圈”声明自身是种族主义路线的倡导者。次年,“德意志高校圈”成

---

<sup>①</sup> Jürgen Schwarz, *Studen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23 und ihre Stellung zur Politik*,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1, S. 163.

<sup>②</sup> Johannes Hermann Mitgau, *Der Student. Eine Einführung in Studium und Studentenleben an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er Gegenwart*, J. Hörning, Heidelberg, 1926, S. 176.

为最大的反动组织，1921年夏，2/3的“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St）成员都加入了“德意志高校圈”，此外还有普鲁士大学生团体和中小“大学生代表委员会”也加入其中。“德意志高校圈”首先在大学生中致力于宣传民族意识（Nationalbewußtsein），进而在德意志人民中灌输大德意志思想，追求被割让领土上所有德意志人的自由，以及实现领土的统一。1926年，米特高写道：“德意志高校圈（Deutscher Hochschulring）取代了大学生传统的联合会。”<sup>①</sup>

1926年5月，“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简称NSDStB）——即“纳粹大学生联盟”成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它的分会就遍布全德国25所大学。<sup>②</sup>相比之下，纳粹运动从1925年到1928年并无太大进展。

这一时期，反对共和主义的大学生游行和运动变得更加经常了。<sup>③</sup>到1927年，“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St）正式否认了普鲁士当局，<sup>④</sup>大学生进行公投支持“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全普鲁士27所大学和技术学院都参与了公投，只有不伦瑞克的天主教神学院的33名大学生支持普鲁士当局的决议。<sup>⑤</sup>

1928—1929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和右翼大学生组织钢盔团（Stahlhelm）盛极一时。在柏林大学中，投票支持纳粹党大学生候选人的数量从1927年的118人上升至1929年的1377人，纳粹大学生团体成为仅次于“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DB）的第二

<sup>①</sup> Johannes Hermann Mitgau, *Der Student. Eine Einführung in Studium und Studentenleben an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er Gegenwart*, J. Hörning, Heidelberg, 1926, S. 176.

<sup>②</sup> *NS Hochschulbriefe*, Jan.-Feb. 1927, 3.

<sup>③</sup> *Deutsche Hochschulzeitung* 17, 9. 5. 1925, S. 1-2.

<sup>④</sup> Wolfgang Zorn,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ums 1918-1931*, In: Kurt Stephenson u. a. (Hg.),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neunzehnten und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Bd. 5, Winter Verlag, Heidelberg, 1965, S. 282-295.

<sup>⑤</sup> *Kölner Universitäts-Zeitung* 9, 3. 12. 1927.



大学生团体。<sup>①</sup>1928年至1929年的“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StA)选举,纳粹大学生候选人在爱尔兰根大学获得了33%的选票,在耶拿大学和柏林大学获得了15%的选票,在曼海姆大学获得了13.5%的选票,在哈勒大学和海德堡大学获得了13%的选票,在达姆施达特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获得了12%的选票,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10%的选票,在莱比锡大学获得了8%的选票。<sup>②</sup>这标志着“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中,右翼力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 三、“相对稳定的一代”的反犹倾向

其实,大学生的反犹主义并不是新事物,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魏玛共和国初期,反犹主义虽不是大学生运动的主流,但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失败的战争、溃败的军事也为“背后捅刀子”谣言的泛滥提供了土壤。<sup>③</sup>从20年代开始,许多大学生团体都宣布禁止接收犹太成员,并且逐步走向种族反犹主义。20年代初,国家议员奥托·胡戈(Otto Hugo)在《大学男生联合会期刊》上撰写了反犹主义的文章:“我们必须与50万犹太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激进的反犹主义没有机会将这50万犹太公民驱逐出去或者打击他们的精神和经济力量。”<sup>④</sup>于是,大学生团体都迫不及待地在自己的规章中加上雅利安原则,它们不仅不接收犹太人为成员,而且还要追查至祖父代,只有祖父也不是犹太人出身的才能入会。1920年8月,“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宣布禁止接收犹太成员,“用尽所有力量保存、维护德意志特色、语言及风俗”,只有雅利安血统的德意志大学生能够成为成员。每个成员不得与犹太人或者有色人种通婚,否则就要开除。许多大学生社团也开始效仿雅利安制度,起初只有基督教大学生社团是例外。出于宗教宽容,他们拒

<sup>①</sup> *Deutsche Akademiker-Zeitung* 21, 20. 7. 1929, S. 3.

<sup>②</sup> Baldur von Schirach, *Wille und We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r Studentenbundes*, Münchener Buchgewerbehans, München, 1929, S. 13.

<sup>③</sup> “背后捅刀子”(Dolchstoßlegende)说:右翼派别谣言,指责共产党、犹太人和社民党暗中破坏,德国才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sup>④</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3. 3. 1921, S. 86f.

绝种族主义，认为种族并不是基督教的原则。“温高夫”是其中反抗声音最大的。然而，天主教大学生的反犹主义也很快强大起来。在雷根斯堡大会上，雅利安原则仅遭到两票反对，“德意志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招募新成员时，要追溯至祖父代，调查其是否有犹太血统。<sup>①</sup>

20年代中期后，“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全面接受了“政治反犹主义”。1925年，大学生团体在宣传中呼吁“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评论家达赫赛尔特(Dachselt)写道：“那些大商店的名字如雷贯耳！在Titz商场，先买裙子、再买衣服、然后是食品，因为——仅仅因为这里一切都很方便！而且很便宜，女人们便趋之若鹜！成千上万的民族同胞每天只因为贪图方便就在犹太人商店购物，实际上，它只比旁边的商店便宜几分钱。他们把钱都投向犹太人的商店，而诚实劳动的德意志手工业者和工商业人士则被打入了冷宫。”<sup>②</sup>

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还有一个例子。犹太银行家胡戈·J. 赫尔茨菲尔德(Hugo J. Herzfeld)捐出520万马克成立基金会，用于救济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但他这个基金会遭到了“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的恶意诋毁，说资金用于救助移民而来的东方犹太人。<sup>③</sup>

在“相对稳定时期”，大学生反犹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犹太大学生。由于犹太人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公共生活领域难以找到对付他们的突破口，但是在学术领域可以，因为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于是，大学生争相“传递犹太人是危险的，犹太人是‘异族’，要用痛苦的敌意报复社会”的谣言。

在法兰克福，1924年初，犹太大学生被禁止进入保罗教堂参加阵亡大学生纪念。<sup>④</sup>在汉诺威，大学校长召集所有的大学生社团参加1925年国庆日游行。但“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StA)却没有将

<sup>①</sup> *Akademia*, 10. 10. 1920, S. 147.

<sup>②</sup> *Akademische Blätter*, Juni 1925, S. 28.

<sup>③</sup>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Juli 1922, S. 162.

<sup>④</sup> *KC Blätter*, 15. 2. 1924, S. 4.

邀请函下发给犹太大学生社团。<sup>①</sup>波恩大学一千周年纪念时，“武装圈子”明确声明不与犹太大学生同时游行。1926年，慕尼黑大学成立100周年纪念，犹太大学生团体没有受到邀请。“大学生代表委员会”解释说，因为其他大学生社团都反对他们，所以犹太大学生既不能参加酒宴，又不能参加庆祝活动。<sup>②</sup>1927年国庆日，巴伐利亚的枢密大臣卡尔·福斯勒(Karl Voßler)重申了公平的基本原则，他公开邀请大学生社团，也包括犹太大学生社团，但“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StA)却以解散相威胁。1929年的祭典日，巴伐利亚文化部长邀请所有的大学生社团参加阵亡烈士纪念活动，但“武装圈子”却拒绝与犹太大学生团体一起游戏，因为“他们与背叛烈士们的精神代表是同一阵线的”。<sup>③</sup>柏林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1929年国悼日上，国家议会纪念战争中阵亡的烈士时，因为遭到民族主义大学生的反对，犹太和民主社团被排挤在外。<sup>④</sup>

“纳粹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巴尔杜·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将知识行业超员的症结归为犹太人的无所不在。他伪造了大量的数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并暗示，一旦犹太人被拒之于知识行业和大学校门之外，超员最糟糕的情况就能迎刃而解。<sup>⑤</sup>

20年代，这一论点吸引了许多“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sup>⑥</sup>柏林大学的学生会于1928年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对“异族大学生”实行人数限制，1929年，大学生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定。<sup>⑦</sup>同年(1929年)，大学生们还组织了暴力活动反对普鲁士政府准许外国人行医的政策，谴责该决定是“锡安主义者的阴谋”，只会惠及东欧的犹太人。这个决定不仅在“文化上和道德上”是蛮横残暴的，

① *KC Blätter*, 15. 7. 1925, S. 52.

② *KC Blätter*, 15. 12. 1926, S. 94.

③ *KC Blätter*, 22. 5. 1929, S. 30.

④ *KC Blätter*, 30. 9. 1929, S. 79f.

⑤ Baldur von Schirach, *Wille und We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bundes*, Münchener Buchgewerbehause, München, 1929, S. 14-15.

⑥ *Hamburger Akademische Blätter* 9, 1. 7. 1928, S. 53-54.

⑦ *Die Schwarzburg* 38, Jan. 1929, S. 35-36.

而且还会严重损害德意志医生的利益。既然“医生已经过剩并且还有为数众多的医科大学生，这个决定就必然会导致医疗行业的严重困境”<sup>①</sup>。

若要探究“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们反犹主义的深层起源，则需考察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中产阶级反对“新时代”的心理动机。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战，经济形势决定了他们要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一个收入好的职位，但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他们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必须等越来越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怨气发泄在犹太移民大量涌入大学和知识分子就业领域的状况上。因此，对“东部犹太人”的仇恨愈演愈烈。“现今的犹太人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移民问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阻挡来自东部的滚滚洪流……我们应该接受上百万外族的新国民，而眼睁睁看着我们自己的同胞流离失所、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吗？”<sup>②</sup>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和知识行业中的犹太人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到20年代末，占总人口0.9%的犹太人占据了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生数量的3%，在综合大学中，他们占学生人数的4.8%——大多数在医学院和法学院中。1930年，学习医学或法律的学生中犹太人占5%以上。在某些大学中，如柏林和法兰克福，他们占学生总人数的10%；在小一点的大学中，如格赖斯瓦尔德、图宾根或者耶拿，却几乎不见犹太人的踪影。技术学院中的犹太大学生占2.4%，商业学院中占4.4%。像在综合大学中一样，他们只在大城市的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sup>③</sup>无论怎样，犹太人的数量根本没有达到支配大学和知识行业的地步。

右翼大学生组织强烈要求在国家和文化中“去犹太化”。几乎所有的日耳曼人都将德意志精神视为一种奇迹，将德意志的理想主义视为德国人精神的长存，而犹太人的世界观则被视为对立物，犹太人被视为天生的相对论者，而德国人则被视为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sup>①</sup> *Der Student* 10, 1. 2. 1929, S. 14.

<sup>②</sup> *Akademia*, 15. 2. 1920, S. 286.

<sup>③</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ommersemester, Berlin, 1930, S. 74f.

如果德意志精神受到相对主义的侵害就会死亡。为了证明这点，一位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家这样用苏俄的历史“事实”向人们发出警告：“在今天的俄国，所有的思想都受到了相对主义理性的攻击，现在，30万犹太人凌驾于1.5亿奴隶之上，这些人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神圣领袖。因此，德意志的劳苦大众只能期望希特勒的救赎。”<sup>①</sup>至此，希特勒及其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充分的基础，他只需要将反对“犹太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种子播下即可。

## 本章小结

即使在魏玛共和国的黄金年代，“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的生活水平和就业前景比20年代初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共和国更加友好。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前线青年的一代”毕业离开了校园，他们以前所倡导的与国家合作的思想逐渐衰退。二是不断萎缩的就业市场和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使“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自感前途渺茫，有关知识行业超员的警告和对知识分子“无产者化”的警告加重了本来就由于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所导致的不安心态，引起了他们对前途的恐慌。三是由于在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下，思想右倾的大学生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魏玛共和国内政的问题上，他们将知识阶层的“无产者化”与“犹太人的共和国”联系起来。

“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高度的自我期望值使他们自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国家精英储备力量”。在魏玛共和国平稳期，他们的这种“精神兴奋”常常是与右翼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在这个“左派统治”的时期里，他们未来的前景仍然是暗淡的，于是，他们以自身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迅速地团结在右翼党派的麾下，但此时这种右翼路线还是保守主义的，而不是激进主义的。但是，在这条右翼轨道上，要实现从保守到激进的跨越，并非十分困难，只需局势出现极端化的发展，就能实现这种跨越。

<sup>①</sup> *Akademische Blätter*, Aug.-Sep. 1926, S. 48f.

## 第四章 “倒向纳粹的一代” (1929—1933)

魏玛共和国末期，即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迅速下滑，到1932年8月，德国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40.6%，其中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下降53%，消费品生产指数下降25.3%，失业人数达600万，危机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sup>①</sup>这个时期也是德意志大学生与魏玛民主共和政体的关系走向破裂，并最终投入纳粹主义阵营的时期，本章关注的问题是：在这场经济大危机中，德意志大学生处于怎样的未来前景中？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大学生中会出现一场更激进的反犹主义浪潮？大学生们又是如何从组织上倒向纳粹主义阵营，从而成为“倒向纳粹的一代”的？唯有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理解一部魏玛共和国时代完整的大学生运动史。

### 第一节 就业危机与“倒向纳粹的一代”前途绝望

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导致大学生转向纳粹阵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行业的持续超员，他们在共和制下的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1910年出生的一代人，即德国生育高峰时出生的那代人，如今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到1931年，已经容纳了30万~33万人的知识行业又要面对14.8万的新毕业的大学生。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下，解决“知识分子过剩”问题变成了天方夜谭。这一代大学毕业生不仅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且他们现在什么工作都找

---

<sup>①</sup> 参见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第九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不到了，对前途的绝望使他们最终成为“倒向纳粹的一代”。

### 一、“知识行业超员”的白热化

从1931年起，大学入学率便陷于停滞并开始下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战后的出生率下降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无法阻止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数量的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毕业生的人数没有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学生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而不得不退学，从而想提前就业。1928—1929年，离开高校的学生人数为20 302人，而1931—1932年冬季学期，这个数目为31 376人。<sup>①</sup>

经济灾难的严重性引发了人们关于魏玛共和国“知识行业超员”的实际程度的大讨论。30年代初的预测表明，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将达到15%~50%。<sup>②</sup>劳动部在1933年1月公布的一项数据表明，45万名知识分子中的15万名找不到工作。<sup>③</sup>严重的失业率涉及各个行业。例如，1930年至1931年间，在律师和经济学家中，每个招聘广告都能吸引几百名应征者。<sup>④</sup>工程学科也不例外，一项对普鲁士工程学院毕业生的调查发现，1932年，该校毕业生的失业率为50%。<sup>⑤</sup>根据调查，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失业率达到了33.8%，化学家的失业率为16.2%，建筑师的失业率为40.6%，药剂师的失业率为10.9%，“管理层”雇员的失业率为8%，家庭私人教师的失业率为18.4%，编辑和作家的失业率为22%。<sup>⑥</sup>

<sup>①</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ommersemester, 1932, S. 5; Wintersemester 1931-1932, S. 3-4.

<sup>②</sup> *Die Schwarzburg* 29, Apr. 1930, S. 197.

<sup>③</sup> Jenő Kurucz, *Struktur und Funktion der Intelligenz während der Weimarer Republik*, Grote, Köln, 1967, S. 110.

<sup>④</sup> Julius Magnus, *Die Notlage der Anwaltschaft*, Moeser, Leipzig, 1930, S. 6.

<sup>⑤</sup> *Studium und Beruf* 2, Nov. 1932, S. 299.

<sup>⑥</sup>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Volks-, Berufs- und Betriebszählung vom 16. Juni 1933*, Bd. III, Berlin, 1936, S. 22-24.

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到了高级公职人员的收入。政府试图使固定工资与下跌的日用品价格相匹配，以刺激投资和就业。1930年6月，随着总统紧急状态法令的颁布，公职人员被列入所谓的“援助国家”计划——即公职人员2.5%的收入被强制收缴来帮助国家平衡失业保险赤字。到1931年，一系列相继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令吞噬了公职人员工资的12%~13%，加上各个州的盘剥，高级公职人员怨声载道，被剥夺的工资份额从普鲁士的25%至奥尔登堡的50%不等。从1929年至1932年，公职人员的工资平均下降了15%~20%，但实际生活开支也下降了22%。<sup>①</sup>但是，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别对于拿固定工资的人们而言却是别有意味的，他们的工资随着每一个法令的颁布而缩水，从心理上讲，唯一的效果就是导致了公职人员和管理层雇员的愤怒。因为他们将此视为国家对他们的政治迫害。<sup>②</sup>

知识分子工资的下降及失业率的增长对学生选择职业产生了影响。由于政府开支的缩减，公职人员的从业道路已被封闭，这使得大量法律系和教育系的毕业生面临失业，中学师范专业和法律专业的注册率直线下降。与1928年一年级大学生的数量相比，1932年，选择这两个专业的学生数量分别下降了45%和30%。<sup>③</sup>紧随其后的是工程专业和技术专业，由于工业发展的减速和关于就业者“绝望”的过分报道，人数下降了25%。<sup>④</sup>

与这种下降趋势相反的是，1932年，选择神学和医学的学生人数在上涨，当然，实用主义的考虑是主要原因，因为神学是没有受到超员影响的极少数知识行业之一。选择神学作为主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比1928年高出了36%。<sup>⑤</sup>但神职协会立即警告说，短缺已经填满，不必再期待更多的就业机会。

① *Deutsche Philologen-Blatt* 38, 18. 6. 1930, S. 369f.

② Werner Kaltefleit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in Deutschland. Konjunktur als Bestimmungsfaktor des Parteiensystems*, Westdeutscher Verlag, Köln, 1966, S. 90.

③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ummersemester 1932, S. 33.

④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wintersemester 1931-1932, S. 13.

⑤ *Wingolfsblätter* 60, 15. 10. 1931, S. 479.



公职人员和私人经济道路的阻塞也促使大学生们倾向选择医学专业，1932年，选择医学专业的比例比1928年上升了50%。<sup>①</sup>尽管30年代初超员的预警不断，但是，学习医学的学生仍是该行业能够吸纳劳动力的两至三倍。因为，大学生们认为，医疗行业至少是一门实用的行业，至于是否有一天病人能够登门求医，他们总是抱以乐观的态度的。出于同样的原因，牙医、药剂师和兽医学的注册率也增长了，尽管行业协会努力刻画其黯淡的前景以阻止其增长。<sup>②</sup>

过量的受教育人口引起了恐慌与谴责，见诸报端的愤怒、怨恨所使用的词汇与20年代相比更加具体，所不同的是，以前倘若是焦虑的话，现在则是绝望。

大学生刊物上对就业前景怨声载道：“工作对教育程度的要求日益提高；中级公职人员以及非知识行业岗位的紧缺迫使大量的求职者不得不接受高等教育；30年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逼迫年轻的德国人进入大学消磨时光。”<sup>③</sup>正是“知识分子大众化”降低了德国高等教育的质量，<sup>④</sup>学术刊物上到处充斥着“知识无产者”的恐怖数据。《行动》(*Die Tat*)写道：“今天，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了一个可疑的头衔‘博士’在奋斗……它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吞噬民族的泛滥成灾的精神疾病，一种教育病态心理，尽管其后果可以一眼洞悉。”<sup>⑤</sup>

《大学生》(*Der Student*)期刊上登载了一封愤怒的来信，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愤恨之情：“这种状况不能再被放任自流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来制止这个生产过剩的知识分子的系统。有多少莫可名状的苦难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啊，都是因为高等教育无法与应有的生活方式相协调。过度教育将整个持续贫困化的世界拖入绝望。今天，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医学博士、法律博士或药学博士。而每个小

①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57, 6. 3. 1931, S. 436.

② *Studium und Beruf* 1, Mai-Juni 1931, S. 25-26; 2, Jan. 1932, S. 16; 2, Juli-Aug. 1932, S. 191; 2, Nov. 1932, S. 274, S. 294.

③ *Der Student* 11, 1. 11. 1930, S. 7.

④ *Studentenwerk* 6, 1932, S. 30.

⑤ *Die Tat* 22, Jan. 1931, S. 815.

商人却拥有一辆小轿车！这支知识分子大军既无工作也无收入，因此他们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无产者化了。不仅是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经济上遭受打击，而且博士学位的膨胀也使我们的颜面荡然无存。”<sup>①</sup>

博士学位的泛滥是一种无法抵制的痛楚。知识中产阶级对 20 年代初纸币的一夜贬值还记忆犹新，现在则又被迫面对文凭的贬值。1932 年，一名评论家写道：“一年到头，大量的博士和各种文凭正在使大学学位的商业‘交换价值’变得一文不名。”<sup>②</sup>另一名知识分子也评论道：“学位的泛滥意味着贬值！”<sup>③</sup>

“知识分子名誉的贬损”已经是大势所趋。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过剩贬低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学术文化本身”<sup>④</sup>。

整个德国受教育群体都强烈主张恢复知识精英的传统地位，要求回到往昔美好的生活，至少大学注册率不应该再任意起伏，因为泛滥的大学注册率必然引发拜物主义和失业。<sup>⑤</sup>《大学生》精当地指出：“过剩的教育和不当的、徒劳的研究所产生的危害比不学无术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sup>⑥</sup>要求对知识分子进行一次严格筛选的呼吁日益高涨。<sup>⑦</sup>

萨克森州教育部长威廉·哈特纳克(Wilhelm Hartnacke)提出，应对入学率进行限制：“整个教育结构已经不堪重负了。它呈现出的并不是知识分子位于尖端的金字塔形状，而是头大身小的怪兽，人们被教育冲昏了头脑。”<sup>⑧</sup>一名大学生在《大学生》杂志上强调教

① *Der Student* 12, 15. 3. 1931, S. 14.

② *Die Tat*: 23, März 1932, S. 1005-1006.

③ *Wingolfsblätter* 59, 15. 4. 1930, S. 156-157.

④ 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4, p. 101.

⑤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31, 7. 6. 1930, S. 458.

⑥ *Der Student* 11, 1. 11. 1930, S. 8.

⑦ *Studium und Beruf* 2, Jan. 1932, S. 18-19.

⑧ Wilhelm Hartnacke, *Bildungswahn-Volkstod*, München, 1932, S. 70.

育的精英属性：“若无丑恶，则无美善；若无大多数人的无知，则无少数人的文明……亚里士多德曾说，有的人生而治人，有的人生而治于人……没有人能够改变宿命。”<sup>①</sup>学术刊物普遍强调，教育是为了某些人而特设的，因此，“教育这个词本质的意义曾经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为了卓越的少数人存在的”<sup>②</sup>。高等教育一旦变成了全民都易于享有的事物，那么大学的学术水平必然会下降。知识分子经常重申这一论点是因为“社会高等阶层的平均智力理所当然要比低等阶层的高”<sup>③</sup>。这被认为是“种族—生物”学事实。哈特纳克认为：“教育一旦被民主化，就变得浅薄、枯燥和劣质。”<sup>④</sup>

右派评论家很快就明确定义了那些使教育变得“浅薄、枯燥和劣质”的力量。右翼期刊《钢盔团大学生》(*Der Stahlhelm Student*)质问道：“为了成为一名厨师，人们需要大学文凭，而为了得到一个行政职位，仅靠小学文化和加入某一党派就足够了，这难道不可笑吗？”<sup>⑤</sup>《大学生》杂志支持了这一主张：“‘教育财产’的社会化正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同谋”将学校体系纳入一个为了“有计划地摧毁我们民族一切非自由的势力”的机构之中。<sup>⑥</sup>

许多大学生协会及校友会刊物指责社会民主党迫使大学生参与政治，将他们变成了“激进党派政治的工具”，因为“知识无产者总是能助社会主义政策一臂之力的”<sup>⑦</sup>。用“下层”吞没大学正是颠覆中产阶级教育地位的手段，这一看法继承了20年代中期的观点：低层阶级心怀不轨要侵犯知识分子的生活。因此，在经济危机期间，大学和知识行业的超员问题与通过高等教育向上爬的问题并存。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不受欢迎的新成员”的态

① *Der Student* 12, 15. 3. 1931, S. 14.

② *Der Student* 11, 1. 11. 1930, S. 8.

③ *Arzt, Hochschule, Krankenhaus* 2, 15. 6. 1932, S. 83.

④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32, 31. 1. 1931, S. 94.

⑤ *Der Stahlhelm Student* 2, 1930-1931, S. 11.

⑥ *Der Student* 11, 1. 11. 1930, S. 7-8.

⑦ *Hamburger Akademische Blätter* 11, 1. 5. 1930, S. 33.

度与其对知识分子经济崩溃的担忧交织在一起。1932年的一篇文章论述了大学和中学里的超员，并将它与大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上升”观联系起来。这篇文章的作者强调经济已经无法再吸纳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了：“如果不限制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就无法为知识行业消除不必要的竞争……让每一个下层出身的高中生都被知识行业‘拯救’，是完全不现实的。”<sup>①</sup>

由于对高级社会地位的追求被看作导致毕业生过剩的原因，因此，有人要求限制教育遭到的“不友善”的滥用。<sup>②</sup>如果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能够当上一名初级工匠或者商业的中层雇员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为寻求社会尊重而争相挤入大学。因为他们学术天赋的不足，只能引起大学的学术水平的下降，并反过来又使自身“无产者化”，但最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威胁到了大学文凭的社会价值。

## 二、“倒向纳粹的一代”对自身前途的绝望

在“知识行业超员”危机不断恶化的状况下，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不仅给了“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本来就危如累卵的经济状况最后一击，而且还强烈冲击了他们的心理。据统计，到魏玛末期，全德国35.4%的大学生都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平之下，<sup>③</sup>到1932年，已有33%的大学生无法独立供养自己。<sup>④</sup>1930年，《行动》杂志刊登了布鲁诺·哈肯(Bruno Haken)的短篇小说《您有工作吗?》(*Haben Sie schon Stellung?*)<sup>⑤</sup>就反映了这一急迫的社会问题。主人公是化学家托尼(Tonny)博士，他是典型的“牺牲品”一代。在大学工作了几年后，因无升职的希望，便辞职并去了一家化妆品公司。

<sup>①</sup>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33, 22. 9. 1932, S. 818-819.

<sup>②</sup> *Wingolfsblätter* 61, 15. 12. 1932, S. 541-542.

<sup>③</sup> Gerd Giebler, *Das Werkstudententum, eine Folge wirtschaftlicher Notlage der deutschen Studierenden, sein Sinn und sein Ertrag*, In: *Die Schwarzburg*, Apr. 1930, S. 156-163.

<sup>④</sup> Friedrich Maetzel, *Doktoren ohne Brot. Studierende Proletarier*, In: *Die Tat* 23, 1932, S. 1004-1011.

<sup>⑤</sup> *Die Tat* 21, Feb. 1930, S. 829-836.

这家公司不久就倒闭了，原来的助教岗位也被别人填补了。托尼拜托周围的熟人和亲戚帮助找工作，但都无果而终。他每天递交 25 份求职申请，但都石沉大海。当他向富裕的叔叔借钱时，遭到拒绝：“你已经 28 岁了，却一事无成，大男孩啊，28 岁，你自己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状况？”当他申请一份办公室杂活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告诉他，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早就不需要了。尽管托尼假装自己仍对前途充满信心，可他的言词犹如他的前途一样虚无。作者并没有交代托尼最终是否加入了纳粹，但这即便发生了，也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学术刊物悲观地预计，知识行业的过剩、失业和收入下跌只会导致大学生和年轻的毕业生们发起极端的政治运动。失业的大学生远比失业的工人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危险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坚决认为，国家将他们作为首要敌人。显然，由此造成的自暴自弃的、绝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幽灵是十分恐怖的。<sup>①</sup>

这一代的大学生认为他们的困苦要甚于任何其他的社会群体。因为工人可以轻松等待时机并最终重新找到工作。但是，对于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而言，无所事事就意味着事业终结。而且，超员和失业加剧了民族受到的“种族—生物”伤害，因为就业推迟导致结婚推迟，减少了生儿育女的机会，并且轻率性行为的高发生率也不利于健康。<sup>②</sup>失业是对他们身心的双重打击。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他们还没有做好接受困境的心理准备，所以比其他阶级更脆弱。对于精英而言，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不被社会需要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领导的骨干力量。1932 年，一篇文章写道：“经过了漫长的八个、十个或十四个学期的研究与考核之后，大学生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等待、填写求职表、遭到拒绝并继续等待。三年之后，他们的精神崩溃了……时间和金钱的代价太沉重了，以致他们无法接受这一结果。”<sup>③</sup>

<sup>①</sup> *Der Leitende Angestellte* 14, Dez. 1932, S. 222.

<sup>②</sup> Wilhelm Hartnacke, *Bildungswahn-Volkstod*, München, 1932, S. 59.

<sup>③</sup> *Die Tat* 23, März 1932, S. 1008.

狂怒的大学生强烈要求政府为积压的知识分子求职采取某些行动。他们将有限的生存空间归咎于失败的战争和《凡尔赛和约》，以及战争赔款和军事限制，要求为自己的职业开辟“生存空间”或“机会”。<sup>①</sup>

但究竟去何处寻找这个“生存空间”则成为热烈讨论的时事。1930年，“德意志大学生会”(Deutsches Studentenwerk)提出一个问题：“德国青年到哪里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在知识行业超员持续期间，受到最大打击的就是德国的青年一代……大学的超员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迎刃而解的问题。毋宁说它是德国灾难性的就业形势的副产品……德国青年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空间？成千上万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去哪儿找工作？这个问题应当成为德意志民族真正的领导人所面对的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sup>②</sup>

要求开辟海外殖民地的呼声日益高涨，<sup>③</sup>另有人主张为知识分子建立农业地盘，<sup>④</sup>还有人主张通过下调强制性退休年龄和在正式人员中强制实行带薪年假制度，以减轻青年知识分子的过剩问题。另一项更激进的倡议是，让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先进入手工工厂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sup>⑤</sup>

知识分子提出的主张中，最坚决的要求就是“人数限制”。<sup>⑥</sup>实施的困难在于“人数限制”的具体执行形式，以及在哪些领域实行。有人要求在入学上实行人数限制，有人希望由各个学院组织激烈的竞争来筛选学生。同样，在自由职业和公职人员的预备期或实习期上也将设立人数限制制度，或者在大学生毕业离校即将踏入工作岗位前实行这项制度。总的趋势是，除了讨厌的犹太人外，还要将女大学生淘汰出校园，因为她们夺走了很多工作机会并逃避作为妻子

① *Studentenwerk* 1, 1927, S. 147; 4, 1930, S. 187.

② *Studentenwerk* 4, 1930, S. 161f.

③ *Der leitende Angestellte* 12, Dez. 1930, S. 219-220.

④ *Studentenwerk* 6, März-Apr. 1932, S. 62f.

⑤ *Die Tat* 22, Jan. 1931, S. 822-823.

⑥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33, 22. 9. 1932, S. 801-802.

和母亲的角色。<sup>①</sup>

不能忽视的是，对人数限制的呼吁不仅是代际冲突的另一种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对现存体制彻底失望的表现，很快，他们就找到导致自己失业的原因——犹太人的泛滥，因此，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反犹运动，并且与种族主义越走越近。这种大学生倒向纳粹主义的明显倾向，意味着共和制度的行将就木。正如威廉·哈特纳克预言的那样，知识行业的超员只不过是“自由国家垂死呻吟”的另一预兆。<sup>②</sup>

## 第二节 “倒向纳粹的一代”与反犹浪潮的爆发

由于惨淡的经济状况和黯淡的就业前景，“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在政治上更加激进，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也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犹太人已成为这个时代可憎的、具有威胁性的敌人，这为纳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砝码。正如进步学者巴尔(Bahr)所说：“反犹主义就是小市民们的吗啡。即使没有犹太人，他们也会杜撰出某种与反犹主义类似的东西。”<sup>③</sup>由此可见，这场反犹浪潮的爆发不过是处于经济大危机之中的这一代德意志日耳曼大学生们寻求自身灾难“替罪羊”的一种反映。而这场大学生反犹浪潮的兴起，正是大学生最后倒向纳粹阵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 一、限制犹太大学生人数的理由

当德意志知识界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不停地要求限制大学入学人数的时候，犹太大学生便首先成为“必须限制的对象”。犹太大学生之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原因也不难寻找，因为犹太大学生入学的比例是高于日耳曼大学生的。因此，减少犹太大学生的数

<sup>①</sup> *Die Schwarzburg* 41, Jan. 1932, S. 14.

<sup>②</sup> Wilhelm Hartnacke, *Bildungswahn-Volkstod*, München, S. 5.

<sup>③</sup> Paul W. Massing, *Vo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a. M., 1959, S. 177.

量，使之与其在国民人数中的比例相当，成为了日耳曼大学生反犹太主义的下一个目标。

限制犹太大学生入学数量这个提议是由“纳粹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坦普尔首先提出来的。在1926年夏于波恩举行的“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t)大会上，坦普尔提出了“异族人数限制”政策。在第二任领导人席拉赫的领导下，“纳粹大学生联盟”对犹太人的数量限制政策正式实施。1929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在维尔茨堡、柏林和爱尔兰根大学生大会上做出人数限制决定。在慕尼黑和卡尔斯鲁尔技术高校，“大学生代表委员会”的纳粹代表也提出类似的建议。1929年汉诺威召开的第12届大学生大会上，慕尼黑技术高校的纳粹大学生提出人数限制议案，受到所有“纳粹大学生联盟”代表的热烈赞成。在后来的“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t)大会上，“纳粹大学生联盟”将限制犹太人之策全面推行。

根据《国家高校统计》，1929年夏季学期，柏林的犹太大学生比例为9.56%。因此，1929年11月28日，戈培尔主办的报纸《进攻》(*Der Angriff*)故意提高数据称柏林的犹太大学生占10.29%，法兰克福占10.09%，汉堡占4.76%。<sup>①</sup>但无论怎样，与犹太人在德国总人口中的数量相比，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根据1925年6月的统计，犹太居民占柏林总人口的4.29%，法兰克福的6.29%，汉堡的1.83%。但在全国的平均水平仅为0.9%。<sup>②</sup>而在1928年夏季学期，全德高校的犹太大学生占4.73%，1930—1931年冬季学期4.39%，1932—1933年冬季学期4.73%。<sup>③</sup>但对于德意志大学生而言，他们仍然感到犹太人大学生在侵占他们的就业市场。1929年11月28日的《进攻》说，犹太大学生抢占了80%的知识行业。<sup>④</sup>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47.

<sup>②</sup> Helmut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Musterschmidt Verlag, Göttingen, 1966, S. 274.

<sup>③</sup>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erlin, 1928-1933.

<sup>④</sup> *Der Angriff*, 28. 11. 1929.



1930年夏的一份纳粹的宣传单则称70%的行业被犹太大学生夺走。<sup>①</sup>纳粹律师团体(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 Juristen-Bund)的领导人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在向慕尼黑“纳粹大学生联盟”发表的演讲中称“40%至50%的律师行业被犹太人掠夺”<sup>②</sup>。当然,他显然恶意夸大了数据。

但是,在法律行业、医学及教师行业,犹太人所占的比重似乎特别大。在法兰克福,犹太医生占行业从业人数的68%,在汉堡占25%,在科隆占27%;法律行业从业人数,犹太人在法兰克福占64%,在汉堡占24%,在科隆占27%。在全德,根据席拉赫的计算,医生和律师占到全行业的10%。<sup>③</sup>在柏林大学医学系,教师占全校的14%,而犹太教师则占该系的38%。<sup>④</sup>《人民观察家》(*Völkisch Beobachter*)说犹太讲师的数量占9.5%(全国4800名讲师中犹太讲师有460人)。<sup>⑤</sup>因此,1932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强调“非犹太大学生,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否也会成为10万无计可施的知识分子之一……我们非犹太大学生盼望日后经济独立,要打破犹太对知识行业的垄断”<sup>⑥</sup>。

这些数据乍一看似乎论据充足,但大多是夸大其词或者断章取义的。就在“纳粹大学生联盟”叱咤风云的1925—1933年,犹太人

---

① Wolfgang Kreuzberger, *Studenten und Politik 1918-1933. Der Fall Freiburg im Breisgau*,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1972, S. 113.

② *Hessische Volkswacht*, 27. 11. 1931.

③ Baldur von Schirach, *Die Hitler-Jugend, Idee und Gestalt, Zeitgeschichte* Verlag, Berlin, 1934, S. 52.

④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48.

⑤ *Völkisch Beobachter*, 9. 2. 1926.

⑥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48.

占全国总人口的数量从 0.9% 降至 0.76%，<sup>①</sup>这种趋势也必然反映在高校中。普鲁士大学中的犹太学生在 1886 年时占总大学生数量的 9.61%，而到了 1930 年则只占 5.08%。<sup>②</sup>而纳粹的统计数字总是选取柏林、法兰克福、汉堡和科隆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犹太人很多聚居在这些大城市中，尤其以柏林和法兰克福为首，因此，这些城市中犹太大学生的数量相应较多。但如果考察一下小型高校，如哥廷根、格赖斯瓦尔德、哈勒、基尔、马尔堡或者明斯特，就会惊异地发现，犹太大学生的数量非常少，根据“同乡会”的统计数据，1929—1930 年冬季学期，普鲁士各高校中的犹太大学生比例为：在哥廷根占 0.8%，在格赖斯瓦尔德占 0.2%，在哈勒占 0.7%，在基尔占 0.4%，在马尔堡占 0.8%，在明斯特占 0.3%，远远低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sup>③</sup>在某些专业中，如医学和律师，犹太大学生的数量很多，但在某些行业中却非常少，如地理、农学、兽医、矿业、林学等。

这些行业中犹太人数量多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在不断增长的经济困境下，要保持独立，犹太人更倾向于选择医生和律师专业。根据班纳森 (Bennathan) 的统计，1933 年，实际医生中犹太人占 10.9%，律师中占 16.3%，公证人中占 13.3%。<sup>④</sup>在公务员领域，犹太人的全国平均比例为 0.5%，<sup>⑤</sup>高级

<sup>①</sup> Erich Rosenthal, *Trends of the Jewish Population in Germany 1910-1939*, In: *Jewish Social Studies* 6, 1944, S. 236.

<sup>②</sup> Ernst Ludwig Ehrlich, *Judenfeindschaft in Deutschland. Von der Römerherrschaft bis zum Zeitalter der Totalität*, In: Karl Thieme (Hg.), *Judenfeindschaft. Darstellung und Analysen*, Fischer Nr. 524, Frankfurt a. M., 1963, S. 237.

<sup>③</sup> *Landsmannschafter-Zeitung*, Nov. 1930, S. 241.

<sup>④</sup> Esra Bennathan, *Die demograph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 der Juden*, In: Werner E. Mosse (Hg.), *Entscheidungsjahr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66, S. 111f.

<sup>⑤</sup>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Quadrangle, 1967, p. 56.

公务员中只占 0.3%。<sup>①</sup>1933 年,每 1 000 名中小学、高校教师、工程师、自然科学教师、人文科学教师中只有 8 名犹太人,与其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相当。<sup>②</sup>但高校教师中,根据 1931 年洛文塔尔(Lowenthal)的统计为 6%,而这种状况是因为其他行业中的犹太人很少。<sup>③</sup>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反犹太主义的激进立场,他们已经给犹太人打上了阴险狡诈的烙印。

事实上,纳粹大学生所称的犹太人包括两部分——受洗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和东方犹太人。第一种犹太人的名声尤为不好,他们同时背负了犹太教的“叛徒”和基督教的“病菌”的恶名。因此,反犹太主义放弃原来的以宗教论种族,而使用用血统论种族的方法,提出“犹太血统”的概念,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还没有系统化,直到第三帝国时期才成为正式条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统计,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约占 10%,因此魏玛时期这一比例应该稍高。<sup>④</sup>根据洛文塔尔的观点,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应该差不多是这个份额。<sup>⑤</sup>东方犹太人的数量难以统计。19 世纪末,俄国犹太人被允许进入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到大屠杀的迫

<sup>①</sup> Ernst Ludwig Ehrlich, *Judenfeindschaft in Deutschland. Von der Römerherrschaft bis zum Zeitalter der Totalität*, In: Karl Thieme (Hg.), *Judenfeindschaft. Darstellung und Analysen*, Fischer Nr. 524, Frankfurt a. M., 1963, S. 26.

<sup>②</sup> Esra Bennathan, *Die demograph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 der Juden*, In: Werner E. Mosse (Hg.), *Entscheidungsjahr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66, S. 112.

<sup>③</sup> E. G. Lowenthal, *Die Juden im öffentlichen Leben*, In: Werner E. Mosse (Hg.), *Entscheidungsjahr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66, S. 78f.

<sup>④</sup> Helmut Genschel,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1966, S. 20.

<sup>⑤</sup> E. G. Lowenthal, *Die Juden im öffentlichen Leben*, In: Werner E. Mosse (Hg.), *Entscheidungsjahr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66, S. 78.

害，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德国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故乡，席勒和歌德的故乡”。他们也与德国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就业市场展开竞争。因此，普鲁士高校中的犹太大学生比例从 1886—1887 年冬季学期的 9.8% 上升到 1908—1909 年冬季学期的 21.7%，在全德，犹太大学生的比例从 0.9% 提高到 1.9%。<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来自俄国（包括巴尔干地区和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涌向西方，大部分因为政治原因涌入德国和奥地利的高校。到 1933 年，“纳粹大学生联盟”统计，外来犹太人的移民已经超过了本土犹太人的出生率。<sup>②</sup>纳粹将非德意志公民的犹太人都称为“东方犹太人”。1925—1933 年，外来犹太人的比例从 19.1% 上升到 19.8%。<sup>③</sup>因此，纳粹强调，几乎每个犹太大学生要么本身是东欧移民，要么其祖父是犹太移民。但许多犹太大学生只是想来德国学习知识，毕业后仍想回家乡工作。附录表 11 显示，1928—1933 年，三分之一的古典语言学犹太人大学生回到东欧故乡。<sup>④</sup>类似的还有农学系的犹太大学生，根据统计，在普鲁士，农业系及其他难就业的专业中的犹太大学生就业率只有 0.05%；而这 0.05% 中大概有十分之一来自国外，<sup>⑤</sup>如果不

<sup>①</sup> Shalom Adler-Rudel,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880-1940. Zugleich eine Geschichte der Organisationen, die sie betreut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59, S. 12.

<sup>②</sup> Shalom Adler-Rudel,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880-1940. Zugleich eine Geschichte der Organisationen, die sie betreut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59, S. 146f.

<sup>③</sup> Shalom Adler-Rudel,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880-1940. Zugleich eine Geschichte der Organisationen, die sie betreut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59, S. 165.

<sup>④</sup> Friedrich Burgdörfer,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Welt. Ein statistischer Beitrag zur biologischen, beruflichen und sozialen Struktur des Judentums in Deutschland*,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Dritten Münchener Arbeitstagung des neuen Deutschlands vom 5. bis 7. Juli 1938*, Hamburg, 1938, S. 189.

<sup>⑤</sup> Heinrich Sibergleit, *Die Bevölkerungs- und Berufsverhältnisse der Juden im Deutschen Reich*, Akademie Verlag, Berlin, 1930, S. 120

能在德国找到工作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返回故乡。

在纳粹的煽动下，一般日耳曼大学生将竞争的矛头指向东方犹太人，他们深受“纳粹大学生联盟”的蛊惑：“这些东方犹太大学生之所以能够来德国高校学习，完全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钱，绝不是什么正派人”。<sup>①</sup>他们还人为地制造一些案例。比如，法兰克福的纳粹大学生坚持认为，犹太人的仓库的黄油不仅都是半磅装的，而且每块缺少10克。可以想象，通过缺斤少两，犹太人赚了多少钱不义之财。<sup>②</sup>因此，他们认为，犹太人总是想方设法从日耳曼大学生中揩油，是日耳曼大学生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虽然犹太大学生衣着光鲜，营养过剩，大腹便便，但这都是因为他们夺取了本应属于德意志大学生的奖学金。<sup>③</sup>在这里，纳粹的煽动家有意隐瞒了那些像德国大学生一样贫苦的犹太大学生。

总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这一代日耳曼大学生坚信，大部分犹太学生的经济状况同德国大学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的反犹主义是防御性质的，而来自中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们们的反犹主义则是进攻性的。

## 二、“倒向纳粹的一代”反犹活动高涨

在所谓的“犹太人威胁”论下，反犹主义运动成为高校的一项日常事务。早在1928年，希特勒就向慕尼黑大学生发出了呼吁：“别说好听的，要实际行动”。<sup>④</sup>在“纳粹大学生联盟”组织的领导下，大学生反犹行动现在开始采取了一种新形式。他们不仅针对犹太大学生，而且针对持共和主义立场的教授们。由于在大危机当中

<sup>①</sup> *Der Angriff*, 28. 11. 1929.

<sup>②</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52.

<sup>③</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52.

<sup>④</sup>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0. 11. 1928.

纳粹主义对日耳曼大学生的特殊吸引力，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贫苦の日耳曼大学生开始倒向纳粹主义，他们宣称要“反抗堕落的体制”。这些转向纳粹主义的大学生认为，由于长期堕落，大部分教师已经成为思想僵化的老顽固，而那些犹太高校教师，正是魏玛民主制的活象征。

早在1928年夏季学期，柏林的日耳曼大学生就开始发动了反对犹太大学生的运动。1929年11月13日，柏林大学生宣布，在纳粹的领导下，将于柏林黑格尔广场举行一次“抗议示威”。他们高喊“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和“觉醒吧，德国！”（Deutschland, erwache）<sup>①</sup>1930年11月12日，柏林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反犹游行。《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写道：“今天中午，12点半刚过，500名右翼激进主义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在校园广场上、在菩提树大街上游行，咒骂当今政府。此外他们还猛烈抨击共和国。在这场动乱中，一名社会民主党大学生被殴打受伤，接受治疗。在大学里，一名犹太女大学生被纳粹分子揪出，打翻在地，拳打脚踢。共和主义大学生被驱赶至学校前的花园……右翼激进主义大学生的口哨声和叫嚣声在大学里回荡。轮番喊着口号‘觉醒吧，德国！’和‘犹太人，滚出去！’（*Juden raus*）。”<sup>②</sup>

此时，在这一代大学生的观念中，“犹太人”等于“共和主义者”，他们公开反对有损“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包括犹太人、共和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1929年夏季学期，哥廷根大学生则掀起了反对犹太讲师埃尔博根（Elbogen）的一场声势不小的运动。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基尔大学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家鲍姆伽登（Baumgarten），爱尔兰根大学生反对历史教授伯恩哈德·史迈德勒（Bernhard Schmeidler），莱比锡大学生反对教授格哈德·凯斯勒（Gerhard Kessler）之类的运动频频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54.

<sup>②</sup> *Berliner Tageblatt*, 12. 11. 1930.

发生，因为这些教授学者都是拥护共和制的。同时，反犹主义同反共和主义也走向联合。

针对大学生中的这种右派观点，不少共和主义的学者早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哈勒大学的著名神学家德恩(Dehn)，写道：“年轻人现在虽然在努力奋战，但他们的理想主义是错误的。扭曲的理想主义是魔鬼。用狂热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爱国思想来保卫祖国当然是错误的。相反，它只会葬送祖国。”<sup>①</sup>但是，他的思想遭到了大学生的激烈反对，以至于新教监事会迫于形势不得不表态，德恩在处理严肃的祖国问题上缺乏正确的思考。1931—1932年冬季学期，德恩的神学课堂上一片混乱，第二天大学校长不得不惊动警察来安抚大学生，而大学生则封锁了校园，进一步威胁校长让步。迫于这种局面，德恩被迫承认自己的斗争导向错误。在1932年夏季学期，他被停职。<sup>②</sup>

另一个遭到大学生激励反对的人物是海德堡的统计学教师埃米尔·尤里乌斯·贡贝尔(Emil Julius Gumbel)。他研究了大量档案，揭示了德国代表团对争取人权减少《凡尔赛和约》的伤害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祖国”这个词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将一战称为“耻辱的战场”，因为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为荣誉而战的生命。<sup>③</sup>结果，贡贝尔申请教授的意愿遭到学院和学校董事会的否决。而且，还引发了海德堡大学生发动游行示威，遭到“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StA)的封杀。整个事件以贡贝尔被解雇告终。

著名法学家西奥多·莱辛(Theodor Lessing)根据汉诺威的哈尔曼(Haarmann)审判著书，认为“德国的法律系统体现了中产阶级的落后性，掩饰了真理”<sup>④</sup>。他认为大学生相当“自私自利”，对工人

---

① Günther Dehn, *Kirche und Völkerversöhnung. Dokumente zum Hallischen Universitätskonflikt*, Berlin, 1929, Furcht Verlag, S. 90.

②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Nov. 1931; Juni 1932; Juli 1932; Aug. 1932.

③ *WSC-Nachrichten*, Dez. 1930, S. 475.

④ Theodor Lessing, *Haarmann. Die Geschichte eines Werwolfs*, Die Schmiede Verlag, Berlin, 1925, S. 331.

阶层漠不关心。<sup>①</sup>莱辛早在 1925 年就对当时大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这位非共和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进行过揭露。他写道：“一个虽然正直、但一无所知的士兵是不能谋求国家最高统治职位的。因为，一个哲理将被兴登堡的登基所毁灭。现在他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扬声器，一个傀儡(Zero)。虽然人们会说：‘宁要傀儡(Zero)，不要暴君(Nero)’(besser ein Zero als ein Nero)。但遗憾的是，历史往往证明，今天的傀儡就是明日的暴君。”<sup>②</sup>多么一针见血！但是，反对莱辛的大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活动，公开抵制莱辛的课，最终莱辛被解职才平息了大学生的怒气。

以上种种事件表明，在日耳曼大学生向极端右翼的纳粹主义转向时，这些正义的学者、教授很自然地成为了首要攻击的目标，以致在希特勒夺权前夕，这些教师已被大学生们赶出了校园。为此，“纳粹大学生联盟”得意地宣称：“按照我们的观点，大学也是为了德国重生的一个战场。当我们将非德意志思想从高校和工厂中清理干净时，年轻人就自由了。这也能证明，年轻的德国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一个祖国。这是我们的理想，教授先生们，这就是我们的誓言！如果这在您看来是魔鬼的话，那很好！我们会嗤之以鼻。”<sup>③</sup>与此同时，作为替代传统大学生社团的新型组织——“纳粹大学生联盟”也不断地从大学生中吸收有生力量，迅速地崛起。

### 第三节 “倒向纳粹的一代”与“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崛起

纳粹党实现城市选民上的突破正是从德国大学的校园开始的，

<sup>①</sup> *Wingolfsblätter*, 15. 7. 1926, S. 205.

<sup>②</sup> August Messer, *Der Fall Lessing. Eine objektive Darstellung und kritische Würdigung*, Gustav Wittler, Bielefeld, 1926, -S. 17-21.

<sup>③</sup> Ernst Bizer, *Der Fall Dehn*, In: Wilhelm Schneemelcher (Hg.), *Festschrift für Günther Dehn*, Kreis Moers, Neukirchen, 1957, S. 256.



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绝望的经济形势下，大学生将怨恨的矛头再次指向了《凡尔赛和约》、“杨格计划”和“魏玛政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一个“卡里斯玛”式人物的拯救。这可以解释为何1929年10月经济危机来临之时，“纳粹大学生联盟”已经成为德国19所高校的校园政治中最强有力的派别。<sup>①</sup>到1931年，学生纳粹党员控制了15所大学的学生会并在另外10所大学中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导地位。“大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十个地方分会中的八个领导人为纳粹党员。<sup>②</sup>这场突破同时还非大学生的德意志青年带到了纳粹主义的麾下，以至于纳粹运动成为了一场青年运动，在纳粹党中，18~30岁的党员数量从1931年的37.6%上升到夺权前夕的42.2%。相反，1931年，社会民主党中，18~30岁的党员仅占总党员的19.3%。而在德国总人口中，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为31.1%。<sup>③</sup>

纳粹党是如何实现这场关键性的突破的呢？显然，“纳粹大学生联盟”组织的发展成为了纳粹党势力突破的工具，它已成为吸引“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最强有力的磁场。

### 一、“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纳粹大学生联盟”开始并不是纳粹党创立的，它的创立者是威廉·坦普尔(Wilhelm Tempel)，追随者则是右倾大学生，在早期的发展中，它是将维护社团自身利益作为首要出发点的。到了后期，它才逐步与纳粹党走向联合，成为纳粹党的工具。

<sup>①</sup> 这些大学包括柏林大学、布雷斯劳大学、爱尔兰根大学、吉森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哈勒大学、海德堡大学、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慕尼黑大学、罗斯托克大学、维尔茨堡大学、柏林技术高校、布伦瑞克技术高校、科尔斯鲁尔技术高校、慕尼黑技术高校。

<sup>②</sup> Hans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214-215.

<sup>③</sup> Hans Gerth, *The Nazi Party: 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Jan. 1940, p. 529.

“纳粹大学生联盟”的首任领导人坦普尔具有强烈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这与纳粹党不谋而合。其实，早在1925年，希特勒就认为，纳粹党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中的失败，证明了追随资产阶级路线的夭折，因此必须向新力量求助。早在1922—1923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就在许多高校中崭露头角。从1927年夏季学期至1928年夏季学期，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纳粹大学生联盟”中的数量很多，甚至超过了高等中产阶级。坦普尔的初衷是要使那些穷苦出身但聪明好学的人有发挥才能的机会，例如，一篇文章就曾表述了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现实：“米勒的父母很富有，但他先天并不聪明……他好不容易地勉强通过高考(Abitur)，现在是一名大学生。但他不过是个庸才、草包脑袋、受过高等教育的笨蛋！但他却是个知识分子……舒尔茨是一个聪明的男孩，他的父亲是工厂的工人。一般学校的知识对他而言易如反掌，考上了大学。但他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兄。因此家里没钱供他读书。他不得不去当一名钳工……”<sup>①</sup>

虽然坦普尔在手工业工人中大受欢迎，到1926年2月，“纳粹大学生联盟”已成为一个跨地域性的组织。1926年底，这个组织在20所高校团体中总共吸纳了39名成员。1927年，它在地方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基尔和法兰克福，“纳粹大学生联盟”的成员第一次当选为“大学生代表委员会”的主席。

坦普尔虽是纳粹党的道德家，相信纳粹党真的可以帮助其社团成员。但另一方面，他绝对不是纳粹党的狗腿子，不希望大学生成为它强权政治的工具。因此，1926—1928年，坦普尔管理“纳粹大学生联盟”期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希特勒的支持。

最重要的突破发生在1928年7月，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生巴尔杜·冯·席拉赫成为“纳粹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带领这个团体走上了繁荣期。与坦普尔不同，席拉赫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家，他从来不是一个只怀有理想主义、感情丰富的空想家，而是一个对政治有敏锐的直觉的人。

<sup>①</sup> *Die Junge Revolutionär*, Aug. 1927.

在坦普尔的统治时，“纳粹大学生联盟”与纳粹党的领导之间存在间隙，而席拉赫却正相反：首先要遵循纳粹党的领导，填平大学生与纳粹党之间的鸿沟。同时与那些不认同纳粹党的团体决裂，只与承认纳粹党的团体结盟。

席拉赫否定了坦普尔的“社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底层出身的大学生，而只吸收来自高层和中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他不再批判传统的大学生社团，而是将其看成“挑选大学生”的重要来源。这个政策转变对于“纳粹大学生联盟”未来的崛起是不可忽视的。战斗性大学生联盟的成员成为其核心群体。如果没有他们，在大学里就无法实现霸权。

在席拉赫的改革下，“纳粹大学生联盟”不久就取得了成效。1928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中的票数已经占到了12%，此时，纳粹党在国家选举中的票数还不到3%。1929年，“纳粹大学生联盟”的选票份额已经占到了19.5%。<sup>①</sup>在爱尔兰根大学，1929年，它首次赢得了绝对多数选票。1930年，希特勒说：“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更相信，纳粹主义会在高校中取得胜利。”<sup>②</sup>

为什么纳粹主义对大学生有如此的吸引力呢？首要原因就是德国的经济。人们不能用爱国主义的空话来填饱肚子，“是把年轻的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和金融寡头的剥夺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sup>③</sup>。1930年7月13日，柏林的法律系大学生约阿希姆·约斯特腾(Joachim Joesten)发表文章说：“以前的生存斗争”使大部分大学生在沮丧和压抑中放弃了现实，使他们丧失了“反抗力量”，“……知识行业的饱和，各个领域都开始实行人数限制，绝望的挣扎，来自父亲、社团、教育的保护之手都无能为力。许多大学生日复一日地处于巨大的压力下，也许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的，最后只是敲着

<sup>①</sup>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8-1933*; Jürgen W. Falter, *Hitlers Wähler*, C. H. Beck, München, 1991, S. 25.

<sup>②</sup> *Die Bewegung*, Nr. 16, 19. 8. 1930, S. 4

<sup>③</sup> *Vossische Zeitung*, 13. 7. 1931.

那扇永远也打不开的门。成千上万年轻的知识分子，无论出身如何，不管博学多才或者夙夜匪懈，都要面对棘手的未来，对自己和整个环境都没有任何信任。在这种情绪下，纳粹主义运动在高校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sup>①</sup>。

经济原因正是德意志高校的纳粹大学生组建行动组织的首要动机。“纳粹大学生联盟”反对高校的象牙塔环境，并且质问：“学业是否真正能保证右翼大学生的钱袋？”<sup>②</sup>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学发表演讲，号召重建民族经济，因为国家必须“养活 2 000 万人口，给他们工作和面包”<sup>③</sup>。

实际上，最初加入“纳粹大学生联盟”的贫困大学生是整个德国贫苦大学生的代表。“纳粹大学生联盟”招募成员先是从慕尼黑，后来莱比锡，无一例外都是工读大学生。1928 年夏季学期，24%的耶拿高校纳粹大学生是工读大学生。<sup>④</sup>“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国家领导人威廉·坦普尔自己也遭受着经济困境，当他获得的一项奖学金用完时，他不得不常常放弃午餐。他的团友中，只有他的副手汉斯·格劳宁(Hans Glauning)每月有超过 100 马克的生活费。<sup>⑤</sup>如果一名柏林的团员参加大学生大会的话，他必须从口中一分一毫地省下车票钱。

早在 1928 年 11 月 21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大学生发表的演讲已经表明，应将侵略战争作为扩展“生存空间”的手段，得到大学生雷鸣般的掌声。1928 年底，“纳粹大学生联盟”声明，它长年以来用各种办法来改善大学生的经济状况，这并不是吹牛。例如，1928—1929 年冬季学期，耶拿的“纳粹大学生联盟”制定了工作计划——《经济政策》(Wirtschaftspolitik)和《社会政策》

① *Vossische Zeitung*, 13. 7. 1931.

② *Völkischer Beobachter*, 30. 6. 1926.

③ *Der Weg zu Freiheit und Brot*, In: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3. 11. 1927.

④ *Akademischer Rundschau* II, 25. 7. 1928.

⑤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12.

(*Sozialpolitik*)——致力于改善大学生的生存问题。1929年5月,一位图宾根的纳粹大学生抱怨,虽然他已经很勤奋了,但还是仅能得到少量的生活费。因此,暑假开始,“纳粹大学生联盟”便在一份通告中刊登社团内部的假期工作及右翼青年运动所需要的志愿的农活。学费问题也是大学生头疼的事。1929年1月,库尔特·克鲁格(Kurt Krüger)在4日的《人们观察家》上写道:“高校学费应根据父母的收入来制定,而且主要应由学校和国家来承担费用。”<sup>①</sup>

因此,丝毫不奇怪,在传统大学生衰落的过程中,纳粹大学生团体却突飞猛进地成长起来。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社会的不稳定性与“纳粹大学生联盟”的迅速发展密切相连。长期以来,大学生自身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最终同纳粹结为同盟。

大学生的经济愿望与纳粹的承诺相得益彰。1932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些大学生向纳粹党发出乞讨信,说明学业及社会上的困苦状况,他们都希望得到金钱救济,希望能加入纳粹党。他们都将纳粹党领袖视为最后的救星。其中一封来自鲍岑的教育系大学生的信很有代表性:<sup>②</sup>

至尊的领袖!

你(使用了du,代表了对领袖的感情认可,视为亲人)能借给一个一筹莫展的大学生每年200马克吗?我正在参加毕业考试,但却支付不起考试费用。我的父亲是一名小公务员,他已经没钱给我了,因为他的工资在总统的紧急法案下已经缩水到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了。我有三名兄弟姐妹,一名是钳工,一名是高级中学毕业生,一名是工厂的女工,他们都已经失业

<sup>①</sup> Kurt Krüg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ochschulpolitik*, In: *Akademische Blätter*, Feb. 1929, S. 28.

<sup>②</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16.

了；我父亲唯一的指望就剩我一个人了，因为作为一名大学生我的就业前景在萨克森是不错的。

真心期望我的请求能够实现。永远忠诚于你。

你的战友埃克哈特·舍费尔(Eckart Schäfer)

1932年4月27日

1932年5月，已经有众多大学生请求加入纳粹党。其实在1930年，国家内政部就注意到了就业市场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并提出要警惕未来年轻的知识分子轻而易举倒向纳粹主义。大学生每年都在盼望的事情终于在1932年秋发生了，希特勒在德意志高校中战果辉煌。

纳粹运动犹如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大学生。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蛊惑难以准确统计；正式的“纳粹大学生联盟”成员实则不多。1931年，出版商威廉·蒂特根斯(Wilhelm Tietgens)估计纳粹党已经“在思想上吸引了50%的大学生”<sup>①</sup>。但1931年12月，一名巴伐利亚内政部发言人却说，“纳粹大学生联盟”的人数不足10000人。<sup>②</sup>1932年，梅尼克认为，纳粹主义已经“赢得了数量庞大的年轻知识分子”<sup>③</sup>。据“纳粹大学生联盟”自己估计，当时大概有70%的大学生承认纳粹主义。<sup>④</sup>

这些大学生中不乏日后在第三帝国呼风唤雨之人。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弗兰茨·阿尔弗雷德·希克斯(Franz Alfred Six)，1930年加入“纳粹大学生联盟”，日后成为教

<sup>①</sup> Wilhelm Tietgens, *Die Arbeit der Sozialistischen Studentenschaft*, In: *Die Dat* 8, 1931, S. 638.

<sup>②</sup>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München*, Soderabgabe, 1931.

<sup>③</sup> Friedrich Meinecke, *Ein Osterwort an die deutsche Jugend*, In: Georg Kotowski (Hg.),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2. Aufl., Toeche-Mittler, Darmstadt, 1966, S. 466.

<sup>④</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17.

授暨 SS 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他这样说道：“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四年来我每月仅靠 20 马克维持生活，我常常自问，这个社会是否还正常。这个问题我自己就能回答，因此我加入了纳粹党。”<sup>①</sup>他的话再次证明，纳粹党的社会经济支持成为大学生最初的动机，绝大部分高校学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希特勒政治夺权，等着由他来实现他们长久以来的愿望。

这些例子还表明，纳粹不仅给人们承诺，而且与其他政党或高校团体相比更能采取坚决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能够最大限度调动未来知识分子的热情——“让年轻的纳粹医生有事做，让年轻的律师熟悉法律”<sup>②</sup>。早在 1930 年 4 月，《民族社会主义通讯》(*Nationalsozialistische Briefe*)就指出：“未来的法官、律师、牧师、教师以及公务员的政治认同对国家的未来建设有多么重要。”<sup>③</sup>大学生的工作困境成为 1931 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在高校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1932 年 4 月 1 日，“纳粹大学生联盟”还为一小部分急需帮助的大学生设立了基金会。基金会的资金由罗斯托克医学教授汉斯·莱特(Hans Reiter)提供。他首先设立了 10 项奖学金，每项每年提供 1 000 马克。这个举措在大学生中间反响热烈，让人感到，纳粹主义是真心关心大学生困苦的，其他任何一个党派都比不上。

还有高校学杂费的问题。1931 年 2 月，汉堡大学生、当地的“纳粹大学生联盟”成员上书给组织，认为高校应关注大学生的实际能力，取消学杂费。因此，“大学生代表委员会”的纳粹代表在维尔茨堡大会上提出，在现在所有收入都因为困境减少的形势下，坚决反对提高学杂费。从 1931 年格拉茨大学生大会开始，“德意志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17.

<sup>②</sup> Konrad Heiden,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rriere einer Idee*, Rowolt, Berlin, 1932, S. 246.

<sup>③</sup> Hansfritz Sohns,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affenstudententum*,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riefe*, 15. 4. 1930, S. 337.

大学生同盟会”在纳粹分子的领导下，开始有计划地实施减免学杂费，他们还将此作为纳粹普鲁士议会党团的任务。1932年4月，“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向所有德意志大学生发表呼吁，不要再交一分钱的学杂费、听课费、研讨班费及其他费用。<sup>①</sup>他们还命令纳粹普鲁士议员跟进减免学杂费事宜。1932年12月，一项分等级的有关学杂费的申请书递交上去，从20至250马克不等，1933年1月17日，希特勒夺权前两周，这项申请书被批准。

随着“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的削弱，纳粹分子的势力开始加强。这主要是一种宣传需要和彰显政治立场的需要。所有纳粹大学生团体已经熟悉如何利用大学生的经济风险，因此纳粹大学生团体不断强大，也逐渐开始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影响。1931年4月，“纳粹大学生联盟”成立了“大学生会与经济部”(Referat Studentenwerk und Wirtschaft)。到1932年，在图宾根“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中，纳粹大学生几乎占了一半。到纳粹夺权前，它几乎赢得了所有高校大学生。

1933年时，“纳粹大学生联盟”已经发展成一支颇具影响力的团体。事实上，纳粹党在德国社会的其他任何领域都没有像大学生这样取得如此迅速的成功。在高校中的“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中，已经占了60%~80%的席位，成为最强大的势力，以至于这一代大学生能被称之为“倒向纳粹的一代”。尽管在1933年前，纳粹党(NSDAP)中的大学生只占到3%~4%，<sup>②</sup>而且“纳粹大学生联盟”的成员显然也并不是构成纳粹党的主要力量，但“纳粹大学生联盟”却成为了这一代德国大学生最积极靠拢的组织。

## 二、“纳粹大学生联盟”的结构分析

具体而言，“倒向纳粹的一代”自身在结构上有无特别之处？

<sup>①</sup> *Die Schwarzburg*, Apr. 1932, S. 146.

<sup>②</sup> Michael H. Kater,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7, 44, 67, 242-250.



纳粹大学生与一般的社团大学生有什么区别?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男大学生与女大学生之间区别很大吗?为什么“纳粹大学生联盟”在有些高校比在另一些高校更成功?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一些统计数字进行剖析。

遗憾的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没有官方统计,因此“纳粹大学生联盟”的成员数量在学术作品中常常被夸大了。例如,彼得·盖伊(Peter Gay)几乎高估了一半纳粹大学生的数量。<sup>①</sup>根据安塞姆·福斯特(Anselm Faust)的估计,1931年夏季,正值“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StA)选举中纳粹大学生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才不过2500人。<sup>②</sup>直到魏玛共和国最后几个月,才出现精确的统计:截止到1933年1月初,共有8750人。<sup>③</sup>迈克尔·卡特(Michael Kater)根据这个数据计算出,综合大学和技术高校中的“纳粹大学生联盟”人数占男大学生数量的9.2%。<sup>④</sup>但他忽略了这8750名纳粹大学生包括2500名专科学校(Fachschul)学生和750名女生。因此,“纳粹大学生联盟”的高校团体大概只有5500名男大学生。<sup>⑤</sup>而且,“纳粹大学生联盟”不仅局限在德国境内。还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但是,统计数据中没有统计外国的专科学生和女大学生人数。假设他们的比例与“纳粹大学生联盟”一样(37.1%),那么在5500名纳粹高校男性成员中,应有673人是外国的。因此,1933年初,在全部的8750名成员中,有4827名来自德国高校的男性大学生。

<sup>①</sup> Peter Gay, *Die Republik der Außenseiter*, Neuausgabe,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 M., 1987, S. 184.

<sup>②</sup> Anselm Fau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ädagogischer Verlag Schwann, Düsseldorf, 1973, S. 170.

<sup>③</sup> 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1995, S. 51.

<sup>④</sup> Michael Kater, *Krisis des Frauenstudium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59, 1972, S. 255.

<sup>⑤</sup> 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500.

从1932—1933年冬季学期德国高校的注册情况看，在全部100 740名德国男大学生中，纳粹大学生的比例不超过4.8%。没有进行统计的还有，多数大学生参加了其他纳粹组织——如冲锋队(SA)，但同时又是“纳粹大学生联盟”的成员。

附录表23列举了“纳粹大学生联盟”的成员结构。统计了1932—1933年冬季学期纳粹高校团体成员的精确人数，包括十三所综合大学(总共二十三所)和四所技术高校(总共十所)。这个表来自内部数据，是纳粹高校团体用于统计人数之用，因此可以排除舆论宣传的伪造数据因素。但是，需要注意，这是对“纳粹大学生联盟”的统计数据，也许有成员退出。例如，1932年10月，汉堡“纳粹大学生联盟”，并不是像统计数据那样有120名成员，实际上只有55名。再例如，柯尼斯堡高校团体，“纸面上”的人数有233人，但事实上只有119人。<sup>①</sup>总体而言，纳粹大学生占到整个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男大学生的4.4%。此外，综合大学和技术高校也有所不同。在综合大学中，只有3.2%的大学生是纳粹大学生，而在技术高校中，显然“纳粹大学生联盟”更加成功，1932—1933年，大概占到学生总人数的10%。在综合大学里有3.5%左右的男生和2.1%的女生加入纳粹大学生行列。在技术高校中参加“纳粹大学生联盟”的男生占13.3%，甚至比传统大学生社团成员的比例(11.0%)还高，但这种情况很少受到人们注意，参加纳粹的女大学生有4.5%。<sup>②</sup>

高校中的纳粹大学生在两个方面与传统大学生社团的大学生不同：首先是男生占有绝对数量。再次是新教大学生的数量多。而在学科方向和年龄结构上差别不大。这种状况也表现在纳粹大学生的

<sup>①</sup> Geoffrey J. Giles,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1985, S. 94.

<sup>②</sup> 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500.

选举上：1928 至 1933 年间所有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中“纳粹大学生联盟”得到的票数和纳粹党的选举情况如下(见表 4-1):<sup>①</sup>

表 4-1 “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中纳粹代表得票率与纳粹党国家选举得票率

年份	“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		国家选举	
	NSDStB 得票比	参选比例	NSDAP 得票比	参选比例
1928	11.9	66.7	2.6	75.6
1929	19.5	63.5	—	—
1930	34.4	68.1	18.3	82.0
1931	44.4	77.4	—	—
1932	47.9	66.9	37.4	84.1
1933	43.2	72.9	42.9	88.8

如上表所示，30 年代初，纳粹在大学生中引起的反响远远大于在整个国民中的反响。“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其发展最高峰时，在综合大学和技术高校中获得了 47.9% 的选票。距离绝对多数只差分毫。从 1928 年至 1932 年，“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得票数连年超过纳粹党在国家选举中的票数。在“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中，从 1933 年 1 月或 2 月开始——此后大学生不再允许选举——结果出现变化。1933 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平均只得到了 43.2% 的选票，不仅比前一年少，而且比纳粹党 1933 年国家选举的得票数还少。因为 1933 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后，高校不再是纳粹的主要堡垒。

<sup>①</sup>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8-1933*; Jürgen W. Falter, *Hitlers Wähler*, C. H. Beck, München, 1991, S. 25. 参加“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的人数以选举期内正式注册的大学生为基础，不包括旁听生、停学生和外国学生。

但是，上表中的数据也存在问题。首先，纳粹大学生在选举中会与其他高校政治团体结盟。因此，他们的得票数比实际上要高。1931年，一名共和主义大学生写道：“法西斯危险的触角伸进了高校。被选举上台的纳粹分子对高校和平和高校自由都是一种威胁。但其他被选举出的社团大学生或者自由大学生也应当被算作纳粹分子，因为他们是站在纳粹那边的。”<sup>①</sup>在传统大学生社团中，也有同样的认识。1931年，一篇文章指出：“事实上，今天许多大学生都皈依了纳粹主义，比‘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的数字要多”。<sup>②</sup>其次，在某些城市并没有规律性的“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例如，1927年，贝克尔之争后，在所有的普鲁士高校不允许成立大学生自治组织。在慕尼黑，1927年后不再举行“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对于某些高校而言，“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上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党派政治成员不能参加竞选，如在德累斯顿的某些高校中，校长不再批准“自由”大学生代表。“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不得不转移到书店或者小客栈的投票站。因此参选人数大大减少。在法兰克福和科隆，从1928年起，仅举行了一次“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参加人数非常少。

再来看一下“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各个高校中的选举情况，如附录表20和附录表23所示，在那些天主教大学生占较大份额的综合大学中，纳粹大学生较少，例如，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和亚琛技术高校。在布雷斯劳、科隆和弗莱堡则得票率较多。但这只是乍一看如此，因为其中还存在一些人为的因素。例如，1932年，科隆大学和弗莱堡大学选举遭到共和主义和天主教大学生抵制，因此结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布雷斯劳的情况也类似，天主教大学生不参加选举，所以1931年纳粹大学生赢得了四分之三多数的席位。但1932年7月，天主教大学生参选，

<sup>①</sup> Kurt Hirche, *Der Faschismus der Studentenschaft*, In: *Die Hilfe*, 37. Jg., 1931, S. 106.

<sup>②</sup> W. W. Reich,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affenstudententum*, In: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45. Jg., 1930-1931, S. 189.

参选的大学生创新高，可是纳粹大学生却遭到惨败，从 77.8% 降至 45.7%。<sup>①</sup>通过比较“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可知，天主教大学生在纳粹的挑衅下保持了异常的平稳。在三所天主教大学生占三分之一还多的综合大学——如弗莱堡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天主教阵线在“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中长时间胜出。在弗莱堡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天主教“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阵线一直都得到了超过 70% 天主教大学生的支持。在慕尼黑大学，天主教阵营虽然遭到了纳粹的攻击。但 1928 年，天主教统一阵线赢得了 30 个席位中的 7 个。4 年之后，1932 年 11 月，两大天主教阵线赢得了 30 个席位中的 8 个。<sup>②</sup>结果不言而喻：1933 年前，“纳粹大学生联盟”并未成功突破天主教核心团体。天主教与纳粹主义的亲和力远远小于新教。

“纳粹大学生联盟”有没有对某个专业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呢？德国高校所有的专业都或多或少受到经济困难的影响，这也反映在 1926—1933 年“纳粹大学生联盟”成员的数量上。事实上，纳粹主义并不局限于某个专业领域，而是放眼全部。正如安塞姆·福斯特所得出的结论那样：纳粹大学生就“本质上而言，与非纳粹大学生并无二异”，对于专业而言也是如此，年龄结构也一样。<sup>③</sup>专业分布可参见文后附录，统计清楚表明，纳粹并没有对某个专业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只是在各个高校中的情况有所差异。如果我们选择几个代表性的专业：医学、法学、哲学-历史、神学，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医学专业，维尔茨堡大学和明斯特大学的医学系大学生对纳粹不感兴趣，但爱尔兰根大学、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和马尔堡大

<sup>①</sup> 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500.

<sup>②</sup> *Bayerische Hochschulzeitung*, Nr. 5, 29. 11. 1928, S. 1; Nr. 5, 8. 12. 1932, S. 4.

<sup>③</sup> Anselm Fau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ädagogischer Verlag Schwann Düsseldorf, 1973, Bd. I, S. 117f.

学、吉森大学则相反。1929年夏季学期，海德堡大学中纳粹医学学生的数量是高校平均值的两倍。法学大学生的状况也相似。维尔茨堡大学中，纳粹法学大学生的数量特别多，而在爱尔兰根大学则是最少的，明斯特大学纳粹分子地位显著，在不同时间柯尼斯堡、耶拿、科隆、海德堡、汉堡、马尔堡、吉森和罗斯托克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人文学科的纳粹大学生在明斯特大学和爱尔兰根大学受欢迎程度不断变化，但在其他高校却不是这样。三种专业的起伏表明，这与大学生职业上的“无产者化”相关。

大学中的女大学生没有通过“纳粹大学生联盟”表现出来。如果要详细考察她们的状况，则要了解“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的性别划分。但现在只能找到四所大学的六次“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结果，如附录表 22 所示。在这六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女大学生人数远远少于男大学生。因为“纳粹大学生联盟”中，男女成员之间有较大鸿沟，但如果综合考察总体比例的话，参选的女大学生占 30.6%，与参选的占 35.6% 的男大学生没有本质差别。

“纳粹大学生联盟”的成员结构表明，技术高校的大学生比综合高校更多地参与“纳粹大学生联盟”。例如，一名慕尼黑大学的纳粹分子回忆技术高校的情况时说：“它对我们综合大学的人而言不过是某种程度的保护伞。”<sup>①</sup>如附录表 21 所示，1928—1932 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在慕尼黑技术高校中的得票比例确实远远超过了慕尼黑大学的数量。

但这个结论不能证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各地的情况不同。除了纳粹的堡垒（如柏林技术高校、卡尔斯鲁尔技术高校）之外，有些技术高校中，“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势力比较弱，因为他们无法超过传统大学生联盟的霸权，如斯图加特、汉诺威。这说明综合大学和技术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如附录表 15 和附录表 20 所示，技术高校与综合大学学生有两点重要的区别：①技术高校中新教人数远远超过综合大学。但综合大学中天主教和犹太人的数量超过技术高校，如附录表 20 所示。②技术高校中的女生比例

<sup>①</sup> *Die Bewegung*, Nr. 4, 22. 1. 1936, S. 4.

远远少于综合大学，如附录表 15 所示。换言之，那些不参加或较少受到纳粹主义鼓动的大学生团体，在技术高校中的比例少于综合大学。

总之，“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影响首先是建立在“大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上的。尽管这个联盟在女大学生和天主教大学生中没有什么影响，但这个极右联盟已经吸引了绝大多数的男性大学生和新教大学生，并体现出对技术高校的大学生有特别的吸引力。正是由于它在德意志高校中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因而它能够控制整个德国高校大学生政治运动的走向。

### 三、“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国防体育运动”

早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在痛斥和平主义、共和主义氛围中，“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树立起“德意志荣誉观、防御观和自由观”。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希望为贯彻这些观念而发挥最大的行动力，这就是大学生“国防体育运动”(Wehrsports)的初衷。然而，根据《凡尔赛和约》第 177 款，禁止高校进行军事训练。因此，为反对这一条款，德意志大学生们于 20 年代初便开始秘密地开展军事训练，即“国防体育运动”，并得到高校行政机构和大学生社团的支持。

大学生社团与“兰格马克大学生钢盔团”(Stahlhelm-Studentenring Langemarck)展开了密切合作。首先是以大学生体育活动的方式进行的。例如，1924—1925 年，爱尔兰根大学的某大学生团体(Schwarzburg Verband Uttenruthia)允许其成员加入非法的武装团体“Oberland”，接受所谓的“PK-Bummel”拉练训练：夏季三次，冬季四次，长老自愿，但其他成员必须参加。此外，在假期，社团成员至少要参加一次国防教育培训课程。大学男生联合会还开展了特殊的“飞行员教育”。<sup>①</sup>1927 年 5 月，柏林成立了“钢盔团”

<sup>①</sup> Otto Schwab, *Das Akademisch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samt (AWA)*, In: Max Droßbach & Hans Hauske (Hg.), *Handbuch für den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ler*, 6. Aufl., Berlin, 1932, S. 248.

的第一个高校组织，进行非法武装训练，很快成长为最强大的大学生武装团体。此外，“德意志高校圈”也从1929年起组织军训，60名来自波恩和马尔堡的大学生在一名老军官的领导下，组织拉练和进行小口径步枪射击训练。

这些活动是“前线战士思想”的复活，因此受到了强烈的政治批评和禁止。所以，“纳粹大学生联盟”希望用巧妙的手段打破对国防活动的禁止。1929年3月4日，在慕尼黑大学“大学生代表委员会”大会上，慕尼黑的地方“纳粹大学生联盟”提出议案，请求“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的执行委员会“批准这个请求，德国高校应公开对国家防御问题表态”<sup>①</sup>。1929年7月，在汉诺威召开的第12届大学生大会上，在慕尼黑技术高校纳粹大学生的提议下，大会作出如下决定：①德国境内和境外的全体德意志高校，为重树德意志民族荣誉、保证足够安全，促进完全不设防体制的转变，因为其他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绝不可能裁军。②高校应尽全力促成这个计划的实施。②这个提案得到绝大多数的赞成。事实上，这正是“纳粹大学生联盟”拉拢大学生向纳粹主义靠拢的一个重要步骤。

1931年1月，埃尔福特武装大学生大会上，“纳粹大学生联盟”宣称：“国防训练要在全体大学生团体中展开。”<sup>③</sup>2月1日，在弗莱堡，一百名大学生开展集体防御训练。钢盔团及武装大学生团体仍拥有最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大学生国防体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31年6月，“德意志高校圈”衰落后，“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DB）以“学术劳动局”（Allgemeines Wissenschaftliches Arbeitsamt，简称AWA）的名义成立国防机构，这标志着大学生国防运动目标的真正实现。在校长的允许下和国防军的支持下，“学

<sup>①</sup> Baldur von Schirach, *Hochschultag, Studentenschaft und Wehrgedanke*, In: *Akademischer Beobachter*, Apr. 1929, S. 71.

<sup>②</sup> Baldur von Schirach, *Wille und We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bundes*, Münchener Buchgewerbehaus, München, 1929, S. 16.

<sup>③</sup> Otto Schwab, *Das Akademisch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samt (AWA)*, In: Max Droßbach & Hans Hauske (Hg.), *Handbuch für den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ler*, 6. Aufl., Berlin, 1932, S. 248.



术劳动局”开展了地方性的各种防御体育训练，例如，野外训练、行军、小口径步枪射击、毒气防御、远程通信和急救。1932年，有81个这样的基地，3481名大学生参加了训练。

1932年，“纳粹大学生联盟”计划在内部成立所谓的大学生军团。1932年冬，“大学生冲锋队”(Studentenstürme)成立。“纳粹大学生联盟”成员都有义务参加，除非“生病、活动或考试”才能请假。汉诺威技术高校的大学生冲锋队，除了周三的政治学习和命令通知外，星期天还要参加“野外拉练”。

为了吸引非“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大学生，还成立了所谓的“国防局”(Wehrsportämter)。1932年，维尔茨堡大学生国防局在“纳粹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下成立，第一项训练就是小口径步枪射击，许多感兴趣的大学生参加，1932年夏季学期达250人，1932—1933年冬季学期已经多达400人。1932—1933年冬季学期的训练计划如下<sup>①</sup>：①每周两小时的小口径步枪射击；②每月一次场地训练；③每周末向自由大学生宣传国防军事训练，吸引他们参加。

“纳粹大学生联盟”对国防体育训练非常重视。1932年12月15日，它提交给维尔茨堡大学“大学生代表委员会”(AStA)董事会一项议案：“以后有必要将国防体育提升为国家考试，作为参加过3个学期、2个学期或1个学期的大学国防体育训练的证明”；“国防运动要作为一项义务来完成”<sup>②</sup>。其他地方也类似，例如1933年1月底，布伦瑞克技术高校的“国防共同体”(Wehrgemeinschaft)成立。它的领导是国防军的上校，训练项目包括军训、做沙盘、场地训练、射击和拉练。

大学男生联合会同“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t)的执行委员会计划设置大学生兵役制。“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DSt)主席弗里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66.

<sup>②</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66.

茨·希尔根施托克(Fritz Hilgenstock)提出的“兵役年”计划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义务劳动军(Arbeitsdienst)思想的起源。它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志愿”(freiwillig)性质的“青年义务劳动军”(freiwilliger Arbeitsdienst,简称FAD),一是“义务”(pflicht)性质的“青年义务劳动军”。

最初,青年劳动军是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之上,大学生出于社会经济困难、其他经济原因、教育等因素而参加。经济大危机爆发后,青年劳动军的宣传也加强了,主要内容是由国家建立一个包括全德大学生的青年劳动军。1931年7月23日,布吕宁发布紧急法令后,由于志愿性的青年劳动军有利于缓解失业问题和缓和社会危机,因此一个临时性的就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大学生会作为“青年义务劳动军”计划的执行者,开展自我救助、集体互助及接受国家扶助。1932年7月,德累斯顿的“德意志大学生会”成为大学生FAD的负责机构。1931—1932年,巴登、士瓦本的FAD成立;斯图加特和霍亨海姆大学也成立了FAD。1931年,30名莱比锡大学生参加了农活、暑期劳动。1932年4月,基尔的“青年义务劳动军”成立。

虽然“纳粹大学生联盟”在这项事务上起到了带头作用,但这并不是它的初衷,按照纳粹的观点,青年劳动军应当是义务性的,是为了在大学生中促进对极权主义领袖制的认同。因此,劳动军的义务性成为选择强有力的“领袖—集权”体制,抛弃无领袖的“体系国家”(System)的手段。军团大学生主席奥斯卡·舒马赫(Oskar Schumacher)在文章《青年的劳动义务》(*Die Arbeitsdienstpflicht der Jugend*)中写道:“我们现在是没纪律的人民。虽然我们有几百位野心勃勃的‘领袖’,但却没有一个是敢于牺牲的领袖。寄希望于他们就会万念俱灰……这种自由发展的危险教育方式通过‘兵役年’(Arbeitsdienstjahr)而变得有意义。我们需要刚强的、敢于流血牺牲的年轻人。”<sup>①</sup>

<sup>①</sup> Oskar Schumacher, *Die Arbeitsdienstpflicht der Jugend*, In: *Deutsche Corpszeitung*, Mai 1924, S. 34.

“青年义务劳动军”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手段就是国防体育，要完成这个使命，就需要“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各“大学生代表委员会”和“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中占有首席地位，因为1929年完全独立出来的德累斯顿大学生会势力还不够强大（“纳粹大学生联盟”的执行机构）。1931年10月以后，这件事才逐渐有了眉目。受纳粹影响深刻的维尔茨堡大学生于1931年11月向“纳粹大学生联盟”暗示，成立一个“志愿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和加强国防力量（Wehrverstärkung）的机构”，作为边境管理局的下属机构。一个月之后，全体巴伐利亚大学生决定，成立一个“志愿义务劳动军”（Freiwillige Arbeitsdienstpflcht）机构。该机构设在纳粹势力最强大的爱尔兰根大学，不同意的大学生每学期需要交10马克的罚金。<sup>①</sup>

从1931年8月开始，“纳粹大学生联盟”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团体中取得优势。1932年初，覆盖面最广的德国大学生团体——“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的委员会被来自巴登的FAD领导人所掌控。

之前的“兵役年”计划——即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之后、上大学之前的服军役——在1932年得到德国大学生会的领导人赖因霍尔德·夏尔（Reinhold Schairer）的推动。“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成立了“义务劳动局”（Amt für Arbeitsdienst）。大学生对极权的追求成为自身的意愿。在一份备忘录中对兵役年的安排如下：“设立工作站（Werkjahrslager）。共分为四个阶段。第1至4个月：每天6小时的站内劳动（Lagerarbeit）；中午学习（Schulungsdienst），汇报工作机会、政治经济形势。第5至9个月：除了站内劳动外，还学习实用技能，手工技能，作为日后工作的基础。第10与11个月：除了站内劳动外，主要进行国防军事训练。第12个月：全国巡学，熟悉大农场及大工业，获得有关农业及经济机构的相关知识。”<sup>②</sup>

<sup>①</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71.

<sup>②</sup>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S. 172.

正是从每天的军事训练中，大学生们学会了服从权威。国防体育运动成为年轻大学生们欲罢不能的“鸦片”，这唤醒了他们的行动力。在希特勒夺权之后，“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军事运动终于发展并达到高潮。

## 本章小结

“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不断向纳粹靠拢首先是受经济原因的驱使，经济危机使这一代大学生的沮丧情绪达到了高潮。传统的家庭、大学生社团，以至国家此时却无法给予他们之前的精英地位，而且就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向他们提供。因此，当生存岌岌可危时，他们急需寻找一条能够“拓展生存空间”、“维护德意志本质”的道路，而纳粹主义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一精神毒品。这一代大学生转向极右主义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典型的、与普遍政治发展相联系的现象。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107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这说明：德意志中产阶级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越来越缺乏抵抗力。

这一代大学生极端主义的发展与“纳粹大学生联盟”的崛起息息相关。在长达12年的时间中，一直是学生组织的领航者，而现在，它越来越倒向了“大德意志民族—雅利安主义”，并把自己全权交托给“纳粹大学生联盟”。“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不再承认那个一直给予它经济支持的国家的合法性，它开始朝着大学生曾经反对的党派路线进发，由于它的直接领导，终于使绝大多数的德国大学生都参与到纳粹的游戏当中。“纳粹大学生联盟”不断从各种大学生社团中吸取力量，用它的似是而非的理念，用它完美无缺的承诺，用它没什么标准可言的社团规章，使大部分大学生既不用背叛原来的社团，又能为自身找到出路，因而很快壮大成为一支大学生狂热民族主义力量。如果问魏玛共和国留给大学生了什么精神遗产，那么就是社团内部的“民主”选举方式。正是在“大学生代表制度”的基础上，“纳粹大学生联盟”才有机会成为领导者。当它重新改组了大学生社团后，便不给反对者以任何发言权。

那些不想投靠纳粹党的大学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虽然否定纳粹对大学生的领导和斗争方式，但衰落的社团体制无法给他们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思想意识上肯定那种促进国家利益的原则，因而在他们看来，唯一能促成“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愿望实现的似乎只有纳粹主义了。尤其是那些激动人心的“国防体育训练”，更是使这些不想投靠纳粹党的大学生欲罢不能。这样，他们便在一次次的妥协、退让中等待着德国政治局势发生变化<sup>①</sup>。因此，这一代大学生了就成了“倒向纳粹的一代”。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夺权成功了。现在，他的其他诺言也将相继实现，而这一代大学生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准备投入到“民族革新”工作当中。正如《大学生期刊》(*Akademische Blätter*)所说：“我们盼望第三帝国的来临，我们希望它统领所有的德意志人。”<sup>②</sup>

---

① *Akademische Monatsblätter*, Okt. 1932, S. 25f.

② *Akademische Blätter*, Juni 1932, S. 77.

## 结 语

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中，德国大学生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下，他们注定要比德国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加走在时代的前列。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大学生们都很年轻，他们的兴奋度以及为新政治理想献身的精神比其他人要强烈得多。其次，大学生的精英意识塑造了他们自我认知中“先锋队”的角色认定。最后，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一直都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权。从大学开始，他们就脱离了父母的管教，但还没有进入职业生涯或者家庭生活，因而与一般的社会青年相比拥有更多学习、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由空间。这种特殊的形势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参与政治的可能性。

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复杂多变的内外局势下，德国的大学生明显地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代人，即“前线青年的一代”、“相对稳定的一代”和“倒向纳粹的一代”。

“前线青年的一代”大学生曾作为德帝国时代的精英，满怀着民族主义的狂热，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但 1918 年战败引起的革命中，魏玛共和国的初期局势却重击了他们过去的国家理想和价值理念。割地赔款带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恶化了他们的经济状况，而且削弱了他们原有的中产阶级的优势地位，唯一没有改变的只有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他们对“秩序”和“祖国”的忠贞。世界大战的惨绝人寰还历历在目，身心遭受的伤痛却无人理解，然而“血与火”的历练使他们的心智更加成熟，让他们明白了和平稳定的来之不易，因此，即便对议会民主制没有多少好感，他们也担心魏玛社会的秩序再度毁于左翼极端势力或者右翼极端势力的混战中，因此，他们选择了与共和国合作，甚至还通过实际行动参与到维护共

和秩序稳定的军事行动当中。

“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则生活在魏玛共和国经济势头最好的 20 年代中后期，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就业前景较之超通胀时期有了明显好转，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是，由于之前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以及挥之不去的“知识行业超员”问题，“相对稳定的一代”内心并不稳定，至少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前景远远不如帝国时代的大学生，这使他们逐渐陷入到对前途的恐慌之中。随着“前线青年的一代”在 20 年代中期离开高校，大学生中间失去了重要的平衡机制，魏玛共和国对大学生的右倾思想并无有效的防范措施，因此，在“相对稳定的一代”大学生中，“前线战士”神话复活了，他们在政治上已开始不断向右转。

“倒向纳粹的一代”大学生与魏玛民主共和政体的关系走向破裂，并最终投入纳粹主义阵营，其原因在于，这一代大学生首先受到世界经济大危机的驱使，他们迫切地需要“生存空间”。当历史证明共和主义不能救德国，“美国主义”也不能救德国后，只有纳粹主义才能建立真正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时，“纳粹大学生联盟”便应运而生了。它不仅在组织上成为这一代大学生们的“替代父母”，而且那些激动人心的“国防体育训练”更是像毒品一样引诱着具有浓厚军事传统的社团大学生。因此，“纳粹大学生联盟”成为这一代大学生的领航者，它诱导绝大多数的德国大学生都参加到纳粹主义运动的游戏当中。

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三代大学生各有特色，但他们彼此之间又是具有共同点的。他们大部分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相似的社会、家庭、生活背景也造就了他们作为“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共性，形成了魏玛时代特殊的“代际意识”。正如克劳斯·曼 (Klaus Mann) 在他的处女作《今天与明天》(Heute und Morgen) 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是一代人，一筹莫展将我们团结在一起。”<sup>①</sup>正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时代病”，才使他们从最初对魏玛共和国的将信将

---

<sup>①</sup> Klaus Mann, *Heute und morgen. Zur Situation des jungen geistigen Europas*, Enoch Verlag, Hamburg, 1927. S. 6-8.

疑，发展成冷眼相对，并最终走向了离心离德。

魏玛时代德国这三代大学生的第一个共同点是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其中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就是“知识行业超员”问题。“超员”与“无产者化”显然严重阻碍了大学生对魏玛共和国的接纳。

通货膨胀首先使中产阶级的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严重地动摇了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大学生们的社会根基；其后的经济发展上的低迷又引发了所有知识行业的“就业难”问题，使传统知识精英赖以生存的教育根基也土崩瓦解。1918年后的“知识大众化”趋势，使大学校门越来越向下层民众开放，但日益萎缩的知识分子就业市场却无法消化日益增多的高校毕业生。知识分子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迫使各高校纷纷提高入学门槛，以减少潜在的竞争源以缓解“超员”现象。然而当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袭来时，严重的秩序混乱再次证明了高等教育阶层曾经期望的地位朝不保夕，这就造成了当时的大学生对贫困化的前景的高度敏感。在这种局势下，知识行业遥遥无期的等待和日益缩水的收入对大学生产生了苛刻的压力，他们将这种无奈引起的愤慨发泄在一个“跛脚”的民主制共和国身上。

魏玛时代这三代大学生的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共同面临了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高等教育危机”。“教育”是19世纪德意志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根据洪堡的教育哲学，教育应该是“人文的、广博的、唯美的和自治的”，但魏玛时代的这场“高等教育危机”却导致了洪堡的教育理念遭到全面的质疑。

在德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中，中产阶级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一方面能保持中产阶级自身传统精英地位不受动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后代能够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攀爬。但在魏玛共和国解体的过程中，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人，大学生的遭遇却印证了德国高等教育在社会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在过去，大学里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子弟一直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财富和社会传统在控制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然而，魏玛共和制却为所有阶层的子弟打开了大学校园和专业学院之门，这等同于剥夺了过去那个占统治地位群体的特权，造成了他们的恐惧，并使他们深切地感受



到，魏玛共和国并不是他们的共和国。经济上承受的压力越大，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当工厂主、教师、律师及白领雇员也在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特权的丧失而忧虑的时候，作为他们后备军的大学生自然也就变得对议会民主制毫无感情了。

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这种高等教育产出精英的过程，与受教育者的家庭经济紧密相关，更不要说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 16 至 20 年的连续学习所带来的物质及精神成本了。从本质上讲，接受教育就是一种资本的形式。其中包含了储蓄、投资和最终收益。只有当教育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能够换来优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回报时，教育才是值得的投资。高等教育严格的筛选过程正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的，因此，对受教育者这种前途的任何威胁正如对私有财产神圣性的侵犯一样，是必然会引起大学生以及他们家庭的愤慨的。像任何投资者一样，接受教育的大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期望他们在学习上的资本投入能够带来合理的回报，当倾囊投入却零回报时，他们就会诉诸极端手段。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德国的高校除了履行一般的知识传承、科学研究义务之外，还与军事紧密相连。那种战斗性大学生社团的击剑传统，已经成为了德国高校根深蒂固的本性。军事训练无可替代地融入了高校生活，变成了德国教育体制的副产品，它从中折射出的军国主义传统是与拥有高级知识的德国年轻人捆绑在一起的。《凡尔赛和约》的军事约束并没有压制住他们的这种军事热情，反而从他们的内心激发起“保卫祖国”的意愿。魏玛共和国末期，“纳粹大学生联盟”开展的“国防体育运动”以及“青年义务国防军”的活动正是抓住了这一突破口，这无疑宣布了与洪堡“人文的、广博的、唯美的和自治的”教育理想背道而驰。

魏玛时代这三代大学生的第三个共同点是政治倾向的普遍右翼化。要追寻这种右翼化的原因，则要从魏玛共和国政治上的软弱无力以及应付危机的无能上去寻找。

这个新生的民主制共和国是在战后的革命中诞生的，而这场革命本身就与一场民族失败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战后的共和国是与《凡尔赛和约》带来的民族耻辱相联系的，而战败中崩溃

的那个德帝国却是与民族强大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战后的这个共和国能迅速带来经济复兴的话，那么它仍然不能排除在大学生中找到它的积极支持者的可能性，然而这个共和国在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却遭到前后长达十年的超通货膨胀与经济大危机，并带来了 20 次的内阁换届，甚至它连短短五年的“相对稳定时期”打上的也不是民族强盛的印记，而是美国援助的结果，而这在大学生们看来正是民族虚弱的征兆，也是民主制度无能的结果。因此，他们看不出这个民主制度有什么优越性，从根本上来讲，他们也是不愿与这个共和国主动合作的，这就导致了他们政治倾向普遍的右翼化。

因此，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解体的过程中，一个受过德国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投入了右翼激进主义的纳粹运动并不是什么巧合。身心受到双重打击的德国大学生们，在威廉时代继承而来的民族理想与现实生存危机之间的碰撞中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渴望重新回到美好的旧时光，这自然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民族精英意识，因此，当纳粹主义在经济危机中崛起时，德意志的大学生们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

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德国大学生们看来，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的夺权，意味着自 1918 年以来大学生苦难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具有行动力的元首将是德意志民族未来的保证。在这位元首的领导下，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将会由他们来完成，而他们也将在这场民族复兴中实现他们个人的美好前景。

总之，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最终选择了纳粹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但是不能说，德国大学生早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就已经做好了走向纳粹主义的准备，因为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变量。

## 附 录

### 译名对照表

- Alldeutschen Verband 泛德意志同盟
- Allgemeine Burschenschaft 大学男生联合会联盟
- Allgemeiner Deputierten-Convent(ADC) 全体代表会
- Allgemeinen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联盟
- Allgemeinen Studentenausschüssen(AStA) 大学生代表委员会
- Alte Herren 长老团
- Arbeitsdienst 青年义务劳动军
- Burschenschaft 大学男生联合会
- Corp 或 Korps 大学生军团
- Carteverband der Kathol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verbindungen(CV)  
德意志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
- Deutsche Burschenschaft(DB) 德意志大学男生联合会
- Deutscher Flottenverein 德国海军协会
- Deutscher Hochschulring(DHR) 德意志高校圈
- Deutschen Kolonialgesellschaft 德国殖民地协会
-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DSt) 德意志大学生同盟会
- Deutsche-völkische Studentenkreise 德意志种族主义大学生圈子
- Deutsch-völkische Studentische Bewegung(DVStB) 大学生种族主义  
运动
- Deutsche-völkische Studentenverband 德意志种族主义大学生社团
- Deutscher Studentenverband 德意志大学生社团

Deutsches Studentenwerk	德意志大学生会
Eisenacher Burschenschaft	埃森纳赫大学男生联合会
Eisenacher Deputierten-Convent(EDC)	埃森纳赫代表会
Eisenacher Konvention	埃森纳赫协定
Freistudenten	自由大学生
freiwilliger Arbeitsdienst(FAD)	青年志愿劳动军
Grün-Weiß-Rote-Kartell	绿—白—红联盟
Hochschulring deutscher Art(HDA)	德意志风格高校圈
Jugendbewegung	青年运动
Jungdeutsche Bund	青年德意志联盟
Katholische Studentenverbindungen	天主教大学生联盟
Kartellverband Kathol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vereine(KV)	德意志 天主教大学生联盟
Köseener Senioren-Convents-Verband(KSCV)	科森那团
Landsmannschaft	同乡会
Nationaler Studentenbund	民族主义大学生联盟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NSDStB)	纳粹大学 生联盟
Norddeutsche Kartell	北德意志联盟
Nord-und Ostmarkenverein	北部及东部边境协会
Republikanische Studentische Kartell	共和大学生团体
Studentischen Vertretungen	大学生代表团
Süddeutsche Kartell	南德意志联盟
Turnerschaft	体操协会
Vereinigung Alter Burschschafter(VAB)	长老联盟
Vereine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	外国德意志人协会
Vereine Deutscher Studenten(VDSt)	德意志大学生协会
Waffenring	武装大学生团体
Wingolf	温高夫

图 表

表 1 德国大学生人数(1801—1932)

学年	综合大学	技术高校	林学院	矿业学院	兽医学院	农业学院	商学院	教育学院	神学院	总学生数	每 10 万居民的 大学生
1801—1805	5 765										25.1
1831—1832	14 412										50.9
1850—1851	12 426										36.8
1872—1873	15 756	4 103	317	168	271	298				20 913	50.7
1891—1892	27 398	4 209	280	389	1 047	694			1 237	35 254	70.8
1900—1901	33 688	11 072	253	780	1 282	911	304		1 424	49 714	88.7
1910—1911	53 765	11 502	257	623	1 138	1 609	1 993		1 365	72 252	111.9
1913—1914	60 017	11 542	225	473	777	1 274	1 283		1 256	76 847	114.7
1919—1920	89 443	20 084	232	632	795	1 845	2 669		1 288	116 988	186.1
1920—1921	85 022	24 031	282	849	776	2 615	2 896		1 355	117 826	190.7
1921—1922	83 707	26 372	341	1 155	661	3 215	3 402		1 282	120 135	192.3
1922—1923	82 550	27 424	276	1 428	527	3 172	5 702		1 231	122 310	197.2
1923—1924	76 885	26 457	226	1 539	420	2 532	5 501		1 325	114 876	183.9
1924—1925	60 969	22 935	206	1 367	327	2 131	4 971		1 235	94 141	149.8
1925—1926	59 645	20 621	235	1 117	335	1 794	4 453		1 281	89 481	141.6
1926—1927	64 647	21 112	269	946	388	1 497	4 076	248	1 401	94 584	148.6
1927—1928	72 270	20 332	277	768	484	1 412	3 898	604	1 449	101 494	158.5
1928—1929	83 322	20 397	225	602	576	1 200	3 728	782	1 534	112 366	174.5
1929—1930	93 090	21 618	221	427	734	1 209	3 460	1 326	1 615	123 700	191.1
1930—1931	99 577	22 312	184	437	804	1 175	3 447	2 382	1 772	132 090	202.9
1931—1932	103 912	22 275	165	410	1 036	1 041	3 965	3 243	1 963	128 010	210.9
1932—1933	98 852	20 474	133	360	1 090	994	3 481	2 026	2 196	129 606	197.2

来源: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ommersemester 1932, 17

表 2 德国高校注册率 (1913—1928)

冬季学期	总数		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		矿业学校		农林学院		商业学校		哲学院与神学院		
	人数	变化率%	人数	变化率%	人数	变化率%	人数	变化率%	人数	变化率%	人数	变化率%	
1913	78 063	+2.2	62 594	+2.4	11 709	+1.2	1 213	-1.3	1 137	+4.1	1 410	+0.9	战前
1914	80 167	+2.7	63 636	+1.7	12 477	+6.6	1 336	+10.3	1 269	+11.6	1 449	+2.8	
1915	23 041	-71.3	19 072	-70.0	2 990	-76.0	177	-86.8	413	-67.5	389	-73.2	
1916	17 089	-25.8	13 849	-27.4	2 583	-12.6	238	+34.5	182	-55.9	237	-39.1	战争中
1917	21 633	+26.6	18 560	+34.0	2 375	-8.1	209	-12.2	304	+67.0	185	-21.9	
1918	25 079	+15.9	21 289	+14.7	3 055	+28.6	272	+30.1	313	+3.0	150	-18.9	
1919	111 671	+345.3	90 232	+323.8	16 155	+428.8	1 927	+608.5	2 211	+606.4	1 146	+664.0	
1920	151 077	+3.1	87 367	-3.2	21 569	+33.5	2 146	+11.4	2 741	+24.0	1 254	+9.4	
1921	120 726	+4.9	88 479	+1.3	15 106	+16.4	2 821	+31.5	2 846	+3.8	1 474	+17.5	战后
1922	120 815	+0.1	85 393	-3.5	27 018	+7.6	3 232	+14.6	3 797	+33.4	1 357	-6.7	
1923	125 728	+4.1	86 102	+0.8	28 669	+6.1	3 062	-5.3	6 589	+73.5	1 306	-5.0	
1924	101 271	-19.5	68 538	-20.4	23 693	-17.4	2 368	-22.7	5 355	-18.7	1 317	+0.8	
1925	89 481	-11.1	59 980	-12.5	21 738	-8.3	2 029	-14.3	4 453	-18.8	1 281	-2.7	平稳期
1926	94 584	+5.7	650 355	+8.4	22 058	+1.5	1 776	-13.0	4 076	-8.5	1 401	+9.4	
1927	101 494	+7.3	72 754	+11.9	21 100	-5.3	1 689	-4.4	3 898	-4.4	1 449	+3.4	
1928	121 336	+10.7	83 898	+15.3	20 999	-0.5	1 425	-15.6	3 728	-4.4	1 534	+5.9	

来源: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d. 7, Berlin, 1931, S. 4ff, Entwicklung des Hochschulstudiums in Deutschland

表3 德国大学生的社会出身分布(1928—1931)

	高层中产阶级 <sup>1</sup>	下层中产阶级 <sup>2</sup>	工人阶层 <sup>3</sup>
1927—1928SS <sup>4</sup>	34.2	59.8	3.7
1928—1929WS <sup>5</sup>	34.7	59.6	4.7
1928—1929SS	34.1	59.2	5.7
1929—1930WS	33.7	60.0	5.4
1929—1930SS	32.7	60.7	5.8
1930—1931WS	34.2	59.2	5.8
1930—1931SS	34.1	59.2	5.9

来源: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ommerhalbjahr, 1931, S. 41

1. 高层中产阶级包括军官、拥有大学文凭的自由职业者、大商人、工厂老板、领导层雇员。

2. 下层中产阶级包括其他的军队供职人员、无大学文凭的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独立的手工业者、其他小商人、小店主及雇员。

3. 工人阶层包括底层公务员和工人。

4. SS表示夏季学期,后表同。

5. WS表示冬季学期,后表同。

表4 德意志大学生专业分布(1913—1933)<sup>1</sup>

	医学	法学	哲学-历史	天主教神学	新教神学	机械 工程师 <sup>2</sup>
1913—1914 WS	26.1	16.5	21.3	3.2	6.5	28.8
1918—1919 WS	25.8	19.2	20.3	2.7	4.9	37.1
1918—1919 SS	25.1	19.3	16.6	2.4	4.2	37.5
1919—1920 WS	23.3	19.8	16.6	2.2	4.0	34.2
1919—1920 SS	21.9	20.3	15.7	2.5	4.1	34.6
1920—1921 WS	20.3	21.2	14.5	2.4	3.8	37.6
1920—1921 SS	19.1	22.5	14.0	2.4	3.8	38.2
1921—1922 WS	18.3	23.1	12.9	2.1	3.5	39.0

续表

	医学	法学	哲学-历史	天主教神学	新教神学	机械 工程师 <sup>2</sup>
1921—1922 SS	17.1	24.9	12.8	2.2	3.5	38.6
1922—1923 WS	16.2	25.6	12.9	2.0	3.0	37.7
1922—1923 SS	14.6	27.5	12.2	2.1	2.9	36.8
1923—1924 WS	13.9	28.9	13.0	2.0	2.7	37.5
1923—1924 SS	13.5	28.3	14.1	2.5	3.0	39.0
1924—1925 WS	13.9	29.0	21.7	2.5	3.0	40.3
1924—1925 SS	13.0	30.1	17.0	2.7	3.1	34.8
1925—1926 WS	13.0	29.4	17.9	2.6	3.0	36.4
1925—1926 SS	13.0	29.1	19.3	2.6	3.1	35.7
1926—1927 WS	13.2	29.0	20.2	2.5	3.2	35.5
1926—1927 SS	13.3	28.4	20.2	2.4	3.6	33.6
1927—1928 WS	13.6	28.4	20.5	2.3	3.6	32.5
1927—1928 SS	14.3	27.5	21.6	2.2	4.1	30.1
1928—1929 WS	15.1	26.8	21.8	2.2	4.1	29.1
1928—1929 SS	16.1	24.6	22.5	2.1	4.8	27.5
1929—1930 WS	17.2	23.7	22.7	2.1	4.8	26.1
1929—1930 SS	18.1	22.1	23.2	2.0	5.3	24.3
1930—1931 WS	19.2	21.2	22.8	2.1	5.4	23.4
1930—1931 SS	20.7	20.0	21.9	2.1	6.2	22.5
1931—1932 WS	22.7	18.7	21.0	2.3	6.6	22.0
1931—1932 SS	25.0	18.5	18.9	2.3	7.1	20.9
1932—1933 WS	26.2	17.4	18.3	2.4	7.4	21.6

来源：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Jg. 1919-1933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包括非德国籍德意志大学生。
2. 机械工程专业属于技术高校专业，其他专业属于综合大学专业。



表5 维尔茨堡大学生专业分布及在 NSDStB 中的分布(1927—1932)<sup>1</sup>

年份	医学		法学		天主教神学	
	大学	NSDStB	大学	NSDStB	大学	NSDStB
1926—1927SS		44.0		36.0		0
1927—1928WS		23.8		42.8		0
1927—1928 SS	30.1	22.7	23.7	40.9	8.2	0
1928—1929WS	31.6	27.0	22.4	40.5	9.1	0
1928—1929SS	36.2	34.6	18.1	26.9	8.0	1.9
1929—1930WS	34.6	28.1	18.6	18.7	7.8	4.6
1929—1930SS	35.7	23.5	15.2	29.4	8.1	2.9
1930—1931WS	34.9	35.1	17.2	27.0	7.4	0
1930—1931SS	38.6	41.3	15.1	13.7	6.9	0
1931—1932WS	39.9	35.2	13.5	13.7	6.7	1.9
1931—1932SS	42.3	48.7	13.4	17.0	5.6	0

来源: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Jg. 1928-1933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包括非德国籍德意志大学生。

表6 明斯特大学生专业分布及在 NSDStB 中的分布(1928—1932)<sup>1</sup>

年份	医学		法学		哲学-历史	
	大学	NSDStB	大学	NSDStB	大学	NSDStB
1928—1929WS	11.5	0	22.9	0	26.8	25.0
1928—1929SS	13.6	0	20.4	0	25.1	62.5
1929—1930WS	15.2	0	20.0	53.3	24.5	0
1929—1930SS	15.2	0	18.5	36.6	25.0	23.3
1930—1931WS	16.6	0	16.4	26.6	25.5	36.6
1930—1931SS	16.5	0	16.0	16.1	24.2	29.0
1931—1932WS	20.4	0	13.7	16.6	22.8	22.2
1931—1932SS	23.7	10.5	13.2	21.0	18.7	26.3

来源: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Jg. 1929-1933. Liste des NSDStB Münster, 1928-1933, Universitätsarchiv Münster.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包括非德国籍德意志大学生。

表 7 爱尔兰根大学生专业分布及在 NSDSStB 中的分布(1928—1931)<sup>1</sup>

年份	医学		法学		哲学—历史		新教神学	
	大学	NSDSStB	大学	NSDSStB	大学	NSDSStB	大学	NSDSStB
1928—1929WS	18.5	21.2	26.4	15.1	9.5	6.0	21.3	36.3
1929—1930WS	21.5	23.0	21.7	12.0	9.5	12.0	21.0	30.0
1930—1931WS	23.5	26.5	19.3	7.5	10.0	9.0	23.7	36.0
1930—1931SS	27.1	27.1	17.2	21.3	9.0	8.7	22.5	22.3

来源: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Jg. 1929-1932, Liste des NSDSStB Erlangen, 1928-1931, Universitätsarchiv Erlangen.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包括非德国籍德意志大学生。

表 8 达姆施达特技术高校大学生专业分布及在 NSDSStB 中的分布(1926—1927SS)

	建筑	建造工程师	机械制造	电气工程师	化学	自然科学
高校	8.3	11.0	30.0	23.6	9.2	13.0
NSDSStB	7.1	14.2	28.5	28.5	14.2	7.1

表 9 德国高校专业分布及在 NSDSStB 中的分布(1928—1931)<sup>1</sup>

年份	学校	医学		法学		哲学-历史		新教神学	
		大学	NSDSStB	大学	NSDSStB	大学	NSDSStB	大学	NSDSStB
1927— 1928SS	柯尼斯堡			31.9	40.0	44.0	6.6		
	图宾根			26.4	22.2	19.1	22.2		
	莱比锡			22.6	15.6	57.7	46.8		
	基尔	24.0	13.0	37.2	8.6	36.0	43.0	2.6	4.3
	耶拿	15.5	20.0	29.7	32.0	27.8	24.0		
	科隆			28.8	50.0				
	马尔堡	10.2	22.2			25.7	22.2	9.6	33.3

续表

年份	学校	医学		法学		哲学-历史		新教神学	
1928—1929 WS	海德堡	24.5	38.4	22.1	30.7	32.6	15.2		
	科隆			26.7	40.0				
1928—1929 SS	汉堡			29.0	56.0	38.1	32.0		
	海德堡	25.9	63.1	25.3	17.2	30.0	30.9		
	波恩	25.3	7.1	25.0	7.1	38.2	49.9		
	吉森	16.9	17.6	19.4	35.2	23.2	11.6		
1929—1930 WS	马尔堡	18.7	14.2	20.8	28.5	25.1	42.7	10.2	9.5
	罗斯托克	30.0	25.0	17.4	18.7	17.4	25.0	6.1	18.7
	汉堡			21.1	35.6	21.5	42.8		
	莱比锡	10.6	7.0	19.8	17.0	25.9	34.5		
	耶拿	15.0	14.2	18.4	34.6	36.2	26.4	4.9	4.0
1930—1931 WS	哥廷根	15.5	9.3	23.7	20.9	15.5	16.2	8.7	27.9

来源: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Jg. 1929-1931.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包括非德国籍德意志大学生。

表 10 维尔茨堡大学生 NSDStB 成员的社会出身(1927—1932)<sup>1</sup>

年份	高层中产阶级	下层中产阶级	工人阶层
1926—1927SS	44.0	52.0	4.0
1927—1928WS	28.5	61.9	9.5
1927—1928SS	18.1	72.2	9.0
1928—1929WS	29.7	64.8	5.4
1928—1929SS	36.5	59.6	3.8
1929—1930WS	34.3	62.5	3.1
1929—1930SS	25.2	64.7	0
1930—1931WS	32.4	62.1	5.4
1930—1931SS	31.0	65.5	3.4
1931—1932WS	33.3	66.6	0
1931—1932SS	41.4	58.5	0

来源: *Liste des NSDStB Würzburg*, 1927-1932, AR, IV/2.01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表 11 德国及外国犹太大学生专业分布 (1928—1933)<sup>1</sup>

	1927— 1928 SS	1928— 1929 WS	1928— 1929 SS	1929— 1930 WS	1929— 1930 SS	1930— 1931 WS	1930— 1931 SS	1931— 1932 WS	1931— 1932 SS	1932— 1933 WS
总数	a	4.3	4.3	4.2	4.3	4.4	4.5	4.6	4.8	4.8
	b	22.0	22.0	21.8	22.3	21.6	20.6	22.6	21.1	23.9
法学	a	5.5	5.2	5.3	5.4	5.7	5.8	5.8	5.8	5.8
	b	10.3	10.0	11.2	11.7	11.3	10.8	10.7	10.6	9.6
民族经济学	a	5.7	5.7	5.6	5.6	6.1	6.0	6.1	6.5	5.7
	b	34.5	34.2	34.1	34.8	35.8	30.2	32.5	33.7	30.1
企业经济学	a	2.6	3.4	3.7	3.2	3.4	2.8	2.8	3.5	3.3
	b	16.6	23.5	23.7	22.2	23.6	16.1	17.5	22.7	16.6
统计学	a	—	—	12.5	—	18.1	14.2	—	—	20.0
	b	—	—	—	—	—	—	—	—	100
医学	a	7.8	7.5	7.1	7.0	7.2	7.3	7.6	7.6	7.8
	b	26.6	25.3	23.9	23.3	23.2	22.6	24.6	22.3	29.1
牙医	a	5.5	5.9	5.9	6.0	9.6	5.9	6.0	6.0	5.3
	b	24.5	24.7	25.2	26.3	13.3	26.9	26.1	24.8	26.9

续表

	1927— 1928 SS	1928— 1929 WS	1928— 1929 SS	1929— 1930 WS	1929— 1930 SS	1930— 1931 WS	1930— 1931 SS	1931— 1932 WS	1931— 1932 SS	1932— 1933 WS
兽医	a	—	0.6	0.2	66.6	0.5	0.8	0.6	0.6	0.5
	b	—	33.3	—	0.5	33.3	16.6	—	16.6	40.0
教育理论	a	4.4	4.3	4.0	7.2	8.8	8.7	8.1	9.4	10.4
	b	42.8	43.9	41.3	48.3	39.1	40.4	46.6	36.6	35.8
古典哲学	a	3.7	3.4	3.2	3.2	2.9	2.4	2.0	2.2	2.5
	b	42.0	41.3	44.0	46.9	39.1	25.0	10.0	29.0	36.3
现代哲学	a	2.1	2.3	2.4	2.7	2.9	2.7	2.7	3.1	2.9
	b	13.7	17.8	21.7	23.7	24.8	21.2	20.3	24.8	24.7
日耳曼文学	a	2.1	2.4	2.3	2.5	2.8	2.8	3.0	2.7	2.9
	b	20.4	18.1	16.3	17.3	17.5	18.9	22.1	14.1	20.8
新闻学	a	3.9	7.5	7.9	6.4	16.6	7.0	3.9	6.0	7.2
	b	20.0	20.0	35.7	25.0	8.5	41.6	—	15.3	12.5
考古学	a	11.2	11.4	9.2	7.6	30.5	7.3	12.1	6.6	4.6
	b	19.4	26.0	20.9	34.6	4.2	24.4	21.8	17.5	12.9

续表

	1927— 1928 SS	1928— 1929 WS	1928— 1929 SS	1929— 1930 WS	1929— 1930 SS	1930— 1931 WS	1930— 1931 SS	1931— 1932 WS	1931— 1932 SS	1932— 1933 WS
音乐	a	4.5	5.1	3.3	19.3	4.4	3.9	3.6	3.4	3.9
	b	40.7	29.0	25.0	4.0	25.8	20.6	27.2	20.0	22.7
历史学	a	4.6	4.6	4.3	4.1	4.2	4.6	4.2	4.9	4.6
	b	32.9	38.6	36.5	39.6	0.8	30.8	35.1	27.8	25.0
地理学	a	0.8	0.3	0.2	0.9	—	1.0	0.9	0.6	1.0
	b	37.5	25.0	—	—	1.9	—	10.0	14.2	20.0
数学	a	1.7	1.8	1.7	1.8	1.9	2.1	2.1	2.3	2.1
	b	26.0	21.6	19.7	19.1	1.8	17.5	21.2	21.7	16.8
物理学	a	3.7	2.8	2.3	1.9	40.0	1.7	1.5	1.7	1.8
	b	32.0	30.4	37.2	41.1	4.1	48.3	38.4	39.2	34.4
化学	a	5.5	4.9	4.6	4.3	27.7	3.7	3.6	3.8	4.0
	b	31.5	30.5	26.3	28.9	2.8	26.2	28.1	26.1	30.8
药学	a	3.6	3.6	3.7	3.7	10.3	3.1	3.3	3.1	3.5
	b	15.3	14.8	14.7	8.5	0.4	19.4	16.6	8.6	12.9

	1927— 1928 SS	1928— 1929 WS	1928— 1929 SS	1929— 1930 WS	1929— 1930 SS	1930— 1931 WS	1930— 1931 SS	1931— 1932 WS	1931— 1932 SS	1932— 1933 WS
地质学	a	1.4	0.9	1.2	0.7	—	—	0.9	2.0	0.9
	b	—	—	—	—	—	—	50.0	50.0	50.0
矿业	a	—	—	—	—	—	—	—	—	—
	b	—	—	—	—	—	—	—	—	—
生物学	a	1.2	1.3	1.2	1.1	1.1	1.2	1.2	0.9	0.9
	b	25.0	18.5	13.3	18.5	16.6	33.3	36.6	40.0	33.3
自然科学	a	0.7	—	—	1.2	1.7	0.7	1.4	1.4	0.9
	b	50.0	—	—	—	—	—	—	—	—
农业	a	2.4	2.2	2.9	2.1	1.6	1.1	0.8	0.8	0.2
	b	91.6	90.0	86.3	81.2	9.0	42.8	60.0	100	100
林学	a	—	—	—	—	—	—	—	—	—
	b	—	—	—	—	—	—	—	—	—
体育	a	0.5	—	0.3	—	0.4	0.1	0.1	0.3	0.4
	b	—	—	—	—	—	—	33.3	—	33.3
其他	a	5.4	4.7	7.5	2.3	1.9	14.1	18.8	19.2	18.4
	b	42.1	40.0	46.1	40.0	—	47.0	50.0	57.1	47.0

来源：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HJ 1928-WHJ 1932-1933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a. 犹太大学占总学生的比例。

b. 外国犹太大学生占犹太大学生的比例。

表 12 德国及外国犹太大学生占大学生总人数的百分比(1928—1933)

	学生总数的犹太大学生比例	犹太大学生中外国犹太大学生比例
1927—1928SS	2.4	46.9
1928—1929WS	2.5	51.2
1928—1929SS	2.4	51.3
1929—1930WS	2.4	51.7
1929—1930SS	2.3	52.4
1930—1931WS	2.3	53.0
1930—1931SS	2.4	54.0
1931—1932WS	2.1	55.3
1931—1932SS	2.1	56.0
1932—1933WS	2.1	54.0

来源: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SHJ 1928-WHJ 1932-1933

表 13 NSDAP 中大学生人数(1925—1930)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新加入 NSDAP 大学生人数	463	548	377	731	1 535	4 659
新加入大学生的比例(%)	2.03	2.80	2.37	2.67	2.48	2.62
大学生年增长率(%)	-6.2	6.1	6.9	12.0	9.7	5.8
NSDAP 大学生年增长率(%)	—	18.3	-45.3	93.8	109.0	203.5

来源: Bundesarchiv Koblenz, Schumacher/376;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Jg. 1925-1930

表 14 国家对大学生会的财政支持(1924—1944)

年份	国家补助(马克)
1924	1 936 767
1925	3 000 000



续表

年份	国家补助(马克)
1926	2 684 500
1927	3 056 500
1928	4 063 000
1929	3 031 000
1930	2 748 000
1931	1 808 500
1932	1 576 100
1933	1 583 935

来源: Michael 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1995, S. 142

表 15 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大学生男女生统计(1914—1933)<sup>1</sup>

学期	综合大学			技术高校		
	男	女		男	女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914	56 172	4 053	6.7	11 381	70	0.6
1920	78 630	7 994	9.2	19 274	233	1.2
1925	52 866	6 779	11.4	19 902	398	2.0
1930	82 122	17 455	17.5	21 252	780	3.5
1930—1931	78 624	17 183	17.9	22 921	828	3.5
1931	84 518	19 394	18.7	21 366	909	4.1
1931—1932	77 316	17 955	18.8	21 592	948	4.2
1932	80 536	18 316	18.5	19 530	944	4.6
1932—1933	75 409	17 192	18.6	19 509	922	4.5
1933	72 720	16 210	18.2	16 957	788	4.4

来源: *Datenhandbuch zur deutschen Bildungsgeschichte*, Bd. I: Hochschulen, 1. Teil, Göttingen, 1987, S. 33. 42f, 46f.

1. 不包括旁听生和休学生, 包括外国学生。

表 16 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的外国学生统计(1911—1933)

学期	综合大学外国学生		技术高校外国学生	
	总人数	百分比	总人数	百分比
1911	4 277	7.7	—	—
1925	4 442	7.5	2 656	13.1
1932	4 209	4.3	1 728	8.4
1932—1933	4 366	4.7	1 821	8.9
1933	3 406	3.9	1 576	8.9

来源: *Datenhandbuch zur deutschen Bildungsgeschichte*, Bd. I, Hochschulen, 1. Teil, Göttingen, 1987, S. 42f, 47.

表 17 德国综合大学中学生的专业分布(1932—1933)<sup>1</sup>

学期	神学	法学	医学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经济学	其他	总计
1932	9.5	18.6	33.4	12.3	18.9	5.5	1.7	100
1932—1933	9.9	17.5	34.9	11.8	18.4	5.7	1.8	100
1933	10.3	17.0	37.4	11.0	17.1	5.4	1.8	100

来源: *Zehnjahres-Statistik des Hochschulbesuchs und der Abschlußprüfungen*. Bearbeitet von Charlotte Lorenz, Bd. I, Abschlußprüfungen, Berlin, 1943, S. 152-155.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表 18 德国综合大学女大学生各专业分布(1932—1933)<sup>1</sup>

学年	神学	法学	医学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经济学	其他	总计
1932	3.6	6.2	20.4	22.3	34.1	17.8	2.7	18.5
1933	3.4	4.9	20.9	22.0	34.5	16.1	2.2	18.2

来源: *Zehnjahres-Statistik des Hochschulbesuchs und der Abschlußprüfungen*. Bearbeitet von Charlotte Lorenz, Bd. I, Abschlußprüfungen, Berlin, 1943, S. 152-154.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表 19 德国大学生的社会出身分布(1931—1933)<sup>1</sup>

	1931	1933
有产资产阶级 <sup>2</sup>	7.6	5.5
教育资产阶级 <sup>3</sup>	20.0	21.2
领导层雇员	6.4	6.0
总计	<b>34.0</b>	<b>32.7</b>
无大学文凭的资源职业者	2.0	2.0
中层公务员	28.6	28.2
下层公务员	2.7	2.5
非管理层雇员	6.4	7.8
工商业中产阶级 <sup>4</sup>	15.2	15.4
总计	<b>54.9</b>	<b>55.9</b>
军官	1.4	1.6
农场主	5.7	5.8
工人	3.2	3.0
其他	0.8	1.0
总计	100	100

来源: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Bd. 7, Berlin, 1931, S. 46, Bd. 13, Berlin, 1935, S. 52f.; *Zehnjahres-Statistik des Hochschulbesuchs und der Abschlußprüfungen*. Bearbeitet von Charlotte Lorenz, Bd. I; *Abschlußprüfungen*, Berlin, 1943, S. 89, 362-371.

1. 统计数据为百分比。

2. 有产资产阶级(*Besitzbürgertum*): 继承了大工厂、大商业或者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 老板。

3. 教育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 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官、医生、神甫、教师、高层官员。

4. 工商业中产阶级: 独立的手工艺老板、小商店主、自由职业者等。

表 20 综合大学与技术高校大学生的宗教信仰(1929—1930SS)

高校	新教		天主教		犹太教		其他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综合大学									
柏林	9 443	72.0	1 585	12.1	1 401	10.7	691	5.3	13 120	100
波恩	2 556	41.7	3 430	53.9	191	3.0	92	1.4	6 369	100
布雷斯劳	2 178	50.1	1 838	42.3	292	6.7	39	0.9	4 347	100
爱尔兰根	1 284	72.5	427	24.1	33	1.9	28	1.6	1 772	100
法兰克福	2 243	59.5	1 033	27.4	364	9.6	132	3.5	3 772	100
弗莱堡	1 962	48.6	1 687	41.8	301	7.5	84	2.1	4 043	100
吉森	1 454	79.2	305	16.6	46	2.5	32	1.7	1 837	100
哥廷根	3 647	86.3	436	10.3	48	1.1	94	2.2	4 225	100
格赖夫斯 瓦尔德	1 740	88.6	202	10.3	5	0.3	17	0.9	1 964	100
哈勒	2 289	92.8	125	5.1	30	1.2	23	0.9	2 467	100
汉堡	3 067	83.0	191	5.2	170	4.6	268	7.3	3 696	100
海德堡	2 352	63.4	928	25.0	322	8.7	108	2.9	3 710	100
耶拿	2 857	91.9	153	4.9	19	0.6	81	2.6	3 110	100
基尔	2 571	83.4	432	14.0	23	0.7	56	1.8	3 082	100
科隆	2 113	36.3	3 419	58.7	203	3.5	86	1.5	5 821	100
柯尼斯堡	3 048	83.7	448	12.3	110	3.0	36	1.0	3 642	100
莱比锡	5 985	89.6	281	4.2	202	3.0	211	3.2	6 679	100
马尔堡	3 401	86.8	440	11.2	36	0.9	41	1.1	3 918	100
慕尼黑	3 939	45.1	4 321	49.4	247	2.8	233	2.7	8 740	100
明斯特	1 393	33.4	2 754	66.0	19	0.5	9	0.2	4 175	100
罗斯托克	1 832	86.3	244	11.5	17	0.8	31	1.5	2 124	100
图宾根	2 921	78.2	761	20.4	21	0.6	32	0.9	3 735	100
维尔茨堡	1 032	34.3	1 784	59.3	146	4.8	48	1.6	3 010	100
总计	65 407	65.8	27 224	27.4	4 246	4.3	2 472	2.5	99 349	100

续表

高校	新教		天主教		犹太教		其他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技术高校									
亚琛		36.3		57.4		1.3		5.0		100
柏林		74.9		11.6		6.1		7.4		100
布伦瑞克		84.6		8.8		0.9		5.7		100
布雷斯劳		64.0		28.1		3.3		4.6		100
达姆施达特		75.5		18.7		2.1		3.7		100
德累斯顿		88.6		5.9		1.3		4.2		100
汉诺威		84.8		13.1		0.4		1.7		100
卡尔斯鲁尔		58.1		35.5		3.2		3.2		100
慕尼黑		54.7		41.0		1.0		3.3		
斯图加特		77.6		18.9		1.1		2.4		
总计		72.5		20.7		2.4		4.4		

来源: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 Bd. 5, Sommerhalbjahr, 1930, Berlin, 1930, S. 76, 81

表 21 ASIA 选举中各高校纳粹分子得票率 (1928—1933)

高校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综合大学					
柏林	14.6	19.3	—	—	65.4 <sup>1</sup>	—
波恩	—	—	8.2	19.1	26.2	22.0
布雷斯劳	—	24.8	70.2	77.8	45.7	—
爱尔兰根	32.8	54.8	75.1	63.8	68.2	—
法兰克福 <sup>3</sup>	—	44.9 <sup>2</sup>	—	—	—	—
弗莱堡	4.1	8.4	17.4	25.1	50.5 <sup>1</sup>	—
吉森	—	—	36.9	55.5	52.1	61.1

续表

高校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综合大学					
哥廷根	—	13.3 <sup>1</sup>	29.0	54.4	61.6	—
格赖夫斯瓦尔德	17.1	22.1	50.6	60.3	—	—
哈勒	—	12.8	29.1	49.3	46.2 <sup>13</sup>	—
汉堡	—	—	19.0	39.5	42.2	44.9
海德堡	—	22.6	37.0	—	—	46.7
耶拿	—	14.8	29.6	62.2 <sup>5</sup>	86.8 <sup>6</sup>	49.3
基尔	20.0	—	39.1 <sup>1</sup>	—	—	—
科隆 <sup>7</sup>	—	—	—	—	47.8 <sup>2</sup>	—
柯尼斯堡	—	—	33.9	52.3	44.8	—
莱比锡	6.8	7.9 <sup>1</sup>	25.7	49.3	54.6	47.8
马尔堡 <sup>8</sup>	—	—	—	50.2	63.4	—
慕尼黑	10.0	16.8	32.9	37.8	32.5 <sup>9</sup>	—
罗斯托克	—	35.0 <sup>1</sup>	32.6	52.1	56.1	32.9
图宾根 <sup>10</sup>	—	—	—	—	43.6	39.7
维尔茨堡	8.7	19.6	39.6	37.4	39.1 <sup>9</sup>	—
明斯特 <sup>11</sup>	—	—	—	—	—	—
总计	11.8	19.3	32.4	44.6	94.1	41.3
	技术高校					
亚琛	—	—	—	—	26.6	25.0
柏林	13.2	27.0	70.0	—	—	62.1
布伦瑞克	—	13.3	26.4	47.8	43.2	33.5
布雷斯劳	—	—	—	—	60.1	—
达姆施达特	—	—	—	45.9	46.9	35.8
德累斯顿 <sup>12</sup>	—	—	—	—	—	—

续表

高校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技术高校					
汉诺威	—	—	—	19.9	19.0	—
卡尔斯鲁尔	—	7.2	14.4	49.0	62.9	75.3
慕尼黑	11.2	19.3	38.6	45.4	43.0 <sup>9</sup>	—
斯图加特 <sup>10</sup>	—	—	—	—	26.4	—
总计	12.0	20.2	44.7	43.0	41.2	49.1

来源：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496-497.

“—”表示该年没有举行 AStA 选举，或者没有纳粹分子参加竞选，或者纳粹分子与别的社团结盟参选的，例如 1928—1929 年汉堡大学的“Völkischer Ring”，1929—1930 年汉诺威技术高校的“Liste Nationalistischer Studenten”，1928—1930 年达姆施塔特技术高校的“Völkische Studenten”，也没有记录。在某些高校，一年举行了两次 AStA 选举，这种情况只记录了第一次的。

1. 参选人数较少(30%~50%)。
2. 参选人数非常少(30%以下)。
3. 法兰克福 1928—1933 年只选举了一次 AstA。
4. 根据议席分配状况。具体的数字没有记录。
5. 与钢盔团组成联合阵线。
6. 与传统大学生联盟和钢盔团组成联合阵线。
7. 1928—1931 年和 1933 年科隆没有进行 AStA 选举。
8. 1928—1930 年和 1933 年马尔堡没有进行 AStA 选举。
9. 与战斗性大学生团体组成共同阵线。
10. 图宾根和斯图加特有个人选举权。从 1932 年期才开始组团参选。
11. 1928—1933 年明斯特没有进行 AStA 选举。
12. 德累斯顿技术高校的选举模式不允许某个团体整体参选。政治团体或者高校政治团体因此不能派出候选人。
13. 1932 年，哈勒大学选举中，纳粹大学生与其他几个传统大学生社团共同组团参选。结果根据席位数字算出。

表 22 ASTa 选举的性别比例 (1929—1932)

阵线	票数					
	男		女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耶拿大学, 1929年1月						
参加总人数: 59.9%						
参加的女大学生人数: 49.9%						
大德意志大学生联盟	865	69.3	56	32.2	921	64.7
纳粹	184	14.7	27	25.5	211	14.8
自由大学生和青年运动	106	8.5	47	27.0	153	10.8
自由高校阵线	94	7.5	44	25.3	138	9.7
总计	1 249	100	174	100	1 423	100
布雷斯劳大学, 1929年11月						
参加总人数: 39.0%						
参加的女大学生人数: 17.7%						
民族主义大学生	546	37.7	25	19.4	571	36.2
纳粹大学生联盟	344	23.8	47	36.4	391	24.8
基督教-民族主义大学生	291	20.1	17	13.2	308	19.5
民族主义自由大学生	266	18.4	40	31.0	306	19.4
总计	1 447	100	129	100	1 576	100
耶拿大学, 1930年2月						
参加总人数: 78.4%						
参加的女大学生人数: 74.3%						
大德意志大学生联盟	776	43.6	76	23.2	852	40.5
纳粹大学生联盟	575	32.3	48	14.7	623	29.6
高校实务工作协会	201	11.3	109	33.3	310	14.7
德意志大学生社团	223	12.5	61	18.7	284	13.5
民族主义女大学生	4	0.2	33	10.1	37	1.8
总计	1 779	100	327	100	2 106	100



续表

阵线	票数					
	男		女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汉堡大学, 1931年2月						
参加总人数 62.6%						
参加的女大学生人数: 51.6%						
纳粹大学生联盟	729	40.3	154	36.2	883	39.5
反抗集团	460	25.4	65	15.3	525	23.5
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397	21.9	103	24.2	500	22.4
德意志自由大学生	157	8.7	81	19.1	238	10.7
革命社会主义者	66	3.6	22	5.2	88	3.9
总计	1 809	100	425	100	2 234	100
哈勒大学, 1931年5月						
参加总人数: 75%						
参加的女大学生人数: 72.9%						
纳粹大学生联盟	841	51.0	75	35.7	916	49.3
德意志团	238	14.4	110	52.4	348	18.7
民族主义者	83	5.0	12	5.7	95	5.1
合唱团	101	6.1	1	0.5	102	5.5
德意志风格高校圈	385	23.4	12	5.7	397	21.4
总计	1 648	100	210	100	1 858	100
汉堡大学, 1932年2月						
参加总人数: 66.4%						
参加的女大学生人数: 61.9%						
纳粹大学生联盟	792	43.9	212	36.9	1 004	42.2
大德意志圈子	357	19.8	29	5.1	386	16.2
社会主义大学生	252	14.0	96	16.7	348	14.6
民族主义反抗集团	181	10.0	92	16.0	273	11.5
民主大学联盟	114	6.3	75	13.1	189	7.9
革命社会主义者	107	5.9	25	4.4	132	5.5
女大学生阵线	3	0.2	45	7.8	48	2.0
总计	1 806	100	574	100	2 380	100

来源: 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498-499.

表 23 1932—1933 年各高校纳粹大学生联盟人数统计

高校	总人数		大学生人数 <sup>1</sup>		百分比		
	NSDStB	女大学生	男	女	男	女	总计
	综合大学						
波恩	95	12	3 871	983	2.5	1.2	2.2
法兰克福	45	18	2 582	614	1.7	2.9	2.0
弗莱堡	153	21	2 352	684	6.5	3.1	5.7
吉森	90	—	1 889	160	4.8	—	4.4
汉堡	43	11	2 557	890	1.7	1.2	1.6
海德堡	124	16	2 435	606	5.1	2.6	4.6
耶拿	61	21	2 208	422	2.8	5.0	3.1
科隆	54	6	3 753	999	1.4	0.6	1.3
柯尼斯堡	119	22	2 211	627	5.4	3.5	5.0
马尔堡	132	15	2 335	575	5.7	2.6	5.1
明斯特	30	4	3 272	808	0.9	0.5	0.8
图宾根	265	19	2 730	423	9.7	4.5	9.0
维尔茨堡	11 <sup>2</sup>	5	2 994	490	0.4	1.0	0.5
总计	1222	170	35 189	8281	3.5	2.1	3.2
	技术高校						
亚琛	40	—	763	54	5.2	—	4.9
达姆施达特	175	5	1 803	31	9.7	16.1	9.8
卡尔斯鲁尔	191	4	1 034	24	18.5	16.7	18.4
斯图加特	166	13	1 594	57	10.4	22.8	10.8
总计	572	22	5194	166	11.0	13.3	11.1
总计	1794	192	40 383	8 447	4.4	2.3	4.1

1. 不包括外国大学生、旁听生和休学学生。

2. 根据 1933 年 1 月 27 日的一则高校团体领导消息，纳粹大学生在维尔茨堡大学有 10~12 名成员。在上一个学期中，成员人数要多。

来源：Hans Peter Bleuel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Programme-Aktionen*, Sie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S. 500.

## 参 考 文 献

### 第一部分 原始文献及档案汇编

- [ 1 ] *Academia: Monatschrift des CV der katholischen deutschen student-  
enverbindungen*, 1915-1930.
- [ 2 ] *Akademische Blätter: Zeitschrift des Kyffhäuser-Verbandes der Vereine  
Deutscher Studenten*, 1918-1926.
- [ 3 ] *Akademische Monatsblätter: Organ des Kartellverbandes der katholis-  
chen Studentenvereine Deutschlands(KV)*.
- [ 4 ] *Akademische Nachrichten*, 1919-1920.
- [ 5 ] *Akademische Rundschau: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Hochschulwesen  
und die akademischen Berufsstände*, 1918-1927.
- [ 6 ] *Anwaltsblatt: Nachrichten für die Mitglieder des Deutschen Anwaltsv-  
erein*, 1930.
- [ 7 ] *Ärztliche Mitteilungen*, 1928-1933.
- [ 8 ] *Berliner Hochschul-Nachrichten: Zeitschrift für akademisches Leben*,  
1919-1924.
- [ 9 ] *Berliner Tageblatt*, 1930.
- [ 10 ]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München*, Soderabgabe, 1931.
- [ 11 ] *Bayerische Hochschulzeitung*, 1920, 1928.
- [ 12 ] *Bayerisches Statistisches Landesamt. "Berufliche Herkunft der  
Studierenden an den bayerischen Hochschulen. "Zeitschrift des Bay-  
erischen Statistischen Landesamtes. Vol. 51. München, 1919.*
- [ 13 ] *Bundesblätter*, 1924.

- 
- [ 14 ] *Burschenschaftliche Blätter,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und der Vereinigung der Alten Burschenschaftler*, 1914-1933.
- [ 15 ] *Burschenschaftliche Rundschau*, 1924-1926.
- [ 16 ] *Burschenschaftliche Wege. Monatsschrift der Burschenschaften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Burschenbundes*, 1920-1927.
- [ 17 ] *Das akademische Deutschland*, 1930-1931.
- [ 18 ] *Der Angriff*, 1928-1931.
- [ 19 ] *Der Volksstaat*, 1929-1930.
- [ 20 ] *Der Angestellte Akademiker*, 1928.
- [ 21 ] *Der Stahlhelm Student*, 1930-1933.
- [ 22 ] *Der Technische Akademiker*, 1930, 1931.
- [ 23 ] *Deutsche Akademische Zeitschrift*, 1919-1921.
- [ 24 ] *Deutsche Akademiker-Zeitung*, 1929-1933.
- [ 25 ] *Deutsche Corpszeitung; Amtliche Zeitschrift der Alten Burschenschaft*, 1922-1923.
- [ 26 ] *Deutsche Hochschule; Zeitschrift des Burschenbunds-Convents, BC und der Deutschen National-Freiheitlichen Studentenschaft*, 1920-1929.
- [ 27 ] *Deutsche Hochschulstatistik*, 1928-1933.
- [ 28 ] *Deutsche Hochschulzeitung*, 1920-1930.
- [ 29 ] *Deutsche Juristen Zeitung*, 1919-1929..
- [ 30 ] *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1919-1921.
- [ 31 ] *Deutsche Rundschau*, 1930-1932.
- [ 32 ]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akademische Korrespondenz*, 1933.
- [ 33 ] *Deutsche Zeitung*, 1921.
- [ 34 ] *Deutscher Studentenwerk*, 1932.
- [ 35 ] *Deutscher Akademischer Rundschau; Zeitschrift für akademisches Leben und studentische Arbeit*, 1920-1928.
- [ 36 ] *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1925-1932.
- [ 37 ] *Der leitende Angestellte*, 1924-1932.
- [ 38 ] *Der Rote Student 2*, Dez. 1931.

- [ 39 ] *Der Stahlhelm-Student*, 1930-1931.
- [ 40 ] *Der Student*, 1929-1932.
- [ 41 ] *Die Bewegung*, 1930, 1936.
- [ 42 ] *Die Hochschule: Blätter für akademisches Leben und studentische Arbeit*, 1918-1921.
- [ 43 ] *Die Junge Revolutionär*, 1927.
- [ 44 ] *Die Schwarzburg: Deutsche Hochschulmonatsschrift*, 1918-1932.
- [ 45 ] *Die Tat: Monatsschrift für die Zukunft deutscher Kultur*, 1909-1939.
- [ 46 ] *Hamburger Akademische Blätter*, 1922-1932.
- [ 47 ] *Hamburger Universitäts-Zeitung*, 1931.
- [ 48 ] *Hessische Volkswacht*, 1931.
- [ 49 ] *Jungdeutsche Stimmen*, 1920.
- [ 50 ]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919.
- [ 51 ] *KC Blätter: Zeitschrift des Kartell-Convents der Verbindungen deutscher Studenten jüdischen Glaubens*, 1920-1931.
- [ 52 ] *Kölner Universitäts-Zeitung*, 1924-1928.
- [ 53 ] *Landsmannschafter-Zeitun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Landsmannschaft*, 1924-1933.
- [ 54 ] *Leipziger Neueste Nachrichten*, 1929.
- [ 55 ] *Medizinische Klinik*, 1923.
- [ 56 ] *Mitteilungsblatt der FO des NSDStB*, 1933.
- [ 57 ] *Mitteilungen der Reich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 Reich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 1920-1933.
- [ 58 ] *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n*, 1929-1930.
- [ 59 ] *Neue Rundschau* 63, 1932.
- [ 60 ] *Niedersächsische Hochschul-Zeitung*, 1919.
- [ 61 ] *NS Hochschulbriefe*, 1925-1929.
- [ 62 ] *NS Erziehung*, 1932.
- [ 63 ]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21-1933.
- [ 64 ]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Volks-*,  
196

- Berufs- und Betriebszählung vom 16. Juni 1933*, Bd. III, Berlin, 1936.
- [ 65 ] *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Lage der Akademischen Berufe, Ergänzungsband zur Deutschen Hochschulstatistik*, Winter-halbjahr 1929-1930, Berlin, 1930.
- [ 66 ] *Studentenwerk; Zeitschrift der studentischen Selbsthilfearbeit*, 1927-1933.
- [ 67 ] *S. V. -Zeitung. Zeitschrift der studentischen Selbsthilfearbeit*, 1918-1920.
- [ 68 ] *Studium und Beruf*, 1931-1933.
- [ 69 ] *Technik und Kultur; Zeitschrift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Diplom-Ingenieure*, 1922.
- [ 70 ] *Unitas; Organ des Verbandes der Wissenschaftlichen Katholischen Studenten-Vereine Unitas*, 1920.
- [ 71 ] *VC-Akademische Turnzeitung*, 1919-1921.
- [ 72 ] *Vierteljahrsheft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 Vol. 35, pt. 1, pt. 3. Berlin, 1926.
- [ 73 ] *Volkswirtschaftliche Blätter*, 1919-1928.
- [ 74 ] *Völkisch Beobachter*, 1926-1928.
- [ 75 ] *Vossische Zeitung*, 1931.
- [ 76 ] *WeinheimerSC - Nachrichten*, 1923.
- [ 77 ] *Wingolfsblätter; Zeitschrift des Wingolfsbundes*, 1918-1933.
- [ 78 ] *Wissenschaft und Hochschule*, 1930.
- [ 79 ] *WSC-Nachrichten; Amtliche Zeitschrift des gesamten WSC*, 1930
- [ 80 ] *Württembergische Jahrbücher für Statistik und Landeskunde* 1916, Stuttgart, 1917.
- [ 81 ] *Deutsche Rechtsanwalts-Zeitung*, 1920.
- [ 82 ] *Zeitschrift des Reichsbundes der höheren Beamten*, 1924.

## 第二部分 德文资料

### 1. 著作

- [1] Adler-Rudel, Shalom,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880-1940. Zugleich eine Geschichte der Organisationen, die sie betreuten*, J. C. B. Mohr(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59.
- [2] Baum, Rolf-Joachim, *Wir wollen Männer, wir wollen Taten! deutsche Corpsstudenten 1848 bis heute*, Siedler, Berlin, 1998.
- [3] Baumgarten, Otto, *Die Not der akademischen Berufe nach dem Friedensschluss*, J. C. B. Mohr(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19.
- [4] Bialas, Wolfgang, *Die nationale Identität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sche Imaginationen und historische Mentalitäten*,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New York, 2002.
- [5] Bleuel, Hans Peter &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1918-1935. Ideologien - Programme - Aktionen*, Sigbert Mohn Verlag, Gütersloh, 1967.
- [6] Brandt, Harm-Hinrich & Mattias Stickler,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wesens*,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gh, Würzburg, 1998.
- [7] Brunck, Helma,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Analyse*. Diss. Phil. Mainz, 1996. Als Druck: *Di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iversitas, München, 2000.
- [8] Buss, Maike, *Intellektuelles Selbstverständnis und Totalitarismus: Denis de Rougemont und Max Rychner - zwei Europäer der Zwischenkriegszeit*, Peter Lang, Frankfurt a. M., 2005.
- [9] Daniel, Ute & Inge Marszolek & Wolfram Pyta & Thomas Welskopp, *Politische Kultur und Medienwirklichkeiten in den 1920er Jahren*,

- R. 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10.
- [ 10 ] Dann, Otto, *Nation und Nationalismus in Deutschland 1770-1990*, C. H. Beck, München, 1994.
- [ 11 ] Dehn, Günther, *Kirche und Völkerversöhnung. Dokumente zum Hallischen Universitätskonflikt*, Furche Verlag, Berlin, 1929.
- [ 12 ] Degenfeld-Schonburg, Ferdinand, *Geist und Wirtschaft.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Aussichten der deutschen Akademiker*,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27.
- [ 13 ] Droßbach, Max&Hans Hauske, *Handbuch für den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er*, H. 6, Berlin, 1932.
- [ 14 ] Elm, Ludwig, Dietrich Heither & Gerharg Schäfer (Hg.), *Füxe, Burschen, Alte herrem. Studentische Korporationen vom Wartburgfest bis heute*, Papy Rossa Verlag, Köln, 1992.
- [ 15 ] Engst, Herbert, *75 Jahre Leipziger Burschenschaft Suevia zu Köln. Vom Werden und Wesen einer deutschen Korporation*, Köln, 1961.
- [ 16 ] Falter, Jürgen W. *Hitlers Wähler*, C. H. Beck, München, 1991.
- [ 17 ] Faust, Ansel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Bde, Pädagogischer Verlag Schwann, Düsseldorf, 1973.
- [ 18 ] Fiedler, Gudrun, *Jugend Im Krieg. Bürgerliche Jugendbewegung, Erster Weltkrieg Und Sozialer Wandel 1914-1923*,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Bielefeld, 1986.
- [ 19 ] Fischer, Erik, *Geschichte der Burschenschaft Alemannia zu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2007.
- [ 20 ] Gay, Peter, *Die Republik der Außenseiter*, Neuausgabe,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 M., 1987.
- [ 21 ] Genschel, Helmut, *Die Verdrängung der Juden aus der Wirtschaft im Dritten Reich*, Musterschmidt Verlag, Göttingen, 1966.
- [ 22 ] Grüttner, Michael,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München/Wien/Zürich, 1995.
- [ 23 ] Hammerstein, Notker, *Antisemitismus und deutsche Universitäten*,



- 1871-1933, Campus, Frankfurt a. M. & New York, 1995.
- [24] Hardtwig, Wolfgang,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Moderne. Politik,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im 19. Jahrhundert*, C. H. Beck, München, 1993.
- [25] Hardtwig, Wolfgang(Hg.), *Ordnungen in der Krise. Zur politischen Kulturgeschichte Deutschlands 1900-1933*, Oldenbourg, München, 2007.
- [26] Hardtwig, Wolfgang(Hg.), *Politi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Zwischenkriegszeit 1918-1939*,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5.
- [27] Hartnacke, Wilhelm, *Bildungswahn-Volkstod*, München, 1932.
- [28] Heither, D, M. Gehler, A. Kurth & G. Schäfer, *Blut und Paukboden, Eine Geschichte der Burschenschaften*, Geschichte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97.
- [29] Herbert, Ulrich,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Dietz Bonn, 1996.
- [30] Hofmannsthal, Hugo von, *Ausgewählte Werke*, Frankfurt a. M., 1957.
- [31] Höpfner, Hans-Paul, *Die Universität Bonn im Dritten Reich. Akademische Biographien un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Bouvier, Bonn, 1999.
- [32] Jarausch, Konrad, *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 Suhrkamp Verlag KG, Frankfurt a. M., 1984.
- [33] Jureit, Ulrike, *Generationenforschung*,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2006.
- [34] Kater, Michael H.,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5.
- [35] Koebner, Thomas, *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der Mythos Jugend*, Suhrkamp, Frankfurt a. M., 1985.

- [ 36 ] Kolb, Eberhard, *Die Weimarer Republik*, Oldenbourg, München, 2002.
- [ 37 ] Kreuzberger, Wolfgang, *Studenten und Politik 1918-1933. Der Fall Freiburg im Breisgau*,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1972.
- [ 38 ] Kurucz, Jenö, *Struktur und Funktion der Intelligenz während der Weimarer Republik*, Grote, Köln, 1967.
- [ 39 ] Laudien, Ernst, *Der Wirtschaftsverband alter Burschschafter*, Hermann Haupt ( Hg. ), *Handbuch für den Deutschen Burschschafter*, 3. Aufl., Brönnner, Frankfurt a. M., 1925.
- [ 40 ] Loeffler, Lothar, *Über den Gesundheitszustand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und die Fürsorgemaßnahmen der Wirtschafts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bis zum Frühjahr 1924*, Hochschulverlag, Göttingen, 1925.
- [ 41 ] Lönnecke, Harald, *Burschenschaft und deutsche Sprache 1815-1935*, Frankfurt a. M., 2005.
- [ 42 ] Lönnecker, Harald, *Der burschenschaftliche Waffentring Leipzi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ipzig, 2003.
- [ 43 ] Lönnecker, Harald, *Die Burschschafterlisten. eines der wichtigsten Hilfsmittel für die Kenntnis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und Geistesgeschichte- Zur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s Gesamtverzeichnis deutscher Burschschafter*, Koblenz, 2009.
- [ 44 ] Magnus, Julius, *Die Notlage der Anwaltsschaft*, Moeser, Leipzig, 1930.
- [ 45 ] Mann, Haide, *Frauen fü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tudentinnen und Akademikerin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Dritten Reich*, Leske & Budrich, Opladen, 1997.
- [ 46 ] Mann, Klaus, *Heute und morgen. Zur Situation des jungen geistigen Europas*, Enoch Verlag, Hamburg, 1927.
- [ 47 ] Mann, Thomas, *Unordnung und frühes Leid. Erzählungen 1919 - 1930*,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91.

- [48] Mannheim, Karl, *Wissensoziologie. Auswahl aus dem Werk. eingel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Kurt H. Wolf*. 2. Aufl.,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Berlin, 1970.
- [49] Men, Fenja Britt, „*Not der geistigen Arbeiter*“. *Die soziale und wirtschaftliche Lage von Studierend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 Beispiel Hamburgs*, SH Verlag, Köln, 2001.
- [50] Mergel, Thomas, *Parlamentar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Symbolische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im Reichstag*, Droste Verlag, Düsseldorf, 2002.
- [51] Messer, August, *Der Fall Lessing. Eine objektive Darstellung und kritische Würdigung*, Gustav Wittler, Bielefeld, 1926.
- [52] Michaelis, Schraepfer, Scheel (Hg.), *Die Zertrümmerung des Parteienstaates und die Grundlegung der Diktatur. Ursachen und Folgen. Bd. 9: Das Dritte Reich*, Wendler, Berlin, 1954.
- [53] Mitgau, Johannes Hermann, *Der Student. Eine Einführung in Studium und Studentenleben an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er Gegenwart*, J. Hörning, Heidelberg, 1926.
- [54] Mosse, Werner E., *Entscheidungsjahr 1932. 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Mohr, Tübingen, 1966.
- [55] Michels, Robert, *Masse, Führer, Intellektuelle; politisch-soziologische Aufsätze 1906-1933*, Campus Verlag, Frankfurt a. M., 1987.
- [56] Müller, Georg, *Die Not der deutschen Geistesarbeiter und ihre Behebung*, Köln, 1924,
- [57] Nipperdey, Thomas,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C. H. Beck, München, 1990.
- [58] Noske, Gustav, *Von Kiel bis Kapp*, Verlag fü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1920.
- [59] Paulsen, Friedrich,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 Asher & Co., Berlin, 1902; Nachdruck Olms Verlag, Hildesheim, 1996.

- 
- [60] Peukert, Detlev. J. K., *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 M., 1987.
- [61] Pöppinghege, Rainer, *Absage an die Republik. Das politische Verhalten der Studentenschaft der Westfälischen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1918-1935*, Agenda Verlag, Münster, 1994.
- [62] Prochownik, Martha,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geistigen Arbeiter Deutschlands*, R. Hobbing, Berlin, 1925.
- [63] Raab, Friedrich, *Politische Bildung auf deutschen Hochschule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Berlin, 1922.
- [64] Ranke, Leopold Von, *Das politische Gespräch*, In: *Sämtliche Werke*, Leipzig, 1873-1890.
- [65] Reulecke, Jürgen(Hg.), *Generationalität und Lebens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Oldenbourg, München, 2003.
- [66] Schairer, Reinhold, *Die akademische Berufsnot. Tatsachen und Auswege*,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Jena, 1932.
- [67] Schirach, Baldur von, *Die Hitler-Jugend. Idee und Gestalt*, Zeitgeschichte Verlag, Berlin, 1934.
- [68] Schirach, Baldur von, *Wille und We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r Studentenbundes*, Münchener Buchgewerbehaus, München, 1929.
- [69] Schnabel, Franz, *Der Aufstieg der Nationen*, Herder & Co. Verlag, Freiburg, 1964.
- [70] Schnabel, Franz, *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Herder & Co. Verlag, Freiburg, 1959.
- [71] Schreiber, Georg, *Die No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und der geistigen Arbeiter*, Quelle & Meyer, Leipzig, 1923.
- [72] Schwarz, Jürgen, *Studen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23 und ihre Stellung zur Politik*,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1.
- [73] Sikorski, Hans, *Studentische Selbsthilfe. Ein Blick in studentisches*

- Leben*, Universität Marburg, Marburg, 1923.
- [74] Sontheimer, Kurt,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 München, 1962.
- [75] Spranger, Eduard, *Psychologie des Jugendalters*, 11. Aufl., Quelle & Meyer, Leipzig, 1929.
- [76] Stadler, E., *Das deutsche Nationalbewußtsein und der Krieg*, Volksvereins Verlag, München-Gladbach, 1917.
- [77] Matthias Steibach & Stefan Gerber, „Klassische Universität “und „akademische Provinz“, *Studien zur Universität Jena von der Mitte des 19. bis in die dreißiger Jahre des 20. Jahrhunderts*, Verlag Dr. Bussert & Stadeler, Jena Quedlinburg, 2005.
- [78] Ströle-Bühler, Heike, *Studentischer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Analyse der Burschenschaftlichen Blätter 1918 bis 1933*, Peter Lang, Frankfurt a. M., 1991.
- [79] Tilitzki, Christian,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sphilosoph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Dritten Reich*, Akademie Verlag, Berlin, 2002.
- [80] Volkmann, Hellmut,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ihrer Entwicklung seit 1919*, Quelle & Meyer, Leipzig, 1925.
- [81] Weber, Alfred, *Die Not der geistigen Arbeiter*, München, 1923.
- [82] Wieben, Matthias, *Studenten der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Kiel) im Dritten Reich. Zum Verhaltensmuster der Studenten in den ersten Herrschaftsjah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Peter Lang, Frankfurt a. M. /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 1994.
- [83] Wildt, Michael,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IS Verlag, Hamburg, 2002.
- [84] Witkop, Philip, *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Georg Müller Verlag, München, 1929.
- [85] Wolzendorff, Kurt, *Die Universität in der Demokratie*, Societäts Druckerei, Frankfurt a. M., 1919.

- [86] Zinn, Holger, *Zwischen Republik und Diktatur*, SH Verlag, Köln, 2002.

## 2. 文章

- [1] *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akademische Studien-u. Berufskunde*, In: *Studium und Beruf. Nachrichtenblatt zur akademischen Berufskunde und Berufsberatung* 2, Berlin, 1932, S. 263.
- [2] Bizer, Ernst, *Der Fall Dehn*, In: Wilhelm Schneemelcher(Hg.), *Festschrift für Günther Dehn*, Kreis Moers, Neukirchen, 1957.
- [3] Brod, Walter M., *Das Korporationswesen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Institut für Hochschulkunde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Hg.), *1582-1982. Studentenschaft und Korporationswesen an d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Würzburg, 1982.
- [4] Bruchmüller, W., *Das deutsche Studententu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In: *Aus Natur und Geisteswelt*, Bd. 477, Leipzig/Berlin, 1922.
- [5] Die Bedeutung der studentischen Verbindungen in unserer Zeit, In: *Academische Monatshefte*, 1. 5. 1884.
- [6] Ehrlich, Ernst Ludwig, *Judenfeindschaft in Deutschland. Von der Römerherrschaft bis zum Zeitalter der Totalität*, In: Karl Thieme (Hg.), *Judenfeindschaft. Darstellung und Analysen*, Fischer Nr. 524, Frankfurt a. M., 1963.
- [7] Gehrig, Hans, *Die Entwicklung der studentischen Lebenshaltung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Wirtschaftsnot und Selbsthilf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Berlin/Leipzig, 1923.
- [8] Gehrig, Hans, *Übersicht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Studenten an den einzelnen Hochschulen (SS1922)*, In: *Nachrichtenblat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III*, Wien, 1922, S. 2.
- [9] Grün, Bernhard, *Die Würzburger Studentenschaft zwischen den Kriegen*, In: Peter A. Süß(Hg.), *Zwischen Korporation und Konfrontation. Beiträge zur Würzburger Universitäts-und Studentenge-*

- schichte*, SH Verlag, Köln, 1999. S. 141-207.
- [10] Hauseke, H., *Burschenschaft und politische Bildung*, In: K. Hoffmann (Hg.), *Burschenschaftliches Handbuhd für Politik*, W. Grunow, Leipzig, 1920.
- [11] Heidegger, Martin,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am 27. 5. 1933.
- [12] Hirche, Kurt, *Der Faschismus der Studentenschaft*, In: *Die Hilfe*, Jg. 37, 1931.
- [13] Kater, Michael, *Krisis des Frauenstudium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59, 1972.
- [14] Leisen, Adolf, *Die Ausbreitung des völkischen Gedankens in der Studenten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ss. Phil., Heidelberg, 1964.
- [15] Lönnecker, Harald, *Die Mensur bei den akademischen Sängerschaften zwischen kulturellem Markenzeichen, sozialem Kriterium und nationalem Symbol (1918-1926)*, In: *Einst und Jetzt*, Sonderdruck, 2005.
- [16] Lönnecker, Harald,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Korporationen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Archiv- und Literaturbericht*, In: Matthias Steibach & Stefan Gerber (Hg.), „Klassische Universität“ und „akademische Provinz“. *Studien zur Universität Jena von der Mitte des 19. bis in die dreißiger Jahre des 20. Jahrhunderts*, Verlag Dr. Bussert & Stadelers, Jena Quedlinburg, 2005.
- [17] Lönnecker, Harald, *Zwischen Mutprobe und Erziehungsmittel. Ritual und Männlichkeitswahn. Ein Streifzug durch die Historie der Mensur in Deutschland 1815-1970*. Vortrag, gehalten am 10. Mai 2007 in der Universität Stuttgart, Historischen Institut, Abteilung Neuerer Geschichte.

- [18] Meinecke, Friedrich, *Ein Osterwort an die deutsche Jugend*, In: Georg Kotowski (Hg.),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2. Aufl., Darmstadt, 1966.
- [19] Meyer, E., *Ergebnisse der Untersuchungen an 3254 Freiburger Studenten. SS 1928 bis WS 1930/31 (Ein Beitrag zur Konstitution des deutschen Studenten)*, In: *Zeitschrift für Konstitutionslehre*, 16B, 1932.
- [20] Lauen, Harald, *Die Stellung des Akademikers in den sozialen Umsehungsprozessen der Gegenwart*, In: Harald Lauen (Hg.), *Volk und Hochschule. Neue Folge des Burschenschaftlichen Handbueshes für Politik*, Brönnner, Fankfurt a. M., 1927.
- [21] Martin, Bernd, *Heidegger und die Reform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1933*, In: Martin Heidegger, *Ein Philosoph und die Politik*, *Freiburger Universtättsblätter* 92, Freiburg, 1986, S. 49-69.
- [22] Möller, Silke, *Studienzeit als Prägende lebensphase. Organisierte und nichtorganisierte Studenten im Kaiserreich*, In: Harm-Hinrich Brandt, Matthias Stickler (Hg.), *Der Burschen Herrlichkeit.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studentischen Korporationswesens*, Würzburg, 1998, S. 405-420.
- [23] Mombert, Paul, *Zum Problem der Berufsüberfüllung*,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66, Tübingen, 1931.
- [24] Morsbach, Adolf, *Nationaler und Übernationaler Lebensraum für deutschen Studenten*, In: *Hochschule und Ausland* 9, Okt. 1931.
- [25] Nipperdey, Thomas,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Adolf Grimme (Hg.), *Kulturverwaltung der zwanziger Jahre. Alte Dokumente und neue Beiträge*, W. Kohlhammer, Stuttgart, 1961, S. 19-48.
- [26] Nothaas, Josef, *Die Stellenlosigkeit der Angestellten*, In: *Allgemeines Statistisches Archiv* 16, Jena, 1926.
- [27] Rürup, Reinhard, *Demokratische Revolution und „dritter Weg“.* *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918/19 in der neueren wissenschaftli-*



- chen Diskussion,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Jg. 9, 1983, S. 291-292.
- [28] Schirach, Baldur von, *Hochschultag, Studentenschaft und Wehrge-  
danke*, In: *Akademischer Beobachter*, Apr. 1929.
- [29] Sikorski, Hans, *Die studentische wirtschaftliche Selbsthifearbeit*,  
In: Hans Sikorski (Hg.), *Wirken und Werke innerhalb der deut-  
schen Studentenschaft*, Marburg, 1925.
- [30] Sohns, Hansfritz,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affenstudententum*,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riefe*, 15. 4. 1930.
- [31] Stickler, Matthias, *Neuerscheinungen zur Studentengeschichte seit  
1994. Ein Forschungsbericht über ein bisweilen unterschätztes Ar-  
beitsfeld der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In: *Rüdiger vom Bruch, Jahrbuch  
für Universitätsgeschichte*, Bd. 4, Stuttgart, 2001.
- [32] Tietgens, Wilhelm, *Die Arbeit der Sozialistischen Studentenschaft*,  
In: *Die Dat* 8, 1931, S. 638.
- [33] Tönnies, Ferdiand, *Die Sozialpolitik nach dem Kriege*, In:  
Thimme, Friedrich/Legien, Carl (Hg.), *Die Arbeiterschaft im  
neuen Deutschland*, S. Hirzel, Leipzig, 1915.
- [34] Topitsch, Ernst, *Hegel und das Dritte Reich*, In: *Der Monat*, Ju-  
ni 1966.
- [35] Wippermann, Wolfgang, *Täter oder Opfer? Die Corps und der Na-  
tionalsozialismus im Urteil der Historiker*. In: Rosc o. G. S. We-  
ber, *Die deutschen Corps im Dritten Reich*, SH Verlag, Köln,  
1998.
- [36] Wurm, Rudolf, *Begründung und System der Selbsthifearbeit der  
deutschen Studentenschaft zur Bekämpfung ihrer wirtschaftlichen  
Notlage*, Diss. Phil., Frankfurt a. M., 1924.
- [37] Zorn, Wolfgang,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Studen-  
tentums 1918-1931*, In: Kurt Stephenson u. a (Hg.), *Darstel-  
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neunzehnten und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Bd. 5, Winter Ver-

lag, Heidelberg, 1965.

### 第三部分 英文资料

#### 1. 著作

- [1] Breuilly, John,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German nation-st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 [2] Beatus, Morris, *Academic proletariat: the problem of overcrowding in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1918-1933*, Diss. Phi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5.
- [3] Giles, Geoffrey J., *St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4] Jarausch, Konrad H.,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Rise of Academic Il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 [5] Kahle, Paul E., *Bonn University in Pre-Nazi and Nazi Times 1923-1939*, London: Portsoken Press, 1945.
- [6] Kater, Michael H.,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7] Leopold, John A., Alfred Hugenberg, *The Radical Nationalist Campaign against the Weimar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8] Loewenberg, Peter, *Decoding the past: the psychohistorical approac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 [9] Retallack, James, *Germany in the 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Basingstoke: St. Martin's Press, 1996.
- [10] Rüegg, Walter, *History of Europe Univers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 文章

- [1] Gerth, Hans, *The Nazi Party: 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Jan. 1940, pp. 517-541.
- [2] Rosenthal, Erich, *Trends of the Jewish Population in Germany 1910-1939*, In: *Jewish Social Studies* 6, 1944, pp. 233-274.
- [3] Zorn, Wolfgang, *Student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5, No. 1, *Generations in Conflict* (1970), pp. 128-143.

## 第四部分 中文资料

### 1. 著作

- [1][德]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 冯克利译, 三联书店, 1998年版。
- [2][德] 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 陆月宏译, 译林出版社, 2009年版。
- [3][西]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 徐小洲、陈军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 [4][美] 彼得·盖伊:《魏玛文化: 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 刘森尧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 [5][美]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 译林出版社, 2006年版。
- [6][法] 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 李末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年版。
- [7] 李工真:《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 [8]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 2. 文章

- [1] 孟钟捷：《德国劳资关系演进中的里程碑——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的发生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 [2] 杨克瑞、张红霞：《“卡尔斯巴德决议”及其对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历史意义》，《现代教育管理》2009年第5期。

##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001年的9月，刚满19岁的我怀揣着喜悦与憧憬，来到了朝思暮想的享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称的武汉大学，成为了一名光荣而骄傲的“珞珈学子”。

最怀念那些在樱园老斋舍的日子，虽然武大这么多学子，但真正能住在这里的并不多，所以即使房子破、环境吵，然而我也不枉为一次珞珈人。最难舍那些在图书馆孜孜不倦的日夜，早“八”晚“十”，图书馆开馆时间就是我的作息时间，后来我竟成了舍友们的“闹钟”。

我是理科出身的，最初，对于“世界史”这一专业，我虽然谈不上一无所知，但也是懵懵懂懂，记得刚开学的师生见面会，我还曾傻乎乎地向老师求证，以前学理科现在学文科，能不能学得好？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还真有点“无知者无畏”的莽撞。但也许正是这种莽撞，使我在世界史研究这条路上由“呐喊”的本科、走到“彷徨”的研究生，直到今天“朝花夕拾”的博士。学问如同画圆，知识越多，半径越大，但圆周也越长，接触到的未知领域也就越宽泛。所以，我虽然在世界史这个专业中成长了十年，可是却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浅薄。今年，世界史专业已经成为国家一级学科，作为一个世界史学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不敢轻言为它添砖加瓦，倘若能够做些细枝末节的修补，也算尽了雏鸟反哺的责任。

我的恩师李工真教授曾教导我们，做学问应“不为稻粱谋”，要把“床板子竖起来”，尤其是世界史中的德国史，注定还要比其他同学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因为若想做出真正的学问，就要刻苦学习德语，研读史料。那时，我又发挥了“无知者无畏”的精

神，选择了将德国史作为学术方向。但是，一路走来的艰辛恐怕无人得知。最初练习发音，练到嗓子出血，后来做梦时都在说德语，德语班的同学越来越少，但我还在坚持，并且自己报名去考四级，考“德福”(DaF)。不过我这种“痴”学使我在德福考试时高分通过，也为我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2010年，我有幸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的资金支持，到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访学一年，获益良多。

在我求学和成长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良师和益友在学习、生活上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正是他们的付出给了我进步的动力。

首先我要感谢恩师李工真教授。跟随李老师求学的十年中，我耳濡目染了大师做学问的严谨和踏实。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作为班主任的李老师就与我们“相约星期五”，每个周五都在历史系与我们畅谈武大历史，风雨无阻。从他对武大轶事声情并茂的描述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武大老前辈们做出的辉煌业绩，也下定了勤奋读书的决心。当然，李老师的言传身教更是一本活的书。博士论文凝聚了李老师无限的心血，他字斟句酌地帮我把关。李老师的治学之道将是我一生追随的典范。

作为科班出身的“世界史人”，当然不能忘记武汉大学世界史专业众多老师的悉心栽培。向荣老师如同一位慈父，我能够有今天的成长，离不开向老师的教诲和帮助。此外，还有陈勇老师、李荣建老师、徐友珍老师、潘迎春老师、谢国荣老师等，都曾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这里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对于我的德语启蒙老师翟来发老师，我要提出特别感谢。

斯图加特大学的 Wolfram Pyta 教授在我访学的过程中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帮助，使我的论文方向更加明确，奥格斯堡大学的 Andreas Wirsching 教授也曾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每当想起他们来自异国他乡的关怀，我都热泪盈眶。

我还要特别感谢斯图加特的很多朋友。Helmut Volk 和 Marta Volk，一次偶然的相遇与他们结下了这场忘年交，他们像我的爷爷奶奶一样，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回国后他们仍然与我保持联系，

关心我的生活；开朗的淑慧姐姐和 Markus 大哥，他们对我的关心使我丝毫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落寞，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我爱他们。

珞珈十年，我也结下了不少同窗好友，感谢他们的陪伴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时刻支持我、爱护我的家人。

王 莹

2014 年 1 月



从知识精英到纳粹分子  
——德国魏玛时期的大学生研究

ISBN 978-7-307-13379-2



9 787307 133792 >

定价: 36.00元